
浩 气 长 存

——纪念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 70 周年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前 言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它诞生于全民抗战烽火之中，浴血奋战在大江南北，屡建奇功，声名远播，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从盐城停翅港迁驻原二师师部驻地黄花塘。1945年3月至9月暂驻千棵柳，10月份进驻淮阴城。在这长达2年8个月的时间里，黄花塘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指挥着华中抗日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期间，领导军民武装保卫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和对日伪局部反攻的胜利；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以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根据地迅速发展；开展了整风、大生产、整训军队三大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经济上，为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艰苦卓绝而又激情飞扬的岁月，已渐渐远去，但它给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存在，时光的流逝并未使其失色，时代的呼唤让它倍加珍贵。为了牢记那段风与雨、血与火的历

史，缅怀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牺牲的革命前辈，颂扬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值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 70 周年之际，县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了《浩气长存》一书。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饱含深情的笔触，再现了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讴歌了那些无私无畏的英雄。既有老战士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文章，也有党史工作者撰写的研究文章，内容广泛，语言朴实，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尤为可贵的是，新四军第二代把自己对父母的崇敬、爱戴述诸笔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对父母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最深刻的理解、赞同和敬仰，足以告慰先辈英灵。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把握未来。新四军在建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铁的新四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今天发展盱眙、建设盱眙，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铁军”精神，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始终保持一种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创新创优，攻坚克难，为盱眙振兴、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

政协文史委要进一步加强对盱眙党史、革命史、现代史的研究和宣传，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积极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让后人了解家乡的光荣历史，了解先辈浴血战斗和艰难创业的历程，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开拓进取，努力奋斗，把盱眙明天建设的更加美好！

目 录

军部史存

- 1、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的业绩·····甄子明
- 2、华中局城工部三年·····张承宗
- 3、赖传珠领导下的参谋处二科·····王征明
- 4、记黄花塘华中兵工生产会议·····王统仪
- 5、军部整风中的风波·····罗英才

将军风采

- 1、陈毅在黄花塘·····张再传
- 2、张云逸在黄花塘二三事·····罗昌林
- 3、罗炳辉在淮南·····夏 耘

名人故事

- 1、吴运铎创办军工厂·····程琪璜
- 2、范长江在大刘郢·····高 歌
- 3、崔义田在黄花塘·····黄群华
- 4、白衣战士宫乃泉·····杨丹平
- 5、新四军中的外国大夫——罗生特·····李 磊

烽火战淮南

- 1、莲塘战斗·····陈 琳
- 2、龙王山战斗·····张国政
- 3、奇袭盱眙城·····朱云谦
- 4、顺河集战斗·····唐国干

老兵话当年

- 1、在淮南军工厂的艰苦岁月…………… 吴运铎
- 2、大王庄沸腾的生活片段…………… 梅延庆
- 3、沐浴在爱的海洋中…………… 于 玲
- 4、美国飞行员在黄花塘…………… 刘志诚
- 5、坚持敌后医疗工作…………… 笪根庭
- 6、我的日记…………… 贾 顺

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 1、华中建设大学……………陈修良 梁承志 刘煜 智仁勇
- 2、抗大八分校…………… 刘扬生
- 3、江淮大学…………… 校史编写组
- 4、淮南艺术班…………… 齐锡朋
- 5、淮南新医进修班…………… 唐国怀
- 6、淮南大众剧团……………黄宝殿 朱茂业

追寻父辈的足迹

- 1、英雄的母亲，甜美的乳汁…………… 邓淮生
- 2、听父母讲那过去的故事…………… 谭晓雯
- 3、让昨天告诉今天…………… 邓小燕
- 4、在丹桂飘香的日子…………… 刘华苏
- 5、千里寻根之旅…………… 朱千里
- 6、父亲帮陈毅军长搜集资料…………… 刘迎新
- 7、妈妈的伤残故事…………… 胡海鸽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 在黄花塘的业绩

甄子明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肩负着民族解放重任，转战于华中大地上，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开创了抗日根据地，同敌伪顽进行殊死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经历了四个战略时期：从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是发展时期；从1941年1月至1943年冬，是坚持时期；从1944年春至1945年8月上旬，是恢复发展时期；从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声明至1946年1月，是战略反攻时期。

新四军军部自1938年1月成立起，曾先后驻过江西南昌，安徽歙县岩寺、泾县云岭，江苏盐城、阜宁停翅港、盱眙县黄花塘、淮阴、山东临沂。而驻扎在黄花塘时间长达两年八个月，是军部自成立以来驻扎时间最长的一个驻地，经历了坚持、恢复发展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时期。

1942年冬，敌伪调集重兵，企图进犯我盐阜区，实行大“扫荡”，妄图“围剿”我新四军军部，为粉碎敌人大“扫荡”，华中局、军部于12月25日，分三个梯队，向淮南路东根据地进发，1943年1月10日，进驻盱眙县境黄花塘。

华中局、军部移驻黄花塘前的华中形势

1941年6月爆发苏德战争，12月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党中央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日军动向，向全

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最后形成为德、日、意法西斯与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决斗，虽然战争还是长期的，但最后胜利必将属于反法西斯阵营，形势发展的趋势对中国抗战基本上是有利的，但敌后抗战将更加艰苦，更加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中敌后斗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敌伪顽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政治进攻。1942年冬，敌伪大举“扫荡”盐阜区。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日、汪、蒋汇成一股反共逆流，在蒋介石统一部署下，先后策动顽军李长江、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顾祝同向我豫皖苏根据地进攻。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我根据地经济遭破坏摧残和封锁，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我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敌后军民必须咬紧牙关，渡过困难，并准备好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争取在抗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接着党中央又颁发了关于根据地建设和军事建设等各方面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坚决粉碎敌伪的“扫荡”，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退顽军的进攻，集中精力进行精兵简政，发动群众，发展经济，训练干部等工作，以求恢复元气，巩固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华中局根据党中央指示，结合当前情况，提出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总方针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提

出了坚持敌后斗争，巩固根据地的措施和要求：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加强对敌斗争，坚决粉碎敌伪“扫荡”、“清乡”、“清剿”和“治安肃正”一切形式的进攻；以群众运动为中心，普遍深入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努力加强军事建设，继续提高主力军的军事素质，积极扩大地方军；采取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加强党的建设。在全党进行审查党员、整顿支部、加强干部教育、开展整风学习，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

华中局、军部在黄花塘时期的业绩

1943年初，华中局、军部移驻黄花塘后，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依据华中敌后的斗争形势，提出了粉碎敌伪顽的进攻，全面建设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生产运动、整训军队等一系列战略任务，号召华中党政军民为实现上述任务而斗争。经过了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伪的“扫荡”，沉重打击了反共军的进攻，挫败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克服和战胜了严重的灾荒，解放区经济得到复苏；保卫和巩固了华中抗战阵地，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经济上，为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坚持敌后斗争，粉碎敌伪顽进攻，保卫华中阵地

(1) 粉碎敌伪“扫荡”、“清乡”、“清剿”。1942年冬季，苏德战场上德寇行将惨败，太平洋方面美英反攻力量逐渐增强，中国战场上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继续蓬勃发展，日军处境日益困难。为摆脱困境，日军更加紧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与“清剿”。

日军于1942年冬将“扫荡”重点转向我华中的淮海、

淮北与淮南地区。首先调集敌伪 5000 余人，对我淮海区进行分割，实行分区“清剿”。我淮海区军民，灵活转移，分散坚持，使敌人扑空。与此同时，敌伪 6000 余人向淮北地区进行反复“清剿”，被我击退，敌狼狈溃逃。继之，敌伪 2000 余人，向我淮南津浦路西“扫荡”，亦被我军民粉碎。

1943 年春，日军于“扫荡”淮海、淮北、淮南告一段落后，继续调整部署集中兵力 14000 余人，向我盐阜、苏中根据地实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华中局、军部要求全党全军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从最坏处作打算，向最好处去努力，不管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都必须坚持斗争。此时，党中央、毛主席向华中局、军部作了指示，指出：苏军冬季反攻胜利极大，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顽强坚持斗争。华中全党全军全面地、紧张地进行了反“扫荡”的各项工作：在全体军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说明敌情虽然严重，但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斗争前途肯定是胜利的，从而提高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党政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将一部分干部充实到连队和农村去，加强基层，加强坚持斗争的核心力量，发动人民群众挖沟填河、筑坝，改造地形，埋藏粮食和其它物资，实行空室清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友军及地主士绅共同坚持斗争；加强主力部队的整训和加强对民兵的领导，使之成为就地坚持的坚强武装力量；大力开展伪军工作，加强边区、交通要道、敌占区和沿海的群众工作，以保持回旋隐蔽的余地，肃清匪特奸细，对封建道

会门和流亡分子加紧进行争取和控制，安定农村革命秩序。为了使盐阜、苏中地区的部队在敌大“扫荡”情况下便于机动和回旋，华中局、军部机关于1942年底开始向淮南地区转移。经过一系列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1943年春至4月上旬，敌伪对我盐阜、苏中地区历时50余天的大“扫荡”被彻底粉碎。在这个反“扫荡”作战中，共毙伤敌伪军1000余人，俘敌伪78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这一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鼓舞了我根据地军民。至此，日军对华中地区的空前、大规模“扫荡”，完全以失败告终。

(2) 坚持边缘区斗争，粉碎敌伪蚕食、伪化政策。日军为了达到其摧毁我华中根据地，驱逐或消灭我党我军的目的，在实施反复“扫荡”、“清乡”、“清剿”的同时，还以其所控制的据点为依托，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伪化，扩大伪化区。它的蚕食、伪化，是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特务和文化等各种手段，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的。因此，华中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不断粉碎敌伪“扫荡”、“清乡”、“清剿”的同时，还进行了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淮海、盐阜、淮北及苏中等地区更加频繁。在地方党政军及时而正确的领导下和地方武装的有力支援下，对敌伪进行了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伪蚕食、伪化的阴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使根据地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敌伪对我根据地的蚕食、伪化失败后，为巩固其占领区，又在这些地区，进一步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分区分期地实行“治安肃正”。我

各根据地军民联合发动了强大攻势，严重打击了敌伪，使其“治安肃正”计划化为泡影。

反蚕食、反伪化斗争的胜利，是采取了以群众性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结合其他形式，积极展开斗争而取得的。在反蚕食、反伪化斗争中，主要依靠地方武装的就地坚持，与主力军的机动突击和武工队的深入敌后相结合，同时注意开展了对伪军、两面派等工作。在敌情特别严重的地区，还灵活地进行了隐蔽、合法斗争，这些斗争有效地保卫了根据地，缩小了敌占区，对坚持华中敌后阵地具有重要意义。

(3) 配合全国击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粉碎反共军进攻计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我党我军为了争取改善国共关系，加强团结抗战，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蒋介石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1943年3月，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借此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总动员，同时命令各路“剿共”军，继续向山东和华中举行大规模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为了民族利益，仍然一如既往，采取克制态度，竭力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华中我党我军，也一面坚持自卫立场，一面呼吁反共军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1943年春，残存在苏北地区的韩德勤部万余人，在日军“扫荡”下，一触即溃。我军不计旧恶，主动予以掩护，使其大部脱离险境，退入我苏北根据地休整，同时又在粮草、经费等方面给予接济。但是蒋介石在此时命令屯集在阜阳、太和地区的李品仙部北犯山东，王仲廉兼程东进，向我淮北根据地进攻。在蒋介石统一部署下，得到了喘息的韩德勤，

恩将仇报，不去向日军收复失地，却企图乘日军转兵向我大举“扫荡”之机，侵占我淮北根据地，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为粉碎韩、王东西对进阴谋，制止蒋介石扩大内战，保卫华中抗日民主阵地，我军对韩顽进行自卫反击，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 1000 余人，粉碎了顽军的东进计划，最后铲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留置在我华中根据地的反共堡垒。至此，我仍以团结抗战为重，根据中央指示对韩德勤实行宽大处理，将其释放，发还其部分人枪，并划出睢宁、宿迁间凌城、埭子集、邱集一带为其驻地，以促使他从此觉醒，共同抗战。

1943 年夏，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大军，企图闪击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内战。当全面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我党中央发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制止反共内战的紧急呼吁，在全国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的抗议运动，并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迅速做好坚决自卫的准备。我华中全党全军与广大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反内战热潮，各部队纷纷举行了动员大会、宣誓大会，声讨了蒋介石的罪行，有力地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同时，对华中军民击退反共军的再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配合全国击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我军在华中各个方面胜利地击退了反共军的进攻。在淮北地区，对韩德勤趁机妄图死灰复燃，策动反共阴谋活动进行了清剿。在苏南，对顾祝同向我十六旅进攻，被迫自卫，反共军不战而溃。在淮南津浦路西皖中地区，我第二、第七师密切配合，顽强地坚持了阵地，制止了李品仙部对我根据地的蚕食。

1944年秋，苏联红军已逼近德国本土，希特勒临近灭亡。美军已打到菲律宾。日军在国际上完全孤立，处境日益危殆，为挽救局面，分别进犯湖南、广西、浙江温州、福建等地，国民党为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在敌人进攻之下，命令其第三战区顽军，以图阻止我执行向东南敌后发展方针，南下苏浙皖边的计划，先后三次发动向我苏浙军区部队进攻，均被我军粉碎，取得了歼灭顽军1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苏浙边敌后新区，加强了敌后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苏南根据地，扩大了我军在江南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国民党桂系顽军，配合敌伪向我“扫荡”，发动多次对我淮南路西第二师、皖中第七师进攻。在其训令中公然宣称“本军出动目的，纯系进剿新四军，控制江(浦)和(县)地区，应避免与敌决战，并派特务向敌伪声明：“本军除打新四军外，别无他意。”我第二师、第七师遵照党中央对西防御的方针，严守自卫立场，给予桂顽沉重打击。粉碎了该顽夹击我第七师的企图，打通了第二师、第七师联系，从而坚持淮南津浦路西和皖江阵地。

(二)放手发动群众，普遍深入建设根据地

(1)实行减租减息。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作了普遍深入建设根据地的部署，要求各师、各根据地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在粉碎敌伪“扫荡”、击退反共军进攻的前提下，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争取在1942年、1943年两年内，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完成改造政权、发展人民武装等各项任务，各部队各地根据华中局关于普遍深入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部署，集中力量，抓紧

反“扫荡”间隙和夏收、秋收季节，按照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有步骤地、大胆放手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各地区都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政策准备，从而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逐步发展，逐步深入。群众运动按照政策进行，对地主阶级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采取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贯彻执行了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中小地主，孤立打击了极少数的反动地主，因而最后达成了既发动广大群众，又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的战略目的，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统一战线。

在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新四军各部队一面抽调干部加强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有力地掩护了群众运动。

(2) 基层政权的改造。各地在减租减息胜利、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始由下而上的进行各级政权的民主改造工作。基层政权的改造，主要是通过民主教育发动群众向封建统治斗争，吸收工农积极分子参加政权工作，并按中心区、边缘区的不同情况分别实施。县以上政权的改造，主要是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策，广泛吸收了各抗日阶层代表参加参议会和政权工作。各级政权民主改造的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工农的政治地位，从政治上削弱了封建势力，另一方面更加巩固了统一战线，团结了各抗日阶层，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3) 建立与发展人民武装。减租减息胜利后，各地根据上级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在发展自卫军的基础上，大力进

行了民兵建设，建立与发展人民武装，在县区乡各级普遍成立了武装委员会。

建立与健全了人民武装的领导机构，抽调了大批干部从事民兵工作。结合开展反“扫荡”、反伪化和剿匪锄奸斗争，动员各阶层青壮男女参加民兵。同时，以动员地主献枪、借枪等方式，逐步将地主的枪支转移到民兵手里，到1943年底，全华中民兵总数达到62万余人，从民间搜集和从地主手中转移过来的各种枪60余万支。

至1943年，各根据地大规模群众运动告一段落，基本上完成减租减息、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在群众运动中，各地涌现出了大批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工农干部；地方党政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抗日民主政权也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基本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更加热爱，踊跃交公粮、送子参军，形成了拥护政府和拥军优抗热潮。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各根据地逐步展开了经济建设工作。

(4)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巩固敌后抗日统一战线，发扬人民抗日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保障军需民食，打击敌人的经济封锁等方面均有决定意义。在粉碎敌伪顽进攻，减租减息取得胜利，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民主政府得到巩固的基础上，各地党政领导群众，开展以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副业、畜牧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工作并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正确地制定与实行财政、金融、贸易、征粮、税收政策。广大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新四军的配合帮助

下，兴修水利，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发展公益事业，建立了强有力的财政机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整顿财税体制，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各地政府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规定免税外，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的战时财经政策，以确保战时财力的需求。政府的财政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70%交军队，30%留地方；或2/3归军队，1/3留地方。各地政府，都认真恪守上述规定向部队提供经费。根据战略地区划分，苏中行署向一师提供经费；淮南行署向二师提供经费；苏北行署向三师提供经费；淮北行署向四师提供经费；鄂豫皖行署向五师提供经费；苏南行署向六师提供经费；皖江行署向七师提供经费；淮海专署向独立旅提供经费。新四军军部所需经费，在皖南事变后，主要由各师在其财政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以“上解款”名义上交军部。各师“上解款”数额各不相同，其数额由华中局财委根据各地财政收入状况，提出合理分配指标，经军部和华中局批准实施（五师因所处环境特殊，交通不便，与军部没有直接联系，无上解款任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加紧对根据地大举“扫荡”，实施“三光”政策，根据地经济遭到破坏，财政收入减少，各师向军部“上解款”相应减少，有的师停止上交，为了切实保障军部经费供应，1942年冬，军部、华中局决定派军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等人去皖江七师地区加强地方财政税收工作，为军部筹措经费，有力地保障了军部的经费需要。

(三)开展整风运动

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为迎接全面反攻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奠定思想基础。

华中党政军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才结束，历时三年多。华中党政军几年来的整风运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提高了全体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改造了思想作风，使我军更加统一、团结和巩固，战斗力更加坚强，为实行战略反攻打下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中共“七大”召开作了思想准备。1945年4月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陈毅同志作为新四军选出的党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作了题为《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表达了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全体指战员高度的政治信念和团结奋斗精神。

(四)开展大生产运动

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是战争年代我军克服财经困难，保障部队供给，改善指战员生活的有效办法，也是我军物资经费取之于己的主要来源。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伪顽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灾荒，从1942年起，华中根据地出现了极端的财经困难，部队供给难以保障，党中央号召部队开展生产运动，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早在1940年春，党中央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初，军部移驻黄花塘一带，9月30日华中局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决定把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1944年3月13日，党中央下达了《关于华中部

队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在不妨碍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善部队生活而斗争，所有部队和机关学校农业手工业生产所得，应一律用以改善部队、机关全体人员的生活，公家给他们的经费仍旧发给，不予扣除。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中局于1944年4月1日下达的《华中局关于部队生产的指示》指出，在去年未进行生产、今年开始发动生产与环境比较紧张、敌人“扫荡”频繁的党政民机关部队，如苏中一师、苏南十六旅、浙东和皖中部队，可完全根据中央3月13日指示执行。凡环境比较安定而去年已实行了生产的部队和地区，如淮南二师、淮北四师、苏北淮海三师部队，可酌情采用军直属队今年生产规定办法，动员部队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各根据地党政机关为了战胜灾荒，克服财经困难，支持长期斗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领导人民群众，部队积极支持配合，开展大生产运动。人民生活积极性极为高涨，由于党政军民齐动手，战胜了敌伪掠夺、破坏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使农副业生产逐步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为战略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生活，而且经费支出也得到部分弥补和减少了预算支出，克服了财政困难；增强了劳动观念，学到了生产知识；增强了军队内部、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加强了群众观念，密切了军民关系。

(五)加强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政治整训运动

1944年7月1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

指出：为了驱逐日军出中国和对付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要在一年内抓紧战斗和生产间隙，在现有基础上，加紧整训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我军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规模准备条件。指示规定，军事训练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采用群众运动、学用一致、培养典型、带动全面的方法进行，并应总结带兵、用兵、养兵的经验。政治整训应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用检讨错误缺点、发扬成绩、总结模范连队经验、奖励英雄模范等方法，改进与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注意对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培养大批干部。指示还指出部队整训应以练兵为中心，采取官教官、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把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四大技术练好，并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华中局、军部依据上述指示，于10月对全军的军政训练作了具体部署。

各部队根据军部的部署，在1944年冬，初步展开了军事训练。1945年春季起，又开展了以尊干爱兵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在这一整训中组织干部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及有关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文件，经过深入的动员，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然后普遍召开连队民主大会。之后，又举行官兵团结大会，分别订出“爱兵公约”和“尊干公约”，相互提出执行“公约”的保证，并在营、连间发起搞好官兵关系的“挑战”和“应战”，进行革命竞赛。

经过尊干爱兵运动，官兵团结增强了，各部队抓住时机，深入进行练好本领的政治动员，进一步掀起提高四大技术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练兵中，各级干部亲临操课，既做先

生又当学生，与战士共同操练，广大士兵也勤学苦练，努力提高技术。各部队采取了官教官、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初步养成了互为师生，教学相长的风气。为贯彻执行学用一致、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沙盘作业、民主评议等方式，检讨和总结了实践中的技术、战术经验。各部队还注意了运动战术原则的教育和攻坚战术、技术的训练，并强调在练兵中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指示，克服游击习气，养成正规作风。各级领导机关，普遍注意了改进领导方法，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培养典型，表扬模范单位和个人，奖励先进分子，帮助后进分子，并组织观摩、竞赛等，使练兵运动的高潮不断出现。

在开展练兵运动的同时，全军各级指挥机关，加强了司令部建设。选拔了一批有实战经验和相当政治、文化水平的干部充任参谋。通过在职培养(配备见习参谋)和专门训练(办参谋训练班)等方式，加强参谋人员的业务教育，提高其工作能力，使其水平逐步适应日益发展的需要，并逐步建立、健全了司令部各种工作制度，增强了上下联系，从而发挥了司令部机关对组织指挥战斗和军事练兵运动的指导作用。各级政治机关，在练兵运动中发扬了面向连队；面向实际、重视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的作风，动员干部、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做政治工作。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连队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也得到加强；较普遍地轮训了支部骨干；建立或进一步贯彻执行了连长、政治指导员定期向支部大会报告工作的制度；吸收了大批在作战、训练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入党，鼓励广大士兵积极参加军人俱乐部和经济

委员会的工作，发扬了经济民主，进一步开展了群众的自学活动，活跃了连队的文娱生活。

为适应建军和作战的需要，各部队有计划地通过抗大分校和教导队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这些校、队抽调了部队的指战员和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入学。此外，还在部队中增设了副职干部，抓紧了在职干部的教育，并通过总结带兵、用兵和养兵的经验，使干部的战术水平、作战指挥和管理教育的能力均有提高。在部队开展军政训练和各项建设工作的同时，各地利用农闲时间，抓紧进行民兵、自卫军的扩大、训练和组织整顿等工作。大批地方党员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民兵、自卫军，使人民武装的数量迅速扩大，并按照劳武结合、学用一致的原则，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民兵训练，普遍开展了创造民兵英雄的运动，从而使民兵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坚强。

华中我党我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经过 1944 年和 1945 年上半年的努力，在战略反攻准备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军事力量大为加强，为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六)为我党我军锻炼和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标志着新四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总结了皖南事变的深刻经验教训，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了一步，使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41 年到 1943 年，华中敌后抗战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严重困难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间，华中党和军队

的领导同志深深体会到干部的重要性，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有了干部，就有人有枪，有钱有粮了。于是，华中局和军部狠抓了干部的培训。华中党校于1941年夏在盐城创办，校长刘少奇(兼)。少奇、陈毅、钱俊瑞、孙冶芳、朱讯等领导同志亲自讲课，是年夏天，敌人“扫荡”，该校转移到阜宁县汪朱集，1943年1月又转移到盱眙县新浦。这时，校长是饶漱石兼任，副校长彭康。早在1941年1月，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的抗大五分校和1941年6月从华北抗大总校南下的由洪学智同志率领到达苏北盐城的华中大队扩建抗大五分校，由陈毅兼任校长、政治委员，冯定、洪学智任副校长，谢评军、贺敏学分别任正副教育长，余立金、吴盛坤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薛暮桥、谢云晖分别任训练部正副部长。1941年冬，华中局、华中军分会和军部作出决定，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陈毅兼任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薛暮桥任代理政治部主任。1943年初，抗大华中总分校随军部转移到淮南地区盱眙，驻扎泥沛湾，不久撤销。各师先后成立抗大分校，第四分校归属第四师领导，第五分校归属第三师领导，第八分校归属第二师领导，第九分校归属第一师领导，第十分校归属第五师领导。这五个分校以不同形式坚持办学，有的办到日本投降。1942年9月成立江淮大学，校长韦恂。1944年夏成立淮南公学。1945年成立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副校长张劲夫。1945年5月，华中军医学校在盱眙县常庄创办，校长江上峰。此外，军部、各师以及地方党政系统，举办各种训练班和以在职培训等方式培养训练各类专业干部和技术人才。上述各类学校和训练班，是培养干部的场所，大多数是华中局、军部在黄花塘期间举办的。通过学习军事、政治和

专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党政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军事技术和专业知识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为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不少人，尔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骨干，为四化建设立下了历史的丰碑。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我党我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在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中，艰苦奋斗，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中，华中我军在 30 万国民党反共军的封锁、围攻的条件下，抗击和牵制敌军 16 万人，占侵华日军的 20% 强，伪军约 23 万人，占侵华伪军的 30% 强。据不完全统计，仅从 1942 年 6 月到 1945 年 10 月，华中部队对日作战 24900 余次，毙伤日军 117000 余名，伪军 175000 余名，俘虏日伪军 110000 余名；缴获各种口径炮 550 余门轻重机枪 4200 余挺，长短枪 222000 余支及其他大量军用品。对顽自卫反击作战达 3200 余次，毙伤俘顽 143000 余名，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 253000 余平方公里，人口达 4346 万，我军主力及地方武装发展到 30 余万人，民兵、人民自卫军发展到 96 万余人。

新四军抗战八年的历史，军部驻扎在盱眙县黄花塘就有二年八个月，而且这个时期又是新四军由坚持、恢复、发展到夺取抗战胜利时期，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所作出的贡献应载人史册。

附件：华中局、军部在黄花塘时期的组织情况及驻地分布

代军长陈毅(1943年11月赴延安，后由张云逸代理)，代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

1、华中局(驻黄花塘，后驻千棵柳)：书记饶漱石；秘书岳夏、李颜；组织部长曾山；科长温仰春、王尧山；宣传部长彭康、副部长冯定；城工部(驻大小王庄)，部长刘晓，副部长刘长胜；统战部(即情报部，驻大小王庄)，部长潘汉年；交通科长邓寅冬。

2、司令部(驻黄花塘，后驻千棵柳)：参谋长赖传珠，参谋处长陈锐霆；政治协理员钟剑平、钟嘉华；一科(作战科)科长朱茂绪，后谭知耕，副科长叶超；二科(侦察科驻黎园，锅底塘)，科长马步英，副科长王征明；政治协理员杨仁声；三科(通信科，驻黄花塘：(后驻张洪郢)，科长曹丹辉，副科长黄荣，机务主任曹维廉；四科(管理科，驻黄花塘)，科长石裕田，副科长杜立保；五科(教育科)科长洪隆(冯少伯)；六科(人事科)副科长汪晓云(未配科长)；机要科科长薛丹浩，副科长左金祥、肖光、李德安；调查研究室(即情报处驻双庙)主任胡立教。

3、政治部(驻大小王庄，后驻葛家巷)：主任饶漱石(兼)，秘书长邓逸凡；总务科长张和清，组织部长张凯，干部科长徐海珊；锄奸部(保卫部)部长汤光恢，副部长梁国斌；宣传部长钱俊瑞、科长何能；敌工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科长陈子谷。

4、新华分社(驻大小王庄，后驻锅底塘)：社长范长江，副社长于毅夫。

5、军直政治部(驻大小王庄，后驻船塘庄)：主任张凯(兼)，组织股长刘子诚(刘志诚)，副股长姜荣义；宣传股长顾前，副股长冯村(陈念棣)、张望；锄奸股长林谷，副股长胡福瑶；生产民运股长刘子诚(兼)，副股长储精益。

6、供给部(驻常庄)：部长宋裕和，政治协理员林坚，会计科长甄峥(甄子明)，粮秣科长胡铮，军实科长胡铮(代管)，兵站科长黄河。

7、卫生部(驻常庄)：部长崔义田，副部长戴济民，医政科长薛和(女)，保健科长唐求(女)，材料科副科长胡山(未配科长)，管理科长袁序。

8、供卫部(驻常庄)：1943年春，实行精兵简政，供给部与卫生部合并，成立供卫部，部长宋裕和，副部长崔义田、戴济民、官乃泉。医务主任齐仲桓(后叶果)，总务科长叶钦和，供给科长甄峥(甄子明)，副科长胡铮，医政科长马万芬(女)，保健科长唐求(女)，材料科副科长胡山，直属休养所所长宋文静(后朱灵)，医务学校校长江上峰，副校长官乃泉(兼)，医干训练队队长崔义田(兼)，后官乃泉。

1944年10月，供卫部重新分开，卫生部长崔义田，该部组织无变化，供给部撤销，成立军直供给处。

9、军直供给处(驻小周庄)：主任甄子明，副主任胡铮，政治委员钟剑平，会计股长冯文(凤纹)，粮秣股长张乔雷、军实股长吴家云，被服厂厂长冯永昌。

10、军特务团(驻岗村)：团长谭知耕，后谢祥军、朱国华、张宜友，政治委员张闯初，后黄祖炎，参谋长高峰，后傅彪、张云龙，政治处主任汪大漠，后刘子诚，副主任许登寿，供给处主任刘开福(刘凯夫)，后孙豹奇。

11、华中党校(驻新铺)：校长饶漱石(兼)，副校长彭康，组织处长温仰春，科长孙湘，总务处长钱俊瑞(兼)，科长黄君萍。

12、华中建设大学(驻新铺)：校长彭康，副校长张劲夫，秘书科长王尧山，总务科长黄君萍(后孙豹奇)，组织科长孙湘，财政系主任陈穆、陈修良，民政系主任贺希明、姚耐，民运系主任李代耕、方章，文教系主任陈同生、张天民，后朱达章。

13、抗大总分校(驻泥沛湾)：校长陈毅(兼)，副校长韩振纪，教育长谢祥军，训练部长薛暮桥，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后薛暮桥代理)，供给处长郑金，管理处长周正山(周亚农)。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张承宗

1942年至1945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上海地下党（包括江苏地区）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成立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又称敌占区工作部）。历时三年，到1945年8月以后，成立中共上海局和地下党市委。

华中局城工部的三年，在领导上海地下党坚持敌占区斗争和保护干部、培训干部、审查干部、整顿组织、开辟新地区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进行最后决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了必要的准备。

撤离上海

1940年初，我从职委调到江苏省委情报委员会工作，担任情委书记，史永（沙文汉的弟弟）和姚家本两位是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和刘长胜经常到史永家碰头，商议工作。史永的妻子田菊英做些机关工作。当时曾在这个系统工作的，记得还有张心宜（较早撤退到根据地）、柯执之、赵铮兄弟二人、郑振华、王大超、吴复培、黄征凤、袁锬田、张纪元、张于良、朱文蔚、梁万程等同志。在这段时间里，同志们对打入敌伪内部了解敌伪情况，保卫党的组织，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

海租界，上海完全被日伪所统治，环境险恶。日本统治者不允许有任何团体活动，不准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日本特务和宪兵机关千方百计要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他们秘密地开黑名单，把抗战初期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抗日积极分子作为逮捕对象。中央为了保护白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撤到根据地去工作。区委以上的负责干部都要撤退。省委所属的上海、南京等各地党组织，留下部分负责干部就地坚持，采取分散的、个别联系的办法进行活动。群众工作采取“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式，隐蔽在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党依靠群众，创造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冲破了敌人的各种限制与禁令，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建立了多种社会化的组织。“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经验广泛运用，使我党能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活动，党和群众更加紧密联系。

当时我在上海的掩护身份是一家银行的职员。1942年8月。刘长胜通知我，组织上调我到根据地去，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随后都要去根据地。要我到了根据地，先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所在地(义庄)附近的交通站，做上海撤退同志的接待和审查工作，然后再到江苏省委的训练班集中。9月，我由交通员周晓华和戚原护送去根据地。

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在离汉涧附近15里的义庄，离区党委机关所在地很近。交通站由杨秉超负责，上海的交通联络点都设在这里。我到时候，石榴(即石志昂同志，解放初期曾随周总理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飞机上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牺牲)已先到了。他负责接待事务，我负责干部审查。田辛同志于10月也来根据地，负责交通。

我们的交通联络点设在区党委交通站，一间草房，里面有两个炕床，上面铺草。我和石榴各睡一床，上海的同志来了，我们就让给新来的同志睡，我们铺一点草，睡在泥地上。但是许多新来的同志一定要我们睡在床上，他们自己睡地上。记得有一次来了两位女同志——吴涤苍和陈永箴，她们嘻嘻哈哈，高兴得不得了，硬是要睡在地上。因为我和石榴是先到的，学会了一些抗日歌曲，来的同志都要我们教歌。淮南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驻地。部队一部分在津浦路西，一部分在路东。当时就学唱《路东人民之歌》，还有《新四军军歌》。物质条件很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亲如家人。到了根据地，的确像到了娘家一样，特别是石榴负责接待工作，积极热情，和蔼可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在交通联络站，大约有两个多月时间，前后接待和审查干部百余人，大部分是区以上干部。经过了解，报江苏省委领导批准后，送到江苏省委举办训练班的地方——盱眙县顾家圩子。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因为在上海已经暴露，不能回去，就介绍给淮南区党委分配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和少数非党积极分子，就在当地分配工作。区党委和二师都很欢迎从上海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是工人，有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根据地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人才。我们在淮南，得到区党委刘顺元、李亚农和行政公署方毅、汪道涵等很多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输送干部和根据地需要的物资。

1942年10月，刘长胜由戚原和舒忻两位交通员护送来根据地。11月，刘晓、王尧山、赵先和张本，还有潘汉年、

何莘都来到根据地。

12月，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区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已运送完了。我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到顾家圩子集中，设在总联抗的交通联络站就告结束。1943年初又重新派回敌占区工作。

顾家圩子——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

江苏省委所在的地属于淮南抗日根据地，也是新四军第二师的驻地。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华中局领导机关也在这里。华中局决定江苏省委驻在新四军军部西北20多里的泥沛湾，附近有个大庄子叫顾家圩子，作为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地点。铜城镇在顾家圩子东北20多里，是边区的一个贸易中心，离敌人占领的天长县城45里。顾家圩子是一个较大地主的庄屋，地主已跑掉，主要房子有两进，都是平房。一进较大的房子旁边有两个碉堡式的炮楼，里面有三五间房子，由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原来搞机要工作的干部居住。另一进在东边，正屋有三四间，地主的儿子和媳妇住在正间，一部分女干部住在他们的堂屋里，另外有一部分搞秘书、后勤等工作的干部，住在过道旁的一间房里。此外，还有偏屋两间，有老百姓住着。屋子旁边有个打谷场，场边搭了几间茅草屋子。警卫班的战士住着，有一间是交通员住的，里面还有一架手摇电话机。还有一部分干部分散住在附近的一些小庄子里。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一共有五位。刘晓是书记，刘长胜是副书记，刘宁一负责工人工作，王尧山是组织部长，张登（即

沙文汉)是宣传部长，他们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在白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只知道他们是上级领导。在顾家圩子，上海地下党第一次和这么多的负责干部聚在一起，济济一堂，共有一百几十人。大家对领导很尊重，关系很亲切，称呼很随便，叫老刘、老王的。领导中有“三刘”，背后大家亲切地叫刘晓为“老刘”，长胜为“胖刘”，宁一为“瘦刘”。

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总的由刘晓负责，组织工作由王尧山负责。文化界的关键夫担任秘书，老关的妻子赵佩珍担任后勤事务工作。吴涤苍(又名吴泽均)和应仁珍负责医务工作，大家叫吴涤苍为吴医生。华中局很关心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的安全，派了一个警卫班做保卫工作，给江苏省委领导同志都配备了警卫员，还派了通讯员。有位连长负责领导警卫工作，同时又为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当军事训练的教练。

干部训练班分四个支部。一个支部是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工作人员，一个支部是学生界的干部，一个支部是工人界的干部，还有一个支部是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干部。学生界的同志比较多。王尧山兼一个支部的书记，老关同志也是一个支部的书记，我是工人界的支部书记。

干部训练班从1942年8月开始集中。参加的有一百几十人。12月正式开学，到1943年春节后，大约二三月间结束。谭震林、张云逸、方毅、刘顺元等同志来做过报告，饶漱石也到过顾家圩子。开学时召开全体大会，由刘晓做动员报告，要求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工作。学

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三篇文章，还有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边学习，边总结，每个干部根据本身工作的实践，总结抗战以来的主要经验。如关键夫、梅益等同志总结文化界工作的经验，工人、职员、学生界的同志都分别总结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江苏省委很强调组织大规模群众团体的工作，作为专题来总结。我被指定写大团体工作的经验，陈一鸣也写了学生界方面大团体的工作经验。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党刊《党的生活》上，用“李却”的笔名写过群众团体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干部训练班里，又根据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中法校友联谊会、洋行华员俱乐部等工作实践，进一步总结了经验。这些总结材料都由城工部刘长胜保存。1945年8月刘长胜重新回上海工作时，交给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收存。

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每天一早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上早操、跑步、步枪射击、掷手榴弹。晚上要轮流站岗值班，练习夜行军。还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那段火热的生活令人难忘。

一个多月后传来消息说，日军要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要精兵简政，准备反“扫荡”，部队紧张动员进行游击战，军政机关一律分散，训练班、学校都要暂时停办。这个消息一来，引起了不少思想波动。江苏省委又进行了动员。说明当前形势和根据地的战斗部署，华中局为了白区干部的安全，要求分散地返回敌占区去，配合根据地斗争，坚持敌

占城市工作。江苏省委讨论决定，大部分可以回到敌占区去的一律都回去，一小部分留在华中局建立城市工作部，领导原来江苏省委所属范围的城市工作，另一小部分在根据地分配工作。交通员紧张地、分批地护送 100 多位干部返回上海及其他敌占区的大、中城市。这个工作持续了个把月，到 1943 年二三月间才告结束。

华中局城工部——新四军调查研究室

1943 年三四月间，华中局正式成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部长刘晓，副部长刘长胜，我留下担任秘书兼干部科长。为了与敌占区联系及护送干部来往根据地，专门成立了交通科，由田辛任科长，前后担任过交通员工作的约四五十人。陈一鸣，吴学谦、马飞海、陈慎言都在内部担任研究工作，陈浩负责后勤工作。在我们机关附近还有政策研究室，陈同生、李代耕、贺希明、陈穆和张逸城等同志曾在那里工作。

当时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邓逸凡为政治部秘书长，钱俊瑞为宣教部长。另有华中局联络部设在小王庄，部长是潘汉年，副部长是徐雪寒，不久潘调往延安参加整风。范长江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于毅夫任副社长。后刘晓、刘宁一分别率领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张登调淮南区党委担任宣传部长，闵廉调淮南区党委任宣传部副部长，王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

留在城工部的同志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各有分工，吴学谦分工敌伪文化方面的研究，陈一鸣分工敌伪青少年问题

的研究，我除照顾全面外，分工做关于敌伪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经常根据敌伪报刊和与组织来根据地学习的同志座谈，综合情况，加以研究，提供刘长胜参考。长胜经常阅读情况，并加以指导。陈毅未去延安之前，经常来城工部做报告，向同志们讲述形势及党的历史，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具体。谈笑风生，同志们最爱听，认为是最生动的最活的马列主义课。当时在城工部工作的同志经常有机会去华中局听报告。作报告的都是到华中局来汇报工作或开会的各地负责同志。如谭震林、粟裕、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李一氓等同志。这些报告使我们大开眼界，了解我党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具体情况，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的信心。梁国斌、胡立教等同志也经常来我部，粟裕、叶飞、张鼎丞、江渭清等在华中局开会期间。也来我部探望过刘长胜。我们在城工部通过调查研究的实践，进一步理解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的重大意义，认识到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上海地下党的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要对周围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这项工作更在全党普遍化了。

华中局城工部实际上是领导江苏、上海敌占区工作的机关。当时主要抓住两项工作：一项是整风学习，培养干部，经常分批调敌占区的党员及少数党外积极分子来根据地学习。另一项是派干部去敌占区了解工作情况，或不定期地找各部门负责干部来城工部汇报工作。为此，敌占区干部进出

根据地的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的三年中，约有2000人次。所以做好交通工作，保证根据地和敌占区的联系，输送干部和物资，是非常重要的。经过部里研究，在已有交通线的基础上，派干部在根据地周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面开辟交通线，在边区附近敌人城镇里设立交通站。田辛和周晓华都派出去了解情况，开辟交通路线，我和吴学谦、陈慎言等都曾到边区仪征、扬州、六合一带进行了解，根据地党政机关和贸易机构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所以我们经常说，有了根据地，敌占区的工作条件就有利得多，根据地和新四军是上海地下党的有力靠山。

交通路线主要有浦口、六合、明光、嘉山、管店、仪征、瓜洲、扬州等几条线，仪征和六合两条线用得比较多，远一点的如洪泽湖边也设过交通联络点，姚天佑驻在那里，后来因用得不多，就撤掉了。先是吴学谦和钟沛璋，后来是陈慎言和刘衡嘉驻在仪征、扬州，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给了很多帮助。俞敦华驻在六合、竹镇，陈先给我们很多帮助。邵健和刘进在明光摆了一个布摊，专门为警察系统党内使用。前后当过交通员的同志很多，工人、职员、教员、学生、警察等系统以及南京等地都分别有交通，在根据地由田辛领导，在上海由钱作荪领导。交通员有周晓华、高骏等30多位同志。他们大都安全及时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交通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2年开始的我党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教育运动。是对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对于上海地下党来说，也是意义深远，极为重要。开始，我只是把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反复学习，并且抄写后秘密送至上海及南京等地各级党组织进行学习。随着延安及新四军根据地整风运动的逐步开展，城工部的干部一面参加新四军直属队的在职干部整风，一面根据秘密工作的特点制定计划，对地下党的干部分批分期地进行短期轮训，结合汇报工作开展整风学习。同时将少数干部调到华中党校参加整风。

在整风运动中，我们认真总结了这段时间的城市工作经验：（1）把城市的基本群众主要是产业工人、职员、店员、教师、学生、城市贫民，以及郊区农民等，最广泛地组织在党的周围。把职工运动同学生运动结合起来，把职工运动同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合法的与非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条件和原有的各种组织，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广泛地组织群众。（2）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社会名流，以及各种不愿当汉奸，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华侨等都团结起来。形成包括各阶层的极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敌伪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同时掩护和协助下层群众活动的继续开展。（3）打入敌人心脏，在伪军、伪警、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都要进行广泛而稳妥的工作，以便时机成熟，可以策动起义反正，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城市。（三）华中局城工部的三年，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战略意义，进一步把根据地当作城市工作的依

靠，使城市地下斗争密切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我们建立了同根据地密切联系的交通网，动员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同时输送药品、器材和各种物资支援根据地，在根据地训练干部，培养干部。我们的城市秘密工作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与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密切结合的。

回上海准备武装起义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西方反希特勒战争已取得重大进展，侵华日军势成强弩之末，我军反攻决胜之日即将来临。同年6月6日，中央再次发布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就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的责任来”，“又一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夺取伪军伪警的武器，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从农村工作为主转到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并重，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转到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党中央不仅决定了方针政策，而且对计划组织、工作方向、工作方法，以及领导与干部的配备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城工部的工作立即转到了紧张战斗的阶段。首先是组织干部学习中央指示，提高思想认识，制定计划，坚决贯彻。并决定立即向地下党各级组织传达中央决定，号召认真学习，掌握文件的精神，组织力量，切实执行任务。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分批调来根据地学习，拟定各自的宣传和组织计划。当时华中局党刊《真理》有一期专门刊载城工部撰写的有关文章，传达中央精神，号召广大群众迅速组织地下军，准备与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城市。刘长胜、陈一鸣和我分别写了关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职员运动的文章。在《新华论坛》刊物上，我曾用“万人”的笔名写过关于敌占区职工运动的文章。刘长胜还以华中区职工运动筹备会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敌占区的职工群众，组织地下军，配合新四军，夺取华中地区的大中小城市。

职工方面，特别是工人方面，专门派干部和积极分子来根据地学习，进行军事(包括巷战)训练。经过短期学习以后，即派回上海等地组织地下军。有些干部如周晓华、高骏、孙明、刘志荣、毛良等都派回上海，负责组织和领导地下军的工作。为此，又加强了交通工作，派舒忻去刘家集，以后在汉润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后来为了适应大批干部和群众来往根据地的需要，刘家集联络站由仲伟、陈思同志负责，汉润接待站由俞敦华夫妇负责。

中央明确指出：“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在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当时我们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又组织了五六十个在

工人、苦力中有联系，甚至与流氓组织有关系的同志，来根据地学习，然后派回去工作。

伪军、伪警是上海策反工作的一个重点。邵健、刘峰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采取“兄弟会”“读书会”“互助会”等分散的“灰色的”组织方式，团结争取了部分伪警，成为必要时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支力量。在南京，对伪军进行策反也是个重点，通过党组织的部署，有些同志打入伪军内部，1945年六七月间，伪军钟剑魂部和伪警卫第三师先后起义，伪中央军校也有一部分人员投奔根据地，由田辛负责接待。

在这个时期，又派遣干部加强了沪宁线的交通工作。1944年11月，南京刘峰、朱启銮来城工部汇报工作，并接受准备起义的任务。为了加强南京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成立南京市工委，由刘峰任书记，除朱启銮参加外，又增派陈慎言和彭原为委员，统一领导南京市的工作。南京的工作，1940年至1944年，可以说是开辟时期，市工委成立后是个发展时期，在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陈良、吴良杰和马卓然、马文林等同志都是在差不多时期派去南京工作的。在苏州、昆山方面，派了屠基运、屠传泗、吴耐、潘劳和汪德基去工作，由屠基运担任苏州县委书记，利用有些同志在敌伪机关中的社会地位，找到职业掩护开展工作。

1945年还有一件事需要写一下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转来电报，要我们把长期坐牢后由汪伪“特赦”释放的姜维新接来根据地。姜维新1925年入党，参加过宴“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搞过红色

恐怖团即“打狗队”的工作，也做过党中央的保卫工作。1931年姜维新第5次被捕，受尽拷打、电刑，初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1945年大赦时出狱。我们按周恩来的指示，派干部到上海把姜维新接来城工部。他因长期坐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长胜同志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期。但不到半个月。日本投降，他也很快被派回上海。恩来同志对15年前领导过的一位工人同志记得这样牢，连姜在提篮桥监狱中的号码都记得清清楚楚，使我们深深感到恩来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1945年8月8日，延安电台发表电讯，公布苏联对日宣战。这天晚上，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机关的首长都彻夜未眠。9日。天还未亮，华中局通知刘长胜和我去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饶漱石，参加的有曾山、刘长胜和我（记得还有张执一）。饶传达了中央电报指示，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华中地区大中城市，准备进攻上海。命令城工部所有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由刘长胜任书记，委员有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未到职）和陈祥生（此人后来在浙东被捕后叛变）。

刘长胜和我回到城工部后，随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决定我和张执一立即出发回上海。当天，我由赵茅兴和曹达护送，从根据地出发，经过瓜洲到镇江，再从镇江乘火车于8月11日到达上海。华中局城工部三年的战斗生活告一段落。我又重新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赖传珠领导下的参谋处二科

王征明

1941年7月，日伪军2万余人对我军部所在地盐阜区进行“扫荡”，1942年11月，日伪军7000多人，向我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1943年2月7日，日军1500余人，在伪军配合下复向我盐阜区发动大“扫荡”。由于陈毅军长的英明预见，作好了准备，已于1942年12月25日由阜宁县的停翅港主动地实行战略转移，迁驻到盱眙县的黄花塘。

淮南根据地地处丘陵山区，比较贫瘠，但这里开创较早，二师师部、五旅旅部长期驻扎一地，从事军事和生产，军民团结，民主政权受到人民拥护，较之游击区多了一份平静。但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来都是敌人搜寻围歼的目标。如何保卫中共中央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指挥机关的安全，为我华中党和军队的指挥中枢站岗放哨，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就成为军参二科当时的首要任务。

军参二科1943年驻扎黄花塘东南的李家岗，1944年2月16日移驻顾家圩子。下设谍报股和部队侦察股、直属间谍班、侦察队和电台分队，尚有机要、会计、管理人员和炊事班。二科科长马步英，江西省景德镇人，早年从军孙中山的大本营，参加过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追随方志敏、邵式平开辟赣东北根据地，任闽赣军区侦察科科长。抗日战争初期任军部侦察参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侦察科科长，在黄桥决战中，因及时了解韩德勤及李守维部来犯

之敌的情况，有力地配合作战，建立功绩，深得陈毅和粟裕两位司令的信任，他是重建盐城新四军军部参二科的首任科长。

1943年至1944年，司令部参谋处的4个科的工作均由赖传珠参谋长直接领导。参谋长对二科的工作抓得很紧，几乎每周或10天左右都要向他汇报一次工作。由他对请示的问题逐一解答，更多的则是他利用这个机会，耳提面命，对二科工作的各个方面作出指示。参谋长诲人不倦，善于寓教育于会议之中，从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部署要求，到组织力量使用干部，以至于工作的方式方法、领导作风等等都谈得相当透彻，有虚有实，有理论有思想，有布置有检查，有表扬有批评，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

参谋长对于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军侵略军为保守军事秘密，从不暴露其真实番号，有时只用××部队代替（如南京之敌为荣字1926部队，祭字8726部队，上海为登字部队）。参谋长对侦查日军番号抓得很紧，穷究到底。他经常提醒我们，情报人员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告诫我们敌区工作必须严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他特别重视从政治上关心干部的培养教育，教育二科干部要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坚持立场，不被腐蚀。他不仅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整风文件，学习党刊《真理》和毛主席的著作，他本人也请对国学造诣很深的叶芳炎（章太炎的高足）个别地为他补习文化的。

赖参谋长不过三十二三岁，他生得仪表英武，身材魁伟，

两目炯炯有神，一口南方官话，声音宏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成长为领导军队工作的全面人才。在为参谋处主编的《战情汇编》（至1945年已出刊9期）撰写的发刊词上，可以看到他运用辩证法于军事的精辟论述。他精通参谋业务，强调工作效率，既雷厉风行，又细致入微。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的谈话具有针对性，语言生动简洁，富有条理，善于用生动的事例启迪你去深思。例如他那时就给我讲，我们党的军事家有两类，一类是经过正规军事院校学习深造的，他举出曾去苏联学习的肖劲光为例。一类则完全是从国内革命战争，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他举出粟裕为例。1944年1月在黄花塘召开的参谋会议上，在讲到参谋要辅佐领导抓关键环节时，他举例说：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毛主席下达作战手谕，他亲自派遣通讯员送出，向通讯员当面交代，这封信务必送到，因为这封重要的信件能否到达前线指挥员手里，对于这一战役的成败具有决定的作用。

在黄花塘期间，参二科同志同其他军直属机关一样，大部分时间参加整风学习，在思想觉悟、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一次跃进。同时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了种菜，在驻地附近，开荒种植。一畦畦绿色的菜田，青菜、萝卜、黄瓜、扁豆长势喜人，尤其是西红柿，本领大的能手精心培育，更是果实累累。在培养阶级意识、增强劳动锻炼方面均有所提高。在业务工作上，先后举办4次小型的谍报干部训练班。其中本科二部轮训两次，还给淮南路东军分区和四师的谍报干部各举办一次。训练班设在李家岗村南首的一座草房里，学员在地上打通铺睡觉，白天整理好内务，教员来上课，学员多席

地而坐。谍训班指定学习文件，自学为主，结合每个人自己工作的检查、回顾、总结、提高。请军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讲过课，如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科长顾前、参谋处教育科长冯隆、华中局组织部干部科长朱翊等。钱俊瑞应邀给我们讲授“中国党派问题”，从中国社会各阶级讲起，继而讲国民党历史的各个阶段、国民党内各派、以及中国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和地方重要人物，他的课对大家教育很大。

参二科的干部，不论是参谋、谍报人员或侦察员政治素质均比较好，具有献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淮南敌后的斗争环境，生活相当艰苦，住的是民家让出来的茅舍土屋，伙食标准每人每日5钱油(16两1斤的小两)，5钱盐，1斤蔬菜，3斤烧草。日常吃的是大锅熬青菜，难得看见点肉，逢年过节，才利用伙食结余共同会餐，打打牙祭。侦察员在边沿区活动，穿一身由被服厂裁制的黑色便衣裤，这种化装是很不高明的。交通工具连自行车也很少。可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成年默默地奔波着。在执行任务中，经常会遇到种种危险，明光情报站1944年遭敌袭击，站长李公园英勇牺牲。唐中吾亦曾遭顽固派的殴打，可是他们没有被打倒，大家始终顽强地战斗在最前哨。

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北靠洪泽湖，南傍长江，西有津浦铁路，东有运河。从中心区到边沿半径不过15里，西面的蚌埠、明光和东南的扬州守军，分别属于日军不同的师团和混成旅团，我军部驻地巧妙地选择和利用了敌人的接合部。但是这里毗邻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精卫伪政权的首都南京，而且日军装备精良，行动快速。1943年8月30日，敌机在黄花塘一带上空盘旋数十次。面对敌情和斗争

的需要，为争取先机之利，二科对军事情报工作作了以下部署，即在淮南根据地的东南西北，建立了扬州(亦称东南)、来六(来安和六合)、滁县(亦称浦六，即浦口和六合)和明光4个情报站，除来六站外，其他三个情报站均配备电台，日夜与军参二科直接通报。此外，还经常对盱眙和天长派出流动侦察。

情报站针对主要敌情方向，建立军事情报和通讯网络，布建情报网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把外线监视工作建好。以扬州情报站为例，扬州最重要的四条交通线，镇扬公路、扬泰公路、扬六公路和运河，我们均建立了监视哨(爱国医生郑宏钰和爱人王文筠，印刷厂工人许宏泉及其父亲等)，搜集公路上敌军调动运输的情况，逐日记录、密写。一般情况下，三五日向情报站送一次情报，重要情况当日送出。我滁县情报站发展爱国铁路职工监视津浦路南北军运情况，同样能够做到准确及时。

郑宏钰不久通过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上尉军医的友人赵叔平的关系，取得了少校军医的身份，继而在敌人内部搜集情报。此外，扬州情报站同我地方武装紧密配合，有打有拉，争取了瓜洲伪自卫团长王鸿儒，从而打开了淮南与镇江的南北交通线。王鸿儒向我提供情报也完成得不错。

情报站依靠我边沿区人民群众的帮助进行活动，吃住都在群众家里，特别是电台同后方通报，架天线、摇马达，目标声音都很大。我曾到过天长杨家庙附近，扬州情报站住的两处房东家，他们留给我热情友好的印象，令我至今难忘。

驻扬州的汪伪第二方面军中将副司令颜秀五，苏北灌云人，和我江高宝地委书记惠浴宇有同乡之谊。颜所属队，经

常侵犯我区，深为群众痛恨，称之为“黄老虎”。惠曾代表我方对颜做过工作。为加强对扬州敌伪活动的情报控制，我同马步英科长商量，建议争取颜秀五向我提供扬州日伪军的动态情报，报告赖参谋长、陈军长，获得同意，决定由我前往与之接触。我化装前往高邮，找到十八旅敌工科长谢镇军，说明来由。谢为我打通关系，进入了颜秀五公馆。我在颜处待了五六天，对他晓明大义，他同意合作，彼此约定了联络办法。返部后向赖参谋长和陈军长作了汇报。陈军长决定由淮南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成钧，政委陈光）负责与之联系。

我任六师师部侦察科长时，通过六师军医张贤和上海同济医院护士朱萍的介绍，发展上海吴淞医院医生徐国璋为我作情报工作，安排在上海的情报员张馥辛与之联系。1943年，我调军参二科后恢复了同他们的联系。1944年夏召张馥辛、胡绥之（扬州的情报员）、徐国璋三人到淮南汇报工作。时徐国璋已设法与人合资在吴淞开设“一德药房”为掩护。徐被任为吴淞情报组组长，陆续吸收有黄春澜（女）、蒋炳强（一德药房职工）、陈达（女）、陆亚雄（陈坤全）、孙宇苍（关松）等。黄春澜等主要利用其家住址——外马路101号（对门即为日驻军吴淞的宪兵队），密切监视吴淞口日本军舰的进出，逐一详细记载。一条从吴淞—上海—扬州—淮南（路）东南情报站（宣铎）的情报网络开始形成。

在赖参谋长正确领导下，综观1943年至1945年8月，这一段时间参二科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简言之：

（一）完成了保卫军部的任务，保证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领导机关能够及时而比较有把握地掌握周围敌情。对于日伪军的重大动向，能够及时发现和控制，从而能够安定

地正常地进行工作。这同二科侦察情报人员在无形战线上的辛勤劳动、执勤，从无中断地埋头工作是分不开的。

1945年2月，正当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欢度春节之际，日伪军根据情报知悉驻守军部附近二师主力已开赴津浦路西，淮阴、宝应、高邮等地之敌便乘机大举向淮南进犯，妄图围歼黄花塘军部。二科及时掌握敌军动向，上报军部，军首长急电十八旅，胜利地组织了顺河集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二）二科不仅是军部的耳目，在战争年代敌我尖锐对立的形势下，还是我军能够随时伸向敌区的一只手，协助执行一些特定任务。如协助军司令部搜集敌伪报纸书刊，协助卫生部门采购西药（奎宁、痘苗等），协助供经部门采购军用物资（电池、布匹、军工原料如铜皮等），接送去敌区的干部与敌方投诚人员等，如卫生部科长薛和回南京家里生孩子，就是浦六站王济普安排送出的。

（三）提供盟军情报，轰炸上海吴淞港日军设施。1945年2月，二科将吴淞组提供的情报，报延安中央军委转“请盟军轰炸”（见王征明现存笔记本2月22日原记录）。随后美制B29重轰炸机，屡次轰炸上海江湾机场、炮台湾兵营、吴淞港湾及吴淞沿江两岸的战略基地。大大振奋了敌占区人民，增强了反攻胜利的信心，赖参谋长对吴淞组的工作曾深表嘉许。

（四）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率参二科干部方明、戴铭佑等进入上海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配合和帮助他们做了不少工作。上海日本联络机关羯石大佐，日本投降时主动找关系同我们联络，羯石自称

“日共党员”，我曾到虹口其住所同他见过面。他答应协助我们接管上海的日本军火工厂，旋因形势变化未成，又介绍8名日本军火工人给我们。我派小交通员唐路送他们回淮南，历尽艰险将他们安全地送抵二科转往供给部，颇受军工部门的欢迎。日本投降前，原在南京敌伪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的日本文人秦一郎（出身日本贵族），要求投奔我根据地，我派人把他送往淮南参二科，秦一郎曾给扬州日本司令官修书劝降，但未成功。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军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北移山东和山东军区合并，同时成立华中苏皖军区。参二科干部根据上级指示一分为二，马步英率一部分编为华中苏皖军区参二科，我率另一部分北上，并入山东军区情报处，重新开始了新的征程。

记黄花塘华中兵工生产会议

王统仪

1944年9月20日至10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盱眙县黄花塘召开华中兵工生产会议。副军长张云逸、军参谋长赖传珠主持会议。一师军工部部长程望，二师军工部部长王新民，三师军工部副部长田汝孚及姚大伦，四师军工部副部长李仲麟及徐根宝、陈峰，六师军实科的程铿、岳异、朱兆衍，浙东游击纵队军工股的朱连根、蔡松安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各师、旅军工部门的代表，详细汇报了各自军工生产的规模、产品产量、存在问题、经验教训及今后打算等。会上还举办了各师生产的武器弹药的展览，并作各类武器实弹射击表演。赖传珠参谋长作会议总结报告，他在总结讲话中阐述了新四军军工生产的历史过程、重大成就和经验教训，部署和动员加快生产步伐，研制和生产攻坚武器弹药，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反攻作战的需要。会议强调全军各级领导要更加关心和重视军工建议：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充实和加强军工部门的力量，各师军工部门要成立生产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以解决生产试制中的质量问题和技术难关。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还就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党的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军部直属的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就军工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工会工作讲了话。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新四军各师旅从1941年1月到1944年8月，共生产刺刀8万多把，地雷1万多个，手榴弹100多万枚，复装子弹100多万发，掷弹筒300多具，掷弹筒弹2300多发。迫击炮弹数万发。应该说，这些武器弹药在对敌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很多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但是，这些武器弹药

的性能都比较落后，杀伤力不是很大，有时也会延误战斗的胜利。另外这些武器的弹药在数量上还远远不能满足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需要。再就是遇到敌人顽抗、敌人工事坚固、碉堡林立的情况时，这些武器的攻坚性能显得不够。因此，进一步扩大生产数量、研制具有攻坚能力的新式武器便成为当时情况下的迫切要求。新四军各军工生产单位，长期分散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广大的华中根据地内，各自为战，很少有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交流各师、各旅军工生产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也是召开华中兵工生产会议的重要原因。

黄花塘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工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会议之后，各部队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加强了对军工部门的组织领导，充实了军工部门力量。特别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招聘了一批技术骨干，放手使用，委以重任。工厂迅速掀起生产竞赛的热潮，生产记录不断刷新，各类攻坚型武器先后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这些武器的问世，为抗日战争的大反攻作战，为华中战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黄花塘会议闭会到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时间内，新四军各兵工厂共研制生产 52 毫米迫击炮 470 门，60 毫米、62 毫米迫击炮 209 门，68 毫米迫击炮 10 门，73 毫米迫击炮 70 门，37 毫米、45 毫米线膛平射炮 70 余门，75 毫米滑膛平射炮 12 门，各类迫击炮弹 30 多万发，平射炮弹 1 万多发。此外还研制成功枪榴筒 2000 多具，枪榴弹 20 多万发。这些重型、攻坚型武器的研制成功和批量生产，为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军部整风中的风波

罗英才

194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逐步开展整风运动。饶漱石说，学了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很受教育和启发，要到部队去搞调查研究，要治病出院不久的陈毅主持整风运动。随后他即去了二师。

在皖南时，饶漱石没有军职，在党内是东南分局副书记的职务，平时主要做军地政治工作，常以梁朴、小姚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陈毅与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彼此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饶漱石到盐城后，考虑到中央已任命邓子恢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无须人代理，便分配他负责对皖南突围干部的审查工作，直到这年7月邓子恢调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后，他才接任军政治部主任一职。

应该说，陈毅对饶漱石来新四军工作的最初印象是相当不错的。饶漱石从来没有军队工作的经历，一开始处处小心翼翼，经常向陈毅请教。自己写的文章、讲话稿也拿给陈毅修改。陈毅也总是耐心地传帮带，从来不见外。

自从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以后，他的言谈举止就有了变化。

5月初，华中局和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领工作组到淮南第二师检查工作。行前，陈毅、饶漱石联名致电新四军各师和各区党委：饶灰（10）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

预计3个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巡视工作回到黄花塘，陈毅从此没有了安生日子。

“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按照统一部署，军部整风运动有条不紊地进行。8月13日，陈毅主持召开有直属队领导、司令部科长和政治部部长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主要是检查工作，征求对分局和军部领导人的意见。会前，陈毅作了动员，要大家发扬民主，消除顾虑，畅所欲言。会上，发言踊跃，提出很多意见。联席会一连开了两天，提的这些意见，对饶漱石的居多，也有对他陈毅的。陈毅要政治部秘书把会上各人的发言汇总整理好，以便日后分送饶漱石和中央军委。

饶漱石回来后，忙着找人谈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一次，他无意中从军部一位养病的曾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等历史问题，他如获至宝。从此，他找人谈话的内容更为明确，要大家揭发陈毅是如何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如何一贯反对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如何排挤党委书记取而代之的。这样找人谈话多了，渐渐给人一种错觉：饶漱石是不是中央派来清算陈毅错误的？陈毅是不是真犯了大错误？于是有人开始远离陈毅，使他想起中央苏区抓AB团期间“鬼都不上门”的那些日子。

恰在这时，潘汉年又一次来到黄花塘。他继续与陈毅来往，指出饶漱石颇不安分，想挤走陈毅。一些干部给中央写

长信，反映军部发生的这桩借故打击军长的怪事，明确表示拥护陈毅、反对饶漱石。后来，潘汉年受他们的委托，把这封信上报党中央。

饶漱石抓住一些事，亲自主持对潘汉年的斗争，并逼他违心地作了检查。

饶漱石终于同陈毅摊牌了。10月16日，新四军军分会变成了对陈毅的斗争会。

陈毅本着整风的精神，在会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了严格解剖。他说：我陈毅的缺点错误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我从来不反毛主席，不反政治委员制度。他承认历史上曾同毛主席吵过架，但那是为了工作，为了建设好工农红军，同反对毛主席风马牛不相及。他一到革命军队就做政治委员，那时叫团指导员，后来叫党代表，他在历史上还当过军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政治委员很有感情。怎么可能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呢？

与会者有的一上来就向陈毅连珠炮似地猛烈开火有的罗列了一大堆问题，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新账，像预先经过演练似的，矛头通通对准他。陈毅控制住了情绪，没有发火。他想，有些人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应该对自己是了解的，不应该人云亦云，对自己放冷箭。他相信将来有一天这些人会明白的。

饶漱石了解陈毅的性格，原本以为陈毅会暴跳如雷，不料陈毅意外地克制和平静。

饶漱石很快做出和解的姿态。他主动找陈毅、潘汉年谈

心，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性子太急。恨不得一天就把新四军的事情办好，没再追究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的事，也没提潘汉年反对他的事，希望这次伤感情的争论到此了结。

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陈毅和潘汉年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搞好团结。陈毅还致电中共中央，检讨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并恳切地表示：“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哪里知道，就在饶漱石向他表示和解的时候，却背着他整理了一份电报，还拉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人一起签名，意在把他从新四军赶走。

这份 1500 字的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说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 20 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和我个人”等等。电报的末尾说：“但愿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一是毛遂自荐，一是要赶走陈毅。

毛泽东没有听一面之辞，他很快给陈、饶作了明确答复：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 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 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

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1943年11月8日

饶漱石很有些失望和纳闷，他本想把陈毅赶走的，来信却叫陈毅去延安参加“七大”，明确无误地说“七大后仍回华中”。

一通百通 无挂无碍

1943年11月25日，陈毅离开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944年3月初才抵达延安。

饶漱石原说派一个连护送陈毅到安全区的，后只派了军部一个作战参谋和一个炊事员护送，而且规定送到淮北第四师驻地为止。

陈毅到达延安后，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离毛泽东的住处不远。

久别重逢，毛泽东对陈毅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姚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

句话也不要提。”

毛泽东又说：“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这指的饶漱石诬告陈毅的那份电报。

陈毅爽快地说：“那我就不看了！”

在延安，陈毅抓紧时间撰写《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一天，他正专心致志地埋头写作，毛泽东的警卫员来叫他：“主席有请！”他记得这天是3月15日，来延安后的第7天。

毛泽东与陈毅寒暄后很快切入正题：“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对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这明明是要陈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陈毅恳切地说：“我就去拟一个电报稿，拟好后请主席审阅发出。”

陈毅给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电报很快拟就。讲到了延安以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教育帮助，并作了自我批评：“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毛泽东审阅了陈毅的电报稿，同时起草了一份给华中局的电报，连同陈毅的电报于3月15日一同发出。

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

属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次日，饶漱石来了回电，颇有“顶”的味道：“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此时，陈毅病倒了。但他哪里躺得住？回想起饶漱石那些话，他就心情烦躁，禁不住翻出饶漱石的电报。越往下读越生气，他再也躺不住了，立刻气呼呼地从床上坐起给毛泽东写信，把满肚子的怨气通通倒了出来。

毛泽东收到陈毅来信以后，很快写了回信：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

毛泽东 4月9日

第二天，毛泽东去看望陈毅。毛泽东对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觉得毛泽东说得在理。想想也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光生气有啥用？他想通了，感冒也很快好了，顿时神清气爽。

由于陈毅放下了包袱，开动了机器，很快出现了惊人变化。这年4月底，《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脱稿，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受到好评。5月中旬，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商定“七大”准备工作，选定陈毅为军事报告起草人，陈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这年11月，陈毅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讲了近来常常思考的一些问题。他说：“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读罢，立即复信一封：

陈毅同志：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12月1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陈毅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23日，中共中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陈毅为12名军委委员之一。

陈毅在黄花塘

张再传

1943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县黄花塘。从此，黄花塘就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同年11月25日，陈毅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和筹备党的“七大”。时间虽不到一年，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难忘的。

对于黄花塘这个地方，陈毅不是很陌生的。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后，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从淮南津浦路西迁到路东，先后驻扎在盱眙县旧铺、半塔一带，指挥着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陈毅任代军长，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黄花塘就是二师师部驻地。

1941年11月，陈毅在指挥淮北程道口战斗胜利后，到淮南视察了第二师师部驻地黄花塘，并同第二师和淮南党政军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和方毅等同志会见。最后，在岗村连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观看了第二师抗敌剧团演出的话剧《最后的命令》。陈毅这次视察，对黄花塘地区有了全面的了解，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

1942年12月25日拂晓前，参谋长赖传珠随第一梯队从阜宁县停翅港先遣出发，经苏咀、顺河集、高良涧，31日到

达观音寺。第四师派人来慰问，二师也派部队前来接应。第二天下午，第一梯队到永丰地区宿营，宣布就地休息，等待二、三梯队到来。第二梯队于1943年1月2日到达观音寺，第三梯队由淮宝县刘头庄快速向淮南进发。

获悉，日伪已开始向盐阜区“扫荡”。

3日，赖传珠写信给陈毅代军长，报告转移后的工作情况。并告胡服（刘少奇）已到延安。陈毅于4日到达盱眙县东阳城，副军长张云逸也同期到达。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周骏鸣到此看望。6日，第三纵队到达盱眙县永丰、东阳一带。

9日，陈毅等接到毛泽东5日发给新四军领导人的指示电，同意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分散计划。并指出，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动员全党全军在最严重的形势下，坚持斗争，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毛泽东的指示，给华中全党全军指明了方向，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10日上午，陈毅等从东阳出发，下午3时到达第二师师部原驻地黄花塘，二师师部迁入大刘郢。

陈毅由于战事频繁，行军劳累，痔疮发作严重脱肛。11日到大刘郢二师卫生部治疗，军部派一个警卫连护送。军供卫部副部长崔义田组织了一个医疗组给陈毅做了手术治疗。手术后，特派在华中医学院学习的第二师卫生部医师丁志辉给陈毅护理。下旬，病情稍有好转就出院回黄花塘军部。出院时，他送给丁志辉一个笔记本，并题词：“努力学习政治，

钻研业务，更好地为伤病员服务。”丁志辉和二师卫生部医务工作者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年一度的春节快要到了，陈毅心里想，几年来春节都没能好好过，今年要痛痛快快地过一个春节。2月4日是农历除夕，当天下午，华中局和军部首长与当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举行团拜。晚饭后，军部首长到各直属单位去拜年，同大家在一起看花灯、讲故事、做游戏，开展各式各样的文艺活动，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密切了官兵、军政和军民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政和军民的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经陈毅等军部领导人批准，3月5日公布了新四军政治部《拥政爱民十大公约》。

3月15日，在二师卫生部休养的陈毅，接到重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指出：蒋介石已令韩德勤、王仲廉东西夹击新四军，企图把新四军消灭于洪泽湖畔。陈毅回到黄花塘的当晚。得知韩德勤部已进入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扣留我地方干部，公然叫嚣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陈毅遂电令四师主力及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和淮海分区部队，全部归彭雪枫师长和邓子恢政委指挥。16日开始行动，17日晚发起攻击，历经15个小时，18日全歼韩总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击毙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歼灭韩顽1000余人，活捉韩德勤，缴获全部武器。19日晨，四师师长彭雪枫找韩德勤谈话，韩提出求见军首长。

21日，四师发电给军部首长。22日，陈毅等研究去四师人选，并致电中共中央，汇报山子头战斗情况。电报发出后，陈毅带病和新华分社社长范长江等夜渡洪泽湖，到达四师师部半城，受到了四师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陈毅在听取了四师的汇报后，根据国内形势，分析了释放韩德勤的有利因素。于是，陈毅分别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提出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为上策，以便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如何，请示。以速为妙。

可是饶漱石等却发来电报说：“我们主张暂不释韩。”陈毅不得不重申释韩的理由。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同日，何应钦与周恩来谈话，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周恩来指出，韩违约到运河西，并向我进攻，捕杀我人员，致引起冲突，不料累及韩本人，后即发还人、枪，礼送韩出境。国民党方面对此也没向我提出任何别的表示。

陈毅根据各方面情况认为，同韩谈话条件均已成熟，决定30日约韩会见。韩一见陈毅高兴异常，笑脸相迎。然后，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战役以及三次被俘的往事。陈毅也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对韩予以开导和批评。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具体事项，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

事后，陈毅派员通知韩德勤，我军将欢送他出境，并还给他部分电台、机枪、士兵和军官，同时给他一些地盘。韩德勤很佩服陈毅的大将风度，并对我党我军的宽大政策表示感谢。

4月1日，韩来回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他饯行。宴后，韩德勤带着还给他的人、枪、电台，在我骑兵队的护送下被礼送出境。当天，韩的代表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

在这次捉放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历史地分析了韩的实力变化情况，全面地考察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果断地作出了决定，实践证明陈毅的决断是正确的。不久以后，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也未敢东进。

4月初，陈毅在彭雪枫、邓子恢和范长江的陪同下，在半城接见了四师第十一旅旅长滕海清等人，对滕旅长说：“活捉了韩德勤，这个胜利不小。韩是江苏省的主席，不可小看。经过商谈已秘密把他放了，这是斗争的策略。我们部队的高级干部不仅要会拿起武器打胜仗，还要学会政治斗争，要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同时，陈毅还到淮北大柳巷视察，赋《大柳巷春游》诗三首，并接见了泗南中学全体师生，勉励他们为抗战建国而教好书、读好书，献身民族解放事业。

9日，陈毅回到黄花塘。不久，他又去二师卫生部休养。

26日，陈毅向华中局和军部报告了对处理韩德勤的问

题，并召开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通报了对韩德勤处理的经过。

日伪在苏南“清乡”失利后，又将矛头转向苏中、浙东等抗日根据地。我上述地区军民在陈毅等指挥下，一一粉碎了日伪军的各项“扫荡”。到1943年底，基本上制止了日伪的“蚕食”和“清乡”，坚持了原有阵地，有的还有发展，使华中斗争形势逐渐好转。

二

1943年初，军部到了黄花塘，由于这里环境比较安定，保障了整风、生产、整训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整风运动是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4月10日，华中局发出整风学习指示：决定把整风学习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在整风学习中。陈毅联系思想实际，经常给军直机关作辅导报告。6月15日。陈毅在讲解毛主席的重要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时，讲得有声有色。就这篇文章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这一段话，他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受益非浅。

陈毅在整风中善于联系思想，坦率、诚恳地讲述了自己革命道路上曾犯过的错误及其教训，启发大家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

陈毅对受批评、受审查的同志也很关心。主动找他们谈话，提出劝告。他指出：在整风中，组织上对同志的批评、

审查是必要的。有些人犯了错误，受到了批评，就垂头丧气，怪这怪那，甚至政治上动摇，这很危险。跌倒了应该赶快爬起来，要经得起考验。

同年秋，军部整风进入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陈毅根据大家在时事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在军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学习的意见》和《应付时局与整风》等学习笔记，并主动作了自我批评，给大家启发和教育很大。大家决心以陈毅为榜样，把整风运动推向高潮。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召开座谈会，陈毅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上有几个同志发表了意见。饶漱石在此却乘机打击、排挤陈毅，他将陈毅平时工作中的一些意见分歧无限上纲，罗列了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破坏党的团结和个人主义严重等十大错误，使华中局和军部某些高级干部一时受蒙蔽。

会后，饶漱石写了1500字的电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

首先，挑拨陈毅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了陈毅的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军部工作。饶漱石不仅以他个人名义发电报给党中央负责人，还鼓动了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中央也同时收到了陈毅的电报，简单陈述了事情经过，着重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毛泽东11月8日回复，同意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筹备党的“七大”。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交待了工作，并同饶漱

石交换了意见，准备启程赴延安。临行时写了《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五言诗一首：“战斗相依久，初别意怆然。长记叮咛语，早去复早还。知我二三子，情亲转无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时局纵谈罢，举酒祝长征。明朝策骏马，萧瑟唯此心。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行行过太行，迢迢赴延安。细细问故旧，星星数鬓斑。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诗中抒发了他对华中的无限留恋之情，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中央的无限信赖。11月25日，陈毅告别了妻儿离开黄花塘，经四师去延安。副军长张云逸特在四师迎送。陈毅一路在我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走了近百日，行程数千里，于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华中局书记。陈毅不计前嫌，与饶漱石共同担负起华中党和军队领导的重任，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三

陈毅在黄花塘前前后后只有11个多月时间，但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43年初军部刚到黄花塘时，正值春荒，群众生活都很困难。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军部号召大家开展生产运动。驻在大王庄的政治部机关带头开荒种菜，而菜地就在军部到政治部的路边，大家每天都要到菜地里劳动。新华分社社长范长江不仅带头劳动，还经常给大家做宣传鼓

动，带领大家唱《南泥湾》等革命歌曲。敌工部部长刘贯一还给大家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丑闻，对大家进行形势和对比教育。

陈毅经常到大王庄来听听新闻，讲讲故事，下下围棋。他路过政治部菜地时，总是笑眯眯地对大家点头致意。有时还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边走边说：政治部的同志干得好，祝你们大丰收！大家回答说：感谢首长鼓励。以后，大家的劳动干劲更大了。

陈毅在黄花塘时间虽然不长，大家提到他总是由衷的佩服。他工作不仅有魄力，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代号叫“四中队”的一个单位驻在双庙，这个单位是专为收译敌人电报的机要部门，开始没有单位名称。陈毅有一次到这里视察，大家问这个单位叫什么名称好。陈毅沉思了一下说：为了对外保密，我给它起个名字叫“调查研究室”，你们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从此，“调查研究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刚建立的“调查研究室”，派去工作的一些同志对这个单位的性质任务不了解，有的人工作不大安心，说在这里工作不自由，机械死板。陈毅知道后，来到这里和大家谈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说：“我原来是学化学的，后来服从革命需要，拿起钢板、蜡纸搞文印工作，这更不自由了，但这是革命的需要……”一番通俗生动的话，对大家教育很深。以后，再也没有人说在这里工作不自由了，大家热心于党的机要工作。

陈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华中抗日根据地技术人才非常缺乏，他通过上海地下党引进了一批又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来到黄花塘地区创办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和华中军医学校，还有的人被分配在要害部门和科研单位。陈毅对国际友人到华中帮助抗日更为关切。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1941年初从上海来到华中新四军军部工作，1943年初他随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当时这里生活条件很艰苦，陈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交待供卫部在生活上多照顾一点，罗生特知道后婉言谢绝，并表示要好好工作，为中国人民服务。1943年春，陈毅和钱俊瑞根据罗生特的要求和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6月，军部决定送罗生特去延安总部工作，一行6人离开黄花塘北上。途经四师师部半城，受师长彭雪枫邀请留下帮助工作。9月，他根据陈毅紧急电报通知，要他日夜兼程赶往山东军区驻地滨海为罗荣桓司令员治病，后留在山东工作。

陈毅在黄花塘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由陈毅亲自编辑和审定的《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的出版。《纪念册》是陈毅在1942年上半年决定做的，他说：“抗战已经快6年了，我们新四军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浴血奋战，大量杀伤敌寇，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许多干部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造谣诬蔑，骂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逆党’‘逆军’。出版一本新四军抗日殉国先烈的纪念读物，来宣扬我军参加抗战的辉煌成绩，宣扬

先烈们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揭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编写《纪念册》工作当时交待给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志诚负责。由于战事频繁，资料不足，在盐阜没有完成。

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后，陈毅又指示刘志诚继续搜集资料，充实内容。他还亲自介绍和撰写烈士事迹，指导编写工作。

刘志诚经过资料查阅和多方调查，把抗战6年牺牲的新四军团以上干部名单汇总后，陈毅作了最后文字修饰。

10月间，陈毅去延安之前，对《纪念册》最后审查定稿。他还亲笔写了封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十个大字。全书目录分为四个部分：一、题字。由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曾山等分别题了字。二、陈毅、饶漱石分别作序。三、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四、本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文汇。共37篇纪念文章、传记。

《纪念册》是由军政治部印刷厂承印，封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是用珠红油墨印制，1943年底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

《纪念册》的出版发行，大大鼓舞了华中敌后广大军民的抗日热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华中军民团结一致，继承先烈遗志，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黄花塘留下的业绩至今还在淮南地区传颂着，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张云逸在黄花塘二三事

罗昌林

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从淮南津浦路西进入路东根据地，经常和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等同志到盱眙县黄花塘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原江北指挥部所属皖东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师部设在黄花塘。1943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从盐阜转移到盱眙县黄花塘，张副军对黄花塘人熟地熟情况熟，附近的村庄那一户锅门朝哪，家里有几口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当地群众见到张副军长都热情地称呼“老首长”。

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云逸副军长才离开黄花塘，经淮阴北上山东。张副军长是一位深受黄花塘人民爱戴的老领导，他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拾粪积肥

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黄花塘时，正值春荒，群众生活都很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军部号召部队干部每人每天节约半斤粮食支援灾区。9月，华中局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决定把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任务。

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部成立了直属队生产委员会，张副军长在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积极投入生产运动。他亲自开荒种粮，精心栽培各种蔬菜。

黄花塘地区是一个丘陵地带。当时地广人稀，土地瘠薄，需要施大量有机肥料，才能改良土壤。但群众积造自然肥料又不习惯，常是“人无厕所猪无圈，牛屎当柴烧”。人粪猪屎在庄前屋后到处都有，这里肥源是相当丰富的，是积造有机肥料的好地方。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变群众不勤于造肥的习惯，张副军长带头拾粪积肥。他在田头挖了一个3米见方的粪坑，每天将拾来的粪倒在粪坑里沤制发酵，再施到田里。因此，他种的庄稼长势特别喜人，尤其是“西红柿”在淮南更是盖过一切。在张副军长的带领下，拾粪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拾粪的工具显得不足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又在军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制造拾粪工具。

9月中旬的一天，张副军长从泥沛视察工作回来，警卫员扛了一捆柳条，边走边同首长谈话，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不时发出哈哈大笑。侦察科的战士看了不解地发问：首长要这些柳条干嘛？第二天一早，看到张副军长住地门口放着一个崭新的畚箕，大家心里才明白。以后，张副军长天不亮就背着这个畚箕，手拿粪勺，在家前屋后拾起粪来了，畚箕拾满了，遇到在哪家田头就倒在哪家粪坑里，最后一畚箕总是倒在自己的粪坑里。军直机关干部战士都以张副军长为榜样，掀起了拾粪的高潮，很快庄前屋后就拾不到粪了。为了完成每人每天上交5斤粪的任务，不得不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拾粪。

时间过得很快，不觉霜降来临，早上出去寒气逼人。10月下旬的一天，启明星还在灿亮着，张副军长同往日一样，又背起畚箕出去了，不觉走到了泥沛街北头，向前一看，只见大沟坡子那边有一黑影在晃动，靠近一看，原来是新华分社副社长于毅夫在拾粪。两人相互打个招呼后刚坐下歇歇，电台谍报员赵元龙背了满满一大畚箕粪走过来，3人便一同向黄花塘返回。军直机关干部和战士，在开垦的荒地上，由于施足了基肥，改良了土壤，庄稼长得都很茂盛，当年就取得了好收成。仅军政治部就种水稻30多亩，蔬菜三、四亩，做到蔬菜自给有余，粮食部分解决。军直机关还救济当地群众2000多斤粮食。群众称新四军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也是生产上的模范。张副军长拾粪的故事至今在黄花塘还传为佳话。

心系人民

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军部驻地的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张副军长和人民血脉相连，休戚相关，他心中装着人民，时刻关心着人民的疾苦。

就在寒霜遍地的冬月，张副军长迎着刺骨的寒风走进各家各户，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有一天，他在黄花塘塘埂上看到放猪娃孙培家穿着单裤和空心棉袄在寒风中颤抖着，张副军长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回去后同夫人韩碧商量一下，决定将自己儿子张远之唯一的青布棉裤送给了放猪娃。一个密雨冷风的深夜，孙培家突然生病发高烧，张副军长得知后，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找医生为他看病。

这时，他没有去惊醒睡在隔壁的警卫人员而是从床上叫

起夫人韩碧同志，让他顶着牛毛细雨，跑到四、五里外的常庄军卫生部，找来医生给孙培家看病。副军长还摸着病人灼热的前额，焦急地再三叮嘱医生：“要用心啊，一定要用心给他把病治好”。在张副军长的关怀和医生的积极医治下，放猪娃的病不久便好了。

张云逸房东徐景刘家人口多，生活困难，经常揭不开锅。有一天，副军长对徐景刘说：你家生活困难，日伪军又对我们封锁，我打算借一点钱给你做点油生意。做生意，这对祖辈都以种田谋生的庄稼汉来讲谈何容易！徐景刘为难地说，我不行呀！张副军长鼓励他说：“老徐，你就大胆地干吧！”就这样，徐景刘第一次当上了“卖油郎”。从此，徐景刘挑着油桶往返于涧溪、西高庙与黄花塘之间，将涧溪、西高庙的食油挑到黄花塘，送到军民手中。徐景刘的挑油生意越做越好，他便组织了一个挑油小队，将生意做到天长、扬州一带。挑油使徐景刘全家生活有了好转，老徐见人便说：“我家有今天，全是老首长帮助的呀”。张云逸同志对黄花塘人民的关怀象春风、泉水，温暖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黄花塘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位老首长。

严于律己

张云逸同志对人民、对战士十分宽厚，对自己和家人却非常严格。1943年9月的一天，张副军长突然发现马厩里少了一匹马，就问警卫员：我们的一匹马到哪里去了？警卫员深知在张副军长面前是不能讲假话的，只好如实告诉了他。

原来，张云逸的儿子张远之在离黄花塘20里外的张公铺读书，每星期六回家一次。当时，张远之年仅15岁，来回上学都是自己步行去的，从不特殊。每次从学堂回来，警

卫员都发现张远之满头是汗，有时两只脚磨出了血泡，警卫员很是心疼。这次，天下着雨，怎么让小孩跑回来呢？警卫员就悄悄地对老饲养员说：今天，你用首长的马将小张接回来。

张副军长知道事情的经过后，严厉地批评了警卫员。他说：

“我们部队在红军时代就有许多红军小战士，现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战士。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爬山越岭和我们一样行军，有的还要照顾伤病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的儿子做不到呢？况且，又是白天，天虽下雨，路滑一点算什么。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们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只是革命分工我担任了副军长”。警卫员听了副军长的话后，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批评，表示今后一定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事后，韩碧同志对警卫员说：“云逸教子是严格的。他常对我说，我们对孩子要严格，丝毫不能使他有任何特殊感。要督促他努力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

张云逸同志对儿子有着深沉的爱，但作为高级领导者，在硝烟弥漫的淮南，这种深沉的爱没有化作特权，而是化作了严格的要求。他心灵深处装着的永远是人民和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罗炳辉在淮南

夏 耘

1939年5月，为了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东进抗日的方针，叶挺将军由炳辉同志陪同，亲临江北，组织了江北指挥部，炳辉同志任副指挥。在开展了反右倾的基础上，部队进行了整编，七月在定远县成立了以八团为基础的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三个团，炳辉同志任司令员。五支队组织健全以后，立即东进。经过小分队侦察以后，炳辉同志率部相继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淮南路东。此后，五支队以半塔为中心，在来安、天长、扬州、盱眙、嘉山等地，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抗战的局面。特别是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对于建立淮南根据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皖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顽的震惊和恐惧，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加以扼杀。1940年5月，日伪千余人侵占我来安县城，强拉民夫，修筑碉堡，意在切断我路东和路西的联系，继续攻占我根据地。为了保卫路东根据地，我军决定收复来安城。炳辉同志率部三次攻城，第三次兼用火攻，消灭日伪军三百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流传。

在对敌斗争中，罗司令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是当时我党的策略总

方针，炳辉同志模范地运用了这个法宝。他不仅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得，而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而无往而不胜。

1939年10月，新四军五支队在来安盱眙交界处活动，日寇进犯来安。来安国民党县长张百非弃城逃跑。我军伏击日寇，日寇伤亡很多，仓惶中窜进县城。夜间，我方便衣武装又入城袭扰，日寇惊破了胆，竟自己互相打起来，枪声和小炮声响了通夜。

罗炳辉同志估计日军要逃跑，就向朱云谦同志说：“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你带上一个连，把张百非找来，来安县长还让他干。”朱云谦同志听了，有点想不通，没有什么劲头。罗司令笑着说：“这项任务没有打冲锋痛快，是吗？搞统一战线嘛！张百非这个人，民愤不大，拉来他一个，能影响一大片。”朱云谦按照首长的要求，立刻带上一个连队，顺着张百非及其常备大队逃跑的方向，一直赶到城北三十来里的屯仓，在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这位县太爷，诚恳地说明来意。张百非惊魂安定下来以后，急忙集合手下的队伍，人马已寥寥无几了。来安城已被新四军占领，张百非进城见到罗司令，感恩戴德，连称“罗公”。他说：“久闻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贵军赶走日伪，救了县城黎民，张某感激不尽，日后请多吩咐，愿为抗战效劳。”罗司令向他讲述抗战形势和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张百非继续当来安县长，并让他主持当晚的群众大会。这件事，在来安县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一定的作用。张百非任

职期间，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

罗司令做中上层士绅、商人的工作，几乎跑遍了路东八县的集镇。有一次，他在六合的竹镇集，召开一次开明人士座谈会。本来，这里中上层人士对我军怀有戒心，最担心的是“打土豪”。宾主入座，寒暄一番。接着，罗司令侃侃地谈起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针对士绅、商人的疑虑，开门见山地说：“列位都是通情达理、耳目灵通的人士。我军进驻以来，所作所为，有目共睹，有谁见过我军打过土豪？邻县来安城内伪军是我军赶走的，至今还不是让张百非先生当县长吗？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谁在真正抗战，谁在制造摩擦？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能看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一切为了赶走日寇。”炳辉同志开诚布公的一席话，说得到会人员频频点头。疑虑消除了，对立情绪缓和了。座谈会结束时，他们向我军捐献了二十几石粮食，两千多块钱。一位姓马的回族士绅还办了三个素席招待罗司令他们。此后不久，在竹镇组织的一支游击队，成员多数是回民，那位姓马的回族士绅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炳辉同志和广大群众更是关系密切，经常联系。他一有空就带上几个人到各地跑。他身高体胖，一口云南口音，直观印象是很有特点的。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群众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到群众基础好的村子里，只要有人喊一声“罗司令”，全庄的人都会涌过来。老汉笑着递过装满旱烟的烟

斗，老太太挪着小脚端来热腾腾的山楂茶，拖鼻涕的娃娃从大人腿裆里挤过来，爬到罗司令的膝盖上，军民嘻嘻哈哈地拉家常，不知不觉中，抗战的道理就宣传给乡亲们。有时到了群众对新四军还不够了解的村子，罗司令便对随行的同志说：“大家不是常说，老百姓是新四军的母亲吗？今天请同志们到母亲那里去，一边劳动，一边访问，看看群众有什么困难要我们帮助。”

通过罗司令及其他指战员的努力，仅仅三个月时间，五支队在淮南路东地区扎下了根，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成绩。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了。各县游击队也组织起来了。三个月的进展超过了过去的两年，使我方对敌斗争处于有利地位。炳辉同志转战淮南的时候，我军武器差、弹药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装备精良的顽军，要在他们频繁的夹击中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没有良好的作战素养是不行的。他从担任五支队司令后，在军训中，首先抓了射击、劈刀、跨越障碍物三大基本训练。他还是有名的神枪手，言传身教，严格要求，部队战斗力很快得到提高。“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

盱眙的莲塘战斗，罗司令出奇制胜，不是足以充分说明他用兵如神、治军有方吗？1940年3月，我军保卫半塔的战斗已经取得初步胜利。顽军韩德勤的常备十旅从苏北（当时是指淮河以北地区）过三河，直奔莲塘，妄图策应半塔之敌撤退。3月28日晚，罗司令亲率特务营二连、三连和重机枪排以及两个营，连夜抢先赶到莲塘堵击。我军拂晓前先于敌

人到达莲塘，罗司令先派出五个排哨，只留一个步兵排和一个重机枪排，在指挥所听候调用。第二天，敌军三千多人窜到莲塘东边，对我军主阵地轮番冲击。指战员奋勇抗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但是因为他们连续行军，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终于撤到最后一道临时阵地。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到战场形势很吃紧，便命令一个步兵排和一个重机枪排，沿小脚接近敌人右侧后，袭扰一下，目的是牵制敌人，减少主阵地守军的压力。这支袭扰部队趁敌人立足未稳，轻重机枪“砰、砰、砰”一齐开火，进行压制射击。敌人猝不及防，弄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立即开始溃逃，向他们的主力靠拢。我担任牵制的部队见此情况，觉得正是出击追歼的好时机，便一股作气，猛追过去，一下子把敌人打乱了套，直插到敌主力中间，击毙敌人数十人，俘虏敌副营长以下七十余人。但是，这支小小的队伍深入重敌，如何脱身成了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突然间，北面一支强大的骑兵冲杀过来，滚滚烟尘高高扬起，敌人乱成了一团，全线溃退。次日，我各路部队一直追到三河南岸。战斗结束后，大家才知道那大队的“骑兵”只不过是司令部六个骑兵通讯员。他们把每匹马的尾巴捆上松枝，拖在地上，包抄敌侧后，进行佯攻，竟把敌人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莲塘战斗，如果不是平时训练有素，是不可能出奇制胜的。

从1943年到日寇投降的1945年秋天，我路东根据地比较稳定，新四军军部已从盐阜区转移到路东盱眙的黄花塘。

这个时期，打仗主要在路西，经历了五尖山战斗、卢鸡战斗、黑狼庙战斗、桂子山战斗、黄瞳庙战斗等。每次战斗都给来犯的桂系顽军以重创，保卫了路西根据地，实现了对西防御的计划。在路东根据地，我军扩大了淮宝，发展了淮泗，进剿了白马湖、宝应湖，肃清了残余的地方反动势力。并两渡洪泽湖，拔除了泗北伪统区，实现了向东发展的任务。同时，我军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胜利地保卫淮南根据地。在粉碎日伪“扫荡”的战斗中，尤以一九四一年的金牛山战斗为著。这次炳辉同志初试他的梅花点式纠缠战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击毙日寇二百多人，俘虏伪军百余人。此仗大长我军志气，大灭敌人威风。罗司令的威名也从此传开了。

处于日伪顽三角斗争的复杂环境中，炳辉同志根据实战的需要和对毛主席游击战术的具体应用，总结出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采用麻雀战，梅花点式纠缠战用来对付日伪“扫荡”，是大有成效的。对待顽固派的进犯，则以近战，夜战、大刀见红取胜。在国民党各系军阀中，路西桂系是颇有点战斗力的。他们气焰嚣张，认为我军不行，但几次进犯，都吃败仗，不仅没有夺得我方一寸土地，而且被打得一败涂地。

由于炳辉同志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因而当年老区的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奇式的故事：有一位天神，看见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便下凡来指挥他的神兵，驱除了鬼子，解救了百姓。炳辉同志就是这位天神。当地的人民群众都用“我们的福星”来称誉炳辉同志。

1945年底，罗炳辉同志高血压已出现了险恶的征兆，食道血管破裂，经一个多月的治疗，在临沂养病四个月，病情才稍为稳定。1946年4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苏、皖、鲁各解放区进攻，挑起全面的内战。这时，罗炳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反击敌人，他再度带兵出征，前往鲁南前线。当时，炳辉同志仍在重病之中，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是他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为党为人民捐躯的准备。临行前，他给女儿罗镇涛留下了遗言和遗物，并向陈毅同志托付了这个未成年的女儿。

他多次晕倒在会议桌前，但是仍然坚持着，坚持着，就在他逝世前十几天，他还指挥枣庄之战，取得了胜利，战斗到最后一息。

从讨袁到北伐，从长征到抗战，炳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离开我们六十多年了，淮南老区人民至今仍在深切地怀念着……。

吴运铎创办军工厂

程琪璜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被人们誉为“中国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1917—1991)，湖北武汉人。他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工厂工作。1941年任新四军军工部支部书记。同年秋，随同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等人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筹办新四军第二师军工厂。他到淮南后，历任新四军第二师子弹厂厂长、炮弹厂厂长及第二师军工部工务科长、副部长等职。

1941年7月18日，日伪军2.5万人“扫荡”苏北根据地，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部队第三师。在陈毅代军长的正确领导下，新四军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扫荡”的巨大胜利。这时，吴运铎任新四军军部军工厂政治指导员。为了筹建新军工厂，军部领导决定他和四十余名工人跟随吴师孟去淮南，任务是建立一个年产60万发步枪子弹厂。

吴运铎等人从阜宁出发，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时，受到罗炳辉副师长等领导的热情欢迎。不久，在天高县平安乡的小朱庄借了两间茅草房。从此，“茅屋工厂”诞生了。子弹厂只有8名工人，吴运铎任厂长。

为了使子弹厂早日投产，二师师部和地方政府动员广大指战员和群众，收集破铜烂铁、木柴煤炭等原材料支援子弹

厂。

国民党官僚们曾打着治理淮河的幌子，要在盱眙县境的高良涧(现属洪泽县)建造水闸，从南京等地运来大批钢材。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建造。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建闸的官员逃之夭夭，把大批钢材沉到三河水底。当地群众报告了这一情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二师军工部决定组成一个打捞工程队，挑选几十名熟悉水性的战士和群众，下水打捞钢材。寒冷的冬天，水温很低。打捞队员们入水前先喝上两口白酒，然后一个个跳下水去。很快，一根根粗3公分、长5公尺的钢筋一根根地被捞出水面。这批钢材可派上了用场。军工部又给子弹厂送来了一部四呎皮带车床一部皮带钻床和一部牛头刨床。不久，子弹厂迁到小朱庄北边的仙墩庙，在大雄宝殿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加工车间。另外，还建立了锻工车间和模型车间。炼铜需要坩锅，吴运铎请来了补锅匠刘师傅传授技艺，终于炼出了铜汁。子弹厂很快就生产出了步枪子弹、机枪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和地雷，支援前线。

有一次，前方送来了一批废迫击炮弹，军工部首长附了一封信：“运铎同志，前方等着要炮弹，要尽一切力量，提前修好炮弹。”吴运铎接受任务后亲自动手，他从废炮弹的雷管里挖雷汞。当他拿起签子往里戳时，轰的一声巨响，雷管在他的左手里爆炸了。当场他的左手被炸掉四个指头，左腿膝盖炸了小碗大的伤口，左眼也被炸瞎。送进医院，发生休克，通过抢救，十多天后才逐渐清醒过来。但他却很乐观，

他对护士们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14岁就到煤窑当童工，给资本家做牛马，苦不堪言。要是在那个年头，受了这样重伤，肯定活不了，如今我负伤是为了革命，是光荣的。炸掉我的左手，还有右手，左眼瞎了，还有右眼，干革命总有流血牺牲。伤好后，我要生产更多的子弹，消灭更多的敌人。”护士们无不感动落泪。

不久，他就回到了军工厂，重新投入紧张的战斗。

1943年初春，大雪纷飞，吴运铎冒着严寒来到大刘郢，罗炳辉师长与他亲切交谈，让他研制新式武器。他当即向罗师长保证：“我的一切属于党，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运铎从二师师部回来后，夜以继日地研制新式武器。只用了半个月时间，第一批枪榴筒和枪榴弹就研制成功了。他们到野外试验射击，但射程不远。吴运铎并不灰心，又重新设计，反复改进，射程终于达540米。这批枪榴筒和枪榴弹送上前线，后来在桂子山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吴运铎领导的子弹厂发展到200多人。1943年后，又在盱眙上贺郢建成了平射炮厂，仍由他当厂长。

吴运铎在抗日战争中，白手起家创办了军工厂，为新四军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长江在大刘鄆

高 歌

1943年冬，范长江以新四军新闻工作战士的身份，在淮南大刘鄆师政礼堂向我们二师教导团干部队作介绍大后方情况的报告。他有力地批判国民党腐败，鱼肉人民的专制独裁行为，并用“敲锣”作比方：“共产党的‘锣’越敲越响，国民党的‘锣’越敲越低沉。”他愤慨地指责特务统治：“戴笠不是戴着破斗笠遮住其庐山真面目吗？尽干见不得人的事。”他还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是历史法则。”他批驳流行大后方的“正统”观念说：“只有人民才是正统。共产党代表人民才称得上正统。”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语言简朴、生动，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范长江是怎样进入敌后根据地的呢？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周恩来三次致电廖承志，部署在港工作人员，文化界人士的撤离安置。范长江昼夜忙于《华商报》停业后的处理工作及协助人员撤离事宜。翌年初，周恩来托张友渔紧急通知由香港撤至桂林的范长江：蒋介石第二次下逮捕通缉令，已派特务追捕他。并指示：可去中原解放区找李先念，也可去苏北解放区找陈毅。范长江历尽艰险，在无法进入中原解放区后，于7月7日到达苏北。8月底在新四军军部见到陈毅军长。

陈军长见到化装成商人，剃了一个大光头的名记者，不

禁哈哈大笑说：“老弟哟，我已收到南方局打来的电报，算定你要来军部报到，欢迎！欢迎！”说着，两位四川老乡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不久，延安《解放日报》9月6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名记者范长江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为题的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与好评。

1943年春，新四军军部由苏北迁来淮南路东黄花塘（原二师师部驻地），范长江成为一名活跃在华中地区新闻战线上的领导同志。到1945年5月止，近四年的时间里，他组建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全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华中分会，为敌后抗日新闻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崔义田在黄花塘

黄群华

崔义田同志是辽宁人，早年毕业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奉天医学院(即沈阳医学院)，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1938年3月，他怀着满腔的抗日救国热忱，毅然放弃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医院优厚的生活待遇，投奔了刚建立不久的新四军。入伍后，先后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一支队军医处处长，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供卫部副部长、卫生部长，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长，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顾问等职。1989年6月12日于北京病逝。

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新四军军部驻盱眙县黄花塘期间，崔义田同志先后担任军供卫部的副部长和军卫生部部长。在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战斗的岁月里，崔义田同志在这里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留下了他为我党我军卫生事业无私奉献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一)

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要离开黄花塘军部赴延安参加整风和筹备中共“七大”会议。此去延安千里迢迢，一路上有无数道敌伪军严密的封锁线，必需轻装前进，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的长途艰苦跋涉，才能

到达延安。显然，陈毅同志当时是不可能携带夫人张茜和两个幼小的孩子(陈昊苏、陈丹淮)同去延安的。

家属留下来如何妥善安排呢?鉴于陈毅同志当时的处境，将家属放在军部，他是不大放心的。因为不久前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曾利用整风机会召开斗争会蓄意打击排挤陈毅同志(即“黄花塘事件”)。这场政治风波刚刚过去，陈毅同志不能不慎重考虑。经过商量，他决定把家属放在常庄军卫生部，请崔义田部长代为安排和照顾。这样，他才放心而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黄花塘。临行时，张茜同志含泪送到村外路口，直到望不见他那高大的背影才悲伤地回到驻地。

陈军长为什么如此信任崔义田同志?说来话长。1939年，陈毅在江南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时，组织上决定将一支队军医处处长王聿先同志调到皖南军部工作。谁来接任这一职务呢?陈毅首先想到了新四军军医处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同志。因为陈对崔优良的德才情况早有了解。崔入伍初期，就因陋就简地在皖南军部驻地附近山明水秀的小河口创办了新四军第一所后方医院。由于崔领导有方，工作出色，这所医院曾受到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高度赞扬。当时来这里采访的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称赞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军队医院。”所以，陈毅点名要崔到一支队去工作，并到皖南军部亲自找崔谈话。陈殷切地对崔说：“王聿先同志已决定调军部工作，前方任务很重，尤其缺少懂得医务技术的领导干部。你是外科医生，前方很需要

你，我是慕名而来的，欢迎你到我们那里去啊！你愿意去前方工作吗？”听了这番坦诚而充满信任和希望的话语，崔义田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当即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很愿意到前方去抗日，很乐意在您的领导下工作。”不久，崔就办好工作移交手续，带了几个医务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了江南敌后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很快接见他，向他详细介绍了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并对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如何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如何开展部队医疗卫生工作，提高部队的健康水平，如何培养医务干部等等，都作了具体指示。这些谆谆教导，对崔后来能够顺利地开展部队卫生工作，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1939年9月起，崔义田长期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到工作生活上，均受到了陈毅同志经常的关心、教育和帮助，使他逐步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崔对陈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崔十分敬佩陈毅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气魄和才华。不仅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陈毅同志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一系列指示，而且对陈毅同志及其家属的医疗卫生保健也非常关心和负责。早在盐阜区，军部驻停翅港时，陈军长因忙于全军大事，无暇顾及家事，曾将幼小的长子小侉（即陈昊苏）放在军卫生部，崔义田部长特地委派一名上海来的助产士朱灵同志负责照顾和抚育。……正因为崔陈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所以这次陈毅同志在远离军部去延安之前才放心地将妻小委托给军卫生部代为照料。

1943年，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驻在黄花塘东南约三里路的大王庄。一天夜里，城工部副部长刘长胜同志突然被一阵阵呻吟声惊醒，他迅即披上旧军衣跳下床来一打听，原来是城工部秘书兼干部科长张承宗同志突发腹部剧痛，难以忍受，因而呻吟不止。刘部长连忙喊来了吴学谦、周晓华、陈浩等几位干部，用门板作成一副担架，抬着张承宗同志急切地向军部休养所赶去。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为了及时抢救伤病员，部队旅以上的卫生部门均设有休养所或前、后方医院。黄花塘军部卫生部的直属休养所驻在姚庄。这里设有药房、手术室和化验室，可容纳伤病员150人左右。除了收治部队伤病员以外，还收治当地群众病员，为老百姓免费治病。话又说回来，当刘长胜等几位同志在夜幕中穿过四五里路羊肠小道，十分艰难地把张承宗送到休养所时，军卫生部长崔义田已经闻讯从二里以外的常庄星夜赶到这里了。崔部长顾不上休息，立即为张承宗检查病情，确诊为急性盲肠炎，需马上动手术。但时已深夜，休养所唯一的一盏汽油灯偏偏在这时突然熄灭了，室内一片漆黑。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只好点燃备用的多支蜡烛，并由几个人同时用好几只电筒帮助聚光照明手术部位，由崔部长亲自动手为张承宗做了麻醉和切除手术。待手术完成后张醒来时，天已黎明了。此时，刘长胜同志才放心地向张打个招呼回大王庄驻地去了。张在休养所住院两个星期，崔义田多次到病房为张细致地检查刀口愈合情况，问寒问暖，极为关心和负责。全国解放后，张调上海市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称道过崔义田部长对同志、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

(二)

1944年春，有一天新四军政治部副部长梁国斌(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等职)，正在淮南路东根据地天长县的汉涧镇作坦白运动的动员报告时，突发急性绞疝，象刀割一般疼痛，病情非常危急。当地组织火速用担架把他送到军卫生部休养所。所里的开刀房不久前刚刚毁于一场火灾。为了抢救战友，卫生部长崔义田迅即布置休养所的同志们用最快的速度，在民房内突击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临时开刀房。

当时已是黄昏时刻，在汽油灯的照明下，崔部长亲自为梁国斌做手术，直至深夜。打开梁的腹腔时，发现小肠就要坏死了。由于诊断正确，手术高明，消毒严格，护理周到，梁国斌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并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崔义田亲自为梁国斌治病和开刀何止这一次?早在1942年梁的腿部患皮肤结核，崔为他开过两次刀，1944年，梁除患过急性绞疝外，还患过伤寒病，也是崔亲自治愈的，1961年夏，梁在公安部工作时，因公出发到湖南，突发气胸病，病情也非常危急。崔得知后，立即组织黄家驷等几位专家乘专机赶到长沙，连夜抢救了三天三夜，才使梁脱离危险。梁在生前曾多次向其亲属和一些熟悉的老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崔部长对我们老同志的健康很关心，很负责。他对我的病历很熟悉，我的生命有几次处于危重时刻，都是老崔把我抢救过来的，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三)

抗日战争时期，部队长期处在艰苦的战斗环境，缺医少药，只有少数医务干部，也因为缺乏训练，医务水平不高。作为军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崔义田同志，远见卓识，着眼全局，十分重视医生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他同卫生部门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亲自筹办医务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担任教员。采取多种形式为新四军培训了一大批高、中、初级卫生技术人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崔义田同志培养医务人才，不仅重视从理论上进行教育、提高，而且重视在救治伤病员的实践中来指导、锻炼他们。1944年底，新四军在安徽淮南路西与国民党广西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当时军部决定以新四军二师一个旅的卫生部为基础，组成一个后方医院，负责收治这次战斗中的大批伤员。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前方医疗力量，崔义田亲自带领一个手术队和一个医训班，急行军一昼夜，穿越日伪军在津浦路封锁线赶赴前线。崔部长一到前线，就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连续为重伤员做手术。他那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深受伤病员们的信赖和爱戴。

这次医院共收治八百多名伤员。崔部长为了让医训班的学员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战伤外科技术，他一边为伤员动手手术作示范，一边向学员进行耐心细致地讲解、指导。崔部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全体医护人员，齐心协力为抢救伤病员而积极、勤奋地工作。获救的伤员纷纷表示，伤愈后立即回前方继续奋勇杀敌，以报党恩。

白衣战士宫乃泉

杨丹平

宫乃泉同志生于1910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28年，在沈阳第一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入英国教会主办的奉天医学院（即沈阳医学院）。在该院读书期间，他和王聿先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关心天下兴亡，探讨真理，追求革命。1937年11月，他俩在汉口相遇，一起到新四军办事处报名参加革命。宫乃泉同志分配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二师卫生部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解放军医学科学院院长、西藏军区卫生处副处长，1975年4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宫乃泉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坚贞不屈，刚直不阿，襟怀坦白，坚持真理，热爱祖国，忘我献身。刘少奇同志曾经这样评论过：“乃泉同志象一把利斧，多硬的木头，经他一劈，就裂为两半，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宫乃泉同志足迹遍淮南，为我军医务工作作出较大贡献。1940年秋，宫乃泉同志在盱眙县古城举办卫生干部训练班。刘少奇同志来淮南视察部队医院时，参加了古城卫生干部训练班的毕业典礼，并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形势报告，医务人员和学员受到极大鼓舞。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这个医务训练班办得好，以后要继续办下去，培养卫生干部，提高医疗技术。”后来，乃泉同志

坚决贯彻这一指示，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先后在淮南办了四期卫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受到张云逸、罗炳辉、邓子恢等首长的多次表彰。乃泉同志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对病员、伤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爱戴。他入伍不久，即向组织上要求减薪，和战士同甘共苦，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此他在1940年10月，经张云逸、罗炳辉两同志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沈其震、官乃泉两同志在淮南筹建华中医学院，培养高级医务人员和卫生领导干部。有部分学生已经入学，后因战争动荡，医学院不能正式上课。这时，日寇扫荡，江淮大学迁淮北，学员疏散，部分教师暂回沪、宁等地，还留下部分教师。官乃泉同志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将华中医学院改为医务人员研究班，依靠“江淮大学”教师给研究班上英语，心理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课，官乃泉、吴之理、章映芬同志上医学课。

1944年，乃泉同志由二师调到军部卫生部任副部长。当时为培养全军医药专业人才，军卫生部举办了医训班、药训班、检验训练班(即化训班)。一位老同志回忆说：“1944年春，组织调我去淮南军部卫生干部训练班学习，卫生部驻在盱眙县常庄，又一次见到官乃泉同志。训练班的条件差，没有课本，没有讲义，全靠听课记笔记。乃泉同志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没有废话，一堂课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学习生活紧张活泼，学习内容丰富多彩。他传授新知识，从理论到实践，每单元结束时都要到医院实习。崔义田部长有时也来讲课。我们还去数里之遥的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所

在地听首长报告。在我们学习期间，卫生部召开一次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各师卫生部长通过敌人封锁线绕道步行前来参加。我们训练班全体人员列席参加，以便了解部队卫生工作的全面情况。”

1945年，官乃泉同志组建白求恩医学院，为我军培养高级医务人员。学员大多数是根据地高中毕业生和上海等地来的青年学生。共办三期。这批学生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军医疗骨干，也是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坚强力量。淮南地区部队的卫生干部经过培训，医务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卫生队伍日益壮大。

官乃泉同志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好学不倦。他参加革命后，常以“白山”、“黑水”笔名发表文章，痛斥日寇侵占我国土的罪行，抒发对家乡同胞怀念的感情。他学习《资本论》、《帝国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增强革命信心。他严格要求自己，肩挑重担，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钻研业务。尽管工作很忙，他还利用行军路上，工作或开会间隙时间学习，甚至上厕所几分钟时间也不放过。他手不释卷，常常读书到深夜。在战争环境里，他为丰富同志们的文化生活，亲自创办图书馆，筹集科技、文艺书籍，还千方百计购进中外医学杂志和医学书籍。他深深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在任何恶劣环境里，卫生部到哪里，图书馆设在哪里。他常说：“生活用品可以丢失，书籍不可丢失一本”。图书成了同志们的精神食粮，既提高医学水平、文化水平，又提高政治觉悟。李万玉同志腿部伤残，愿意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官乃泉同志就派他为图书管理员。

战争年代，部队分散，战争频繁，部队卫生干部难以集中学习。为了及时进行医务技术指导和经验交流，以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乃泉同志在极艰难条件下，于1941年创办了《医务生活》刊物，亲自撰稿、译稿，每期都有他写的战伤专著，研究解决淮南我军医疗中许多疑难问题。官乃泉同志在1960年对一位同志说：“这些年来，我所撰写的文章，军内刊物发表的有百万字之多，如能对部队卫生工作有所裨益，我就如愿以偿了”。在游击环境中，撰写百万字的文稿要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要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呀！除《医务生活》外，还办了一个通俗小报《卫生战士》，面向连队卫生工作，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活泼，深受连队卫生人员的喜爱。

官乃泉同志十分重视后方医疗基地的建设，多次阐明办正规医院的重要意义。新四军三师卫生部直属的五个分所和路东军区医院，均建立一套比较严格医疗常规和护理制度。对医务人员严格要求，系统学习，做到战场救活，及时包扎，争取枪伤第一期愈合，减少残废和死亡。支队（旅）和军分区医院都能做一般腹部手术。师、旅、分有较正规的病房，收治重伤病员。二师师都医院先后设立在古城（盱眙县）、大刘郢（原属盱眙，现属天长）、小朱营等地。有的同志回忆说：“我亲眼看到官乃泉同志为伤员日夜操劳，没有病床，就用门板、竹笆代替。药品、器材奇缺，就想方设法派人去上海购买，如通过盱眙古城老乡姓郁的去上海买药品、器材。开始购买少量急需的，以后买重要的。当时上海五洲大药房地下党同志看到这位老实乡下人，每次带来购货单，字迹熟练，

进一步打听，知道是根据地来的，就给予方便，连禁止出境的医疗器械和贵重药品都卖给姓郇的。淮南根据地部队药品、器械储备充裕，是和乃泉同志分不开的。”

从敌占区购药品和器械是比较困难的。乃泉同志自力更生，亲自动手采用中草药，如用桔梗、甘草、樟脑等制成酞剂、合剂药片，并自制石膏绑带，请铁木工制作托马氏架和各种副木、消毒器、蒸馏器、便盆等医药卫生用具。他经常对部属强调，药品、器材来之不易，必须节约使用，一个棉球，一滴酒精都不可浪费。敷料要反复洗涤、消毒后多次使用。他每到一处检查工作，发现随便乱扔棉球、敷料的现象，总是十分严肃地进行教育。他言传身教，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常说：“我们要对伤员生命负责！”每天准时查房巡诊，亲自做手术，给重伤员更换效敷料。有一次，他从徐海东副指挥处急诊回来，天已很晚，加之身体不适，过度劳累，急需休息。这时，正遇上从部队送来一名重伤员，经值班医务人员检查是胸腹贯穿枪伤，内脏出血，伤员处于休克状态。他不顾身体不适，立刻投入抢救，连夜做手术。当手术完毕时，天已拂晓。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是脸上流露出喜悦和满意的微笑。

官乃泉同志身在部队，不忘地方群众疾苦，有着强烈的群众观念。军部附近群众常找他看病，他都热情接待，认真治疗，遇到重病人，立即组织抢救，亲自诊断治疗。所以地方群众高度评价，官大夫医疗技术精湛，手到病除，令人敬佩。淮南行署卫生处培训卫生干部，办卫生人员训练班，他派干部和教员。他还派医务人员兼淮南中学校医和生理卫生

教员。他在竹镇举办群众卫生展览，进行防疫教育，注意环境卫生，提高群众健康水平。

官乃泉同志在淮南期间，注意团结国际友人，协助党做统战工作。1941年，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来列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乃泉同志在一起工作，相处融洽，亲如一家。罗生特是泌尿外科专家，那时泌尿外科病人较少，乃泉同志请他看其它科病人，罗生特乐意接受。官对罗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使他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加深了了解。有一次，一个病人患两侧腹股沟疝，伴有肠绞窄急痛症现象，来院急诊，须立刻动手术。罗生特主动配合乃泉同志为这位病人做了手术，解除了病人的痛苦。

1943年，罗生特医生奉命北上，临行时依依不舍，再三赞扬乃泉同志的革命精神。他深情地说：“我在这里，官大夫对我帮助很大，感到非常愉快，离开这里，无限怀念。”

抗日战争期间，经常有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军首长常把他们介绍给官乃泉同志。他总是热情接待，关怀备至，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留在根据地安心工作。

青山巍巍，淮水泱泱，共产主义战士官乃泉同志永远活在淮南人民的心里，永远是淮南人民的学习榜样。

新四军中的外国大夫——罗生特

李 磊

白求恩的事迹闻名世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当年在新四军中也有一位外国大夫，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同志。罗生特同样具有“对技术精益求精”的高超医术，同样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而且在新四军和东北野战军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罗生特 1903 年 1 月 11 日生于奥地利，1928 年 5 月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他在大学期间读过一些马列著作并投身于反法西斯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他曾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在德国的布痕瓦特集中营备受凌辱、摧残，满口牙齿被敲掉，肾脏被打伤，腰脊被打坏，但他毫不屈服。后来纳粹分子因找不出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将他释放，并勒令出境不得回国。1938 年冬，罗生特和难友威廉戴克乘船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上海，以开设小诊所谋生。

1941 年初，罗生特经过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德国共产党国际新闻记者希朴及其夫人涂鲁德的介绍，认识了新四军驻上海工作的吴元理和沈其震同志。几经交谈，罗生特决定投身中国革命，便乔装传教士，携带部分医药器械随沈其震等同志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亲切接见了。第二天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罗生特一到解放区就

像回到了自己的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繁忙紧张的工作。

罗生特不仅是位经验丰富的泌尿科和妇科专家，而且是博学多才、一专多能的医师。他对工作极端热忱，对伤病员的阶级感情极为深厚，查病房、做手术、搞教学都是一丝不苟。他还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文化活动，在各种纪念会上演讲，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歌颂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控诉法西斯的暴行。他创作了许多歌曲和诗歌。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晚会上，他兴致勃勃地演唱了自己创作的《反法西斯进行曲》：“挺起胸，冲上前，莫要再彷徨，去把敌人消灭光！团结勇敢，奋斗牺牲，流血莫回头。”他创作的《我们是中国的青年》等许多诗歌被根据地报刊采用。

罗生特到新四军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及整个中国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充分了解。他计划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把中国革命斗争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人民。他向陈毅代军长报告写书计划并盼陈毅同志向他提供有关情况，陈毅同志很赞同他的计划。1942年3月8日陈毅给罗生特的回信中写道：“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奋斗为你所亲见，所亲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

罗生特十分关心卫生部各方面的工作，针对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建设性意见。1941年6月新四军军部华中卫校的开办就是他首先提出的，并积极参加建校活动，定期到学校讲课。他不仅关心军部和盐城地区各项卫生工作的建设，还

不顾当时交通不便，敌我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患有腰伤和夜盲症等困难，不论在酷暑炎夏，还是寒冷的严冬，都奋不顾身地奔走于新四军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等部队和根据地之间为全体军民服务。他充分运用他高超的医术，解决各部队卫生业务上遇到的困难，而且婉言谢绝各级领导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始终坚持和指战员共同生活。在行军中他总是把自己的乘马让给病员或体弱的同志骑，发给他的津贴费也省下来给伤病员买营养品。他常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新四军这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军队。”他深情地说：“在新四军这支伟大的部队中工作，为中国同志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罗生特忘我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体军民的崇敬，都亲切地称他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大夫”。1943年春，军部驻盱眙县黄花塘时，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罗生特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

鉴于新四军对敌斗争的环境日趋艰苦，作战频繁激烈，军首长为了罗生特的安全，决定送他去延安总部工作。罗生特也盼望着能见到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崇敬的周恩来副主席，便欣然同意了。1943年6月，罗生特一行六人离开第二师师部自淮南北上。在途经淮北半城第四师师部驻地时，他愉快地接受彭雪枫师长的热情邀请，在第四师帮助工作三个月。他对四师卫生工作机构及在技术规范、工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整顿。从而使整个直属医疗所的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在1943年8月四师卫生工作会议上，罗生特

认真听取了各旅、团的工作汇报和经验介绍后作了《加强各级卫生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做好伤病员的救治工作》的报告，还作了几次关于野战外科方面的专题讲座。罗生特不仅在业务技术上具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而且在工作上更具有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以及热情诚恳、团结友好的优秀品德。在罗生特同志参加新四军第四师卫生工作会议期间，一天夜里突遇淮河河堤决口，他与大家一起跳进水中参加抢堵决口的战斗。

1943年9月，据陈毅的紧急电报，罗生一行日夜兼程赶往山东军区滨海驻地，为罗荣桓司令员治疗肾病。由于他诊断准确，医治措施妥善，罗荣桓司令员身体得以康复。此后，罗生特便在山东军区卫生部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山东军区卫生部的业务领导工作及附属医疗所的临床医疗和卫校的教学工作。他言传身教为培养新四军医务干部花费了大量心血。他抓住查病房、做手术乃至休息的一切机会给医务人员作技术操作讲解，并经常作学术报告。他常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必须具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敏锐的眼睛，一对万能的手（会做木匠、泥瓦工、缝纫工，将来有了电还会电工），戏剧家的嘴巴。”

日军投降后，罗生特随山东主力部队进军东北。他先在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任顾问，1946年下半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罗生特不仅医务技术高明，而且具有领导才能。他对工作周密计划，严格要求，重视群众意见，对所属人员从教育出发，功过分明。一纵队方毅司令员对他

的工作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将尽毕生的精力来做好纵队的卫生工作。

1949年春，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体检，发现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有陈旧性心肌梗塞。多年来他明知自己有病，但一直对别人隐瞒着，而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干劲和乐观主义精神，圆满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艰巨任务。第四野战军领导得知他患有这样严重的心脏病时，便决定让他随罗荣桓政委一起去天津疗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罗生特万分欣喜，他决定请假回国，动员往年的老师、同学和好友同他一起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借机和分别了十几年的亲人欢聚。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出发时刘少奇同志在天津亲切接见了，罗荣桓和林月琴特地到天津车站为他送行。在途经南京时受到第二野战军卫生部齐仲桓部长的盛情款待。他到上海后受到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热烈欢迎，为他周密安排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工作。陈毅市长在百忙中由崔义田、官乃泉部长陪同几次看望罗生特同志。他们亲密无间、促膝谈心。陈毅市长高度评价罗生特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作出的贡献，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白求恩式的大夫，向他表示了深切的谢意。罗生特回忆九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同志们亲切帮助下所走过的历程。深深感到党和部队领导对他无限的信任和照顾，给了他为中国革命尽力，为根据地军民服务的机会，给了他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关怀和支持。他说：发自内心的感激，非笔墨和语言所能表达，只有终生铭记

在心。

崔义田、宫乃泉部长都非常钦佩罗生特同志，高度赞扬他甘愿受苦，不怕牺牲，运用高明的医术为中国军民服务的高尚国际主义精神。他渊博的医学知识培养了我军广大的卫生技术干部，为我军的卫生建设出了大力。一个外国医生，出色地担任了一个纵队卫生部长的职务，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贯以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挽救了无数军民的生命，医治军内和根据地广大妇女的疾病，积极地主张搞计划生育……这一切成就是罗生特以崇高的政治思想品德，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罗生特在我军卫生战线所创造的业绩，使我们永远怀念这位光荣而伟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49年11月，罗生特怀着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关怀和对自己祖国奥地利的向往，带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热烈祝愿，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罗生特同志回国后，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遇到了种种困难，欲重返中国又办不了出境手续和签证，壮志难酬。后来他妹妹几经辗转给宫乃泉部长寄来一封信，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罗生特同志回国后因贫病交加，已于1951年5月含愤去世，终年仅48岁。我们深为罗生特回国后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为失去一位亲密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友而万分惋惜和悲痛！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罗生特同志。

莲塘战斗

陈琳

罗炳辉同志转战淮南的时候，我军武器差、弹药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装备精良的顽军，要在他们频繁的夹击中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没有良好的作战素养是不行的。但从担任五支队司令后，在军训中，首先抓了射击、劈刀、跨越障碍物三大基本训练。他还是有名的神枪手，言传身教，严格要求，部队战斗力很快得到提高。“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

处于日伪顽三角斗争的复杂环境中，炳辉同志根据实战的需要，和对毛主席游击战术的具体应用，总结出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采用麻雀战，梅花点式纠缠战用来对付日伪“扫荡”，是大有成效的。对待顽固派的进犯，则以近战，夜战、大刀见红取胜。在国民党各系军阀中，路西桂系是颇有点战斗力的。他们气焰嚣张，认为我军不行，但几次进犯，都吃败仗，不仅没有夺得我方一寸土地，而且被打得一败涂地。

1940年3月，我军保卫半塔的战斗已经取得初步胜利。顽军韩德勤的常备十旅从苏北（当时是指淮河以北地区）过三河，直奔莲塘，妄图策应半塔之敌撤退。3月28日晚，罗司令亲率特务营二连、三连和重机枪排以及两个营，连夜抢先赶到莲塘堵击。我军拂晓前先于敌人到达莲，罗司令先派出五个排哨，只留一个步兵排和一个重机枪排，在指挥所听

候调用。第二天，敌军三千多人窜到莲塘东边，对我军主阵地轮番冲击。指战员奋勇抗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但是因为他们连续行军，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终于撤到最后一道临时阵地。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到战场形势很吃紧，便命令一个步兵班和一个重机枪排，沿小山脚接近敌人右侧后袭扰一下，目的是牵制敌人，减少主阵地守军的压力。这支袭扰部队趁敌人立足未稳，轻重机枪“砰、砰、砰”一齐开火，进行压制射击。敌人猝不及防，弄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立即开始溃逃，向他们的主力靠拢。我担任牵制的部队见此情况，觉得正是出击追歼的好时机，便一股作气，猛追过去，一下子把敌人打乱了套，直插到敌主力中间，击毙敌人数十人，俘虏敌副营长以下七十余人。但是，这支小小的队伍深入重敌，如何脱身成了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突然间，北面一支强大的骑兵冲杀过来，滚滚烟尘高高扬起，敌人乱成一团，全线溃退。次日，我各路部队一直追到三河南岸。战斗结束后，大家才知道那大队的“骑兵”，只不过是司令部六个骑兵通讯员。他们把每匹马的尾巴捆上松枝，拖在地上，包抄敌侧后，进行佯攻，竟把敌人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莲塘战斗，如果不是平时主训练有素，是不可能出奇制胜的。

龙王山战斗

张国政

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原是一个老红军团。这个红军团早在1933年就建立起来，属红二十八军建制。红二十五军从大别山区转移后，它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那里坚持四年多游击战争，愈战愈强，逐渐成长壮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华北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华南八省红色根据地的部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坚持在大别山区及河南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所属第七团就是上述的红军团改编的。

七团成立后即奉命东进抗日。1938年冬，武汉失陷后，它开到皖东，与兄弟部队一起，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收复失地，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条件。活动地区跨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北控淮河，南临浦口，直接威胁南京，是扎在敌人头上的一根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敌人是非要拔掉它不可的。当时打着抗日招牌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也把这块地方看作他的领土。他对于新四军的到来，不是与之团结抗战，而是想将其赶走甚至消灭，以便自己扩大地盘，扩充势力。

1940年春，形势日益紧张。日伪机动部队数千人，对路西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被我军四、五支队所属部队粉碎后，又于9月7日集结一万多人，对路东根据地发动猛攻，妄图扑灭那里的抗日力量。敌人西面从嘉山进犯盱眙，

企图控制渡口，阻止新四军北渡淮河。南面从六合向北，东面从天长向西，向我中心区扑来，妄想一举吞掉我军首脑机关。顽固派韩德勤同时派遣秦庆霖由东北面向铜城、马坝进犯（编者注：据另外一些史料记载，韩顽进犯时间是在八月）。在敌、伪、顽同时逼进的情况下，一时间，根据地四面八方，硝烟四起，战云密布，情况异常严重。就在这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急令七团迅速从路西驰援路东，配合兄弟部队，痛击来犯之敌。

经过1940年5月路西反“扫荡”的胜利，6月配合八团击退桂顽李本一的进攻，此时七团驻在永宁集附近，距离路东有好几百里。命令到达后，天公不作美，连续阴雨，有时甚至大雨滂沱。部队就在泥泞的小路上艰难地前进，争分夺秒，星夜兼程，奔赴路东。因急于赶路，四连有一天做午饭，麦子没有来得及磨成面粉，只好煮麦粒充饥。敌寇平时对铁路就严密封锁，这时封锁得更严，只能在夜间通过。那是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天空象一口大黑锅，什么也看不见。每个战士的手膀扎一条白毛巾作为联系标志。指挥员不断发出“跟上”、“跟上”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往下传，指战员冒着寒风，脚踩泥泞，直到铁路附近才稍事休息。

这支部队是第一次在敌人封锁下过铁路，他们从路西珠龙桥出发，到达大、小王营车站之间通过。铁路两侧都有封锁沟，深约三、四米，宽约四、五米，一路急行军，越过铁路，到了路东黄泥岗才宿营。有些同志过去未见过铁路，不

知道铁路是啥样子，过路时一个个伸手摸摸铁轨，好奇地跨过去。

这时指挥部已作出决定，七团由五支队党委统一领导，配合五支队八团和十团，在罗炳辉司令员指挥下首先打击韩顽。部队在屯仓稍作停留，又急行东进。就这样，由路西到路东，一个多星期行程八百余里，抵金沟时作短时间休整。8月初，他们过三河，在仁和集、岔河镇，配合五支队歼灭韩顽三十三师两个团，取得了巨大胜利。

9月7日，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向路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区扑来。9月15日，我军四支队七团奉命打击盱眙西高庙一带敌人。17日上午，他们在龙王山附近与敌遭遇，立即抢占龙王山，构筑阵地，挡住敌军扑向中心区的去路。敌方500多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我龙王山阵地的一营猛扑过来。炮火轰平我方刚挖起来的战壕和新筑成的简单工事，我军没有一个人退缩，再挖战壕，再修工事。敌人下来了，到了短距离内，手榴弹猛摔过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击，把来犯者压下去。尽管敌人攻势一次比一次人多，炮火一次比一次猛烈，七团一营仍坚守阵地，巍然不动。数十次进攻未能越雷池一步。最后，敌人更加疯狂，以更猛烈的炮火向龙王山顶轰击。为了减少伤亡，我军大部分兵力转移到山后，只留少数人坚持在山顶阵地。同时二、三两个营向敌后迂回，准备前后夹击，予以痛歼。七团政委徐世奎同志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红军干部，

他身先士卒，来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徐政委一面注意我军迂回的情况，一面观察敌人的动态。这时敌军发觉自己有被消灭的危险，便以更加猛烈的炮火作掩护慌忙逃窜。正当七团团团长秦贤安同志发出总攻的信号、全团吹响冲锋号的时候，徐世奎不幸被敌冷枪打中，光荣殉国。

噩耗一经传出，七团战士个个义愤填膺，都要为徐政委报仇雪恨。士气越战越旺，穷追猛打，一直把敌人追进盱眙城。

敌人十二天的“大扫荡”，在我军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下，被彻底粉碎。战斗胜利结束，路东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经过这次锻炼和考验，证明七团不愧为老红军，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

奇袭盱眙城

朱云谦

奇袭盱眙城，发生在1944年农历除夕前夜。当时我任新四军二师盱嘉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并兼盱（眙）嘉（山）县委书记，直接组织和指挥了这次战斗。

盱眙城，位于洪泽湖以南的淮河南岸。是江苏、安徽两省交界的重要城镇。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盱眙，国民党县长望风而逃，有数不清的男女群众惨遭日军杀害。为了掩护津浦路长江防线以及汪精卫卖国汉奸政权在南京的安全，日伪军在这里经常驻扎着500多人。他们修碉堡，挖战壕，把盱眙城建成了顽固堡垒。当国民党政权瓦解之后，我党我军即进入盱眙县境了，发动群众，在农村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日伪展开了顽强斗争。但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对敌斗争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胜利。

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日本侵略军从正面战场腾出手来，加紧了对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一再进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到我根据地“蚕食”破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各抗日根据地都处于困难境地。为了渡过难关，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号召精兵简政，在各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作战的需要。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原来的8个县调整合并为4个县。盱眙、嘉山两县合并为盱嘉县。1943年8月，上级派我兼任县委书记后又兼支队

司令，对全县实行一元化领导。

盱嘉县境内敌人有两大据点，一是津浦路上的明光镇，另一是盱眙城。整个县境有一半地区，受到这两个据点的威胁，特别是盱眙城外的高庙、穆店、维桥、老子山4个区处于城郊，经常受到日伪军的骚扰，可以说是昼夜不安，鸡犬不宁，群众的生活十分痛苦。这一带还先后发生过地方武装干部被害、被俘和个别人叛变等事件，日伪气焰相当嚣张。

我担任县委书记后，同调整后的县委领导班子反复讨论了如何改变盱嘉的形势。大家都认为，首先要把武装斗争真正放在首要地位，集中力量打一次或几次有意义有影响的胜仗，狠狠惩罚盱眙城内的敌人，给他们点苦头吃吃，以打击敌伪的反动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胜利的信心。

根据我们当时的力量，要消灭盱眙城内的日伪军是不可能的，对所有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也难以取胜。我们对敌情进行细致的分析，决定采取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方针。日军第十三旅团的铃木中队200人，步、马、机、炮武器样样齐全，战斗力较强。他们驻扎在城东的照面山上，有梅花形阵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能看到几十里外的情形，易守难攻。我们决定对它严密封锁，围而不打，使鬼子心中无数，不敢贸然出动。伪保安大队有100多人，大队长董树棠思想动摇，同我方有点联系，这个大队要打一下，主要是给董施加压力，逼他进一步向我靠拢；而且还能掩盖他同我方的联系，避免鬼子生疑。伪县政府警卫队、伪警察局和伪区队，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是罪行累累的汉奸走狗，我们决定坚决彻底消灭之。

在进攻盱眙城之前，县委在全县乡村进行了普遍的政治

动员。在洪子庙召开了“控诉日军血洗盱眙城五周年纪念大会”，控诉日伪战争罪行，宣扬抗日英烈事迹。会场上挂满了挽联、悼词和抗日诗画，吸引了大量群众。其中表现本地真人真事的连环画，最受广大群众注目。这里有《日军病魔到近郊，县长早就望风逃》，《强奸哪管老和少，杀人尸横满城郊》，《千年栋宇变灰烬，全城无土不成焦》，《万字会二百多人死于屠刀下，明伦堂三百余口被集体枪杀》，《洒金桥填满尸体，观音庵白骨成堆》等等，令人触目惊心，义愤填膺。连盱眙城内的许多群众，也跑出来观看，无不悲愤交加，眼含热泪，不少人还痛哭失声。我们盱嘉支队干部战士和各区乡的民兵，参加纪念大会后，更是同仇敌忾，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一定要打进盱眙城，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1944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我们调集了3个连和1个侦察队，还有区队及民兵，集中在洪子庙以北的马郢。按照作战计划，兵分两路，由4名向导带路，静悄悄地向盱眙城进发。一路由参谋长祝平安率领，从山口门、东门口指向伪保安大队和区队驻地；一路由我率领，从戚家大山脚下的日军碉堡跟前穿过去，经过核桃港、大井洼到坡山口，然后再分成三股。一股经驴市头、胡家巷向老大关的伪县政府冲去；一股从坡山口直下，到大王庙伪县警察局附近埋伏；另一股由我和胡坦、魏小昆等率领，经大井洼到达照面山日军铃木中队部对门的大操场，占领了一个白天有岗哨、夜间有灯无人的空碉堡，堵住敌人的大门，在午夜12点之前，各路兵力都到达指定地点，一切部署就绪。

午夜12点刚过，也就是1944年农历除夕凌晨，埋伏在伪县警察局周围的我一个连首先打响。战士们互相踩着肩

头，翻过墙头，摸掉岗哨，随即发起攻击。枪一响，80多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伪警察从梦中惊醒，手足无措。伪警察局长王亚民当晚没有住在局里，无人指挥，敌人乱成一团。大门外早有我们两挺机枪堵着，伪警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全部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在伪县府旁边汪家茶炉巷口，出现了两名醉汉，互相谩骂扭打，拉拉扯扯来到伪县府大门口。在门口站岗的伪县警卫队的两名哨兵急忙大喝：“干什么的？不准通行！”说时迟，那时快，两名醉汉到了哨兵跟前忽然停手不打，一个人卡住一名哨兵的脖子，随后赶上来把哨兵枪缴掉，然后拥进县府大院。原来两名醉汉是我军战士扮演的，敌人措手不及，伪县府警卫队全部被缴械，伪县府官员也大部就擒。可惜的是，伪县长栗余爬上屋顶的天沟里躲藏起来，因天色漆黑未能发现，被他侥幸漏网。

驻在照面山上的日军铃木中队，听到城内枪声响了一阵，很快就停止下来，不知究竟，加上夜色茫茫，更不知我军虚实，根本不敢出援，守住碉堡一动也不敢动。他们哪里想到，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我军不伤一兵一卒，就把伪县府和伪警察局一锅端了。这次战斗加上伪区队和保安大队，我军共歼敌200余人，缴枪100多支。天还没亮，我们就带着俘虏，踏着晨露顺利地撤出县城，回宿营地准备过春节了。

这次奇袭盱眙城，从军事上说，不是一次大仗，但在当时华中敌后，我军无一伤亡，攻进敌伪盘踞的县城，是很难得的。就整个根据地来说，这种例子也不多。“新四军奇袭盱眙城”，打击敌伪的气焰，振奋了敌后军民的抗日精神，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

辉听了我的汇报，称赞这次战斗说：“论兵力，敌我相当；论地形和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但是战机选得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占了优势。古代和近代战争史上，都有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巧字。”在罗炳辉的启发和引导下，我们总结了奇袭盱眙城的经验。大家都认为以下几条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一是情况明。情报工作做得好，对城内敌伪情形了如指掌。县委联络部长胡坦，通过各种关系，把城内敌情摸得一清二楚，准确无误。联络部的魏小昆搞来了敌人布防图，还有敌军的口令。二是战机选得好。敌人正准备过春节，思想麻痹。我们在除夕前夜发动进攻，出乎敌人意料。三是军事斗争的方针对头，区别情况和打击重点，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法，自己无伤亡战胜了敌人，从而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奇袭盱眙城的胜利，使日军进一步孤立，伪保安大队也更加倾向我们，伪势力受到很大削弱。为了加强对敌军事斗争，保护农村人民发展生产，县委研究，把盱眙城外4个区靠县城的几个乡，合并为临城区。从4个区抽出4个区中队，合编为临城区大队，专门同县城内敌人相周旋。同时在区政府所在地洪子庙开辟贸易集市，吸引盱眙城内的商贩来此做买卖。通过集市商业来往，既可以引进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也可以搜集城内的情报。临城区的设置，一方面集中了力量，统一了城郊对城内敌人的军事斗争，又减轻了原有的4个区的军事压力，能够用更多的力量从事政权建设和组织发展生产，使广大群众政治热情逐渐高涨，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参加新四军的热潮，民兵组织也日益壮大。在全县人民的支

持下，我军不仅在盱眙城外任意驰骋，我们的便衣人员还能经常进城活动，掌握了敌人的一举一动。

1944年春天，曾经向我军投诚的高立志等10多人，又叛变投敌，躲进了盱眙城内，高立志还当上了伪区长。县委决定坚决打击这一小股叛匪。我化装成商人，带着化了装的侦察参谋徐继高、作战参谋周跃荣和警卫员，在向导带领下进了盱眙城，侦察了高立志等人驻地的地形。回来之后，我们组织了一次突然袭击，除高立志潜逃外，其余10多人全部被捉回，由民主政府依法惩处。

1945年5月，上级调我到淮南（津浦）路东军分区任副司令员，离开了盱嘉县。1945年7月，我随部队来打盱眙城，一个月后，日本投降，兄弟部队解放了沦陷7年多的盱眙城。

顺河集战斗

唐国干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六师五十二团当排长。1941年，我们这个团从苏南渡江北上，开辟新根据地，后归属一师指挥，一直转战在苏北。在同日伪进行的几十次较大的战斗中，顺河集这场白刃血战，就像刻在我心里一样，现在仍记忆犹新。

1945年春节，正当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欢度新春佳节之际，日伪军根据情报，知道驻守军部附近的我二师的主力已开赴津浦铁路以西，便乘机大规模向淮南进犯，妄图围歼我新四军军部。我团指战员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军部，保卫根据地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在顺河地区谱写了一曲淮北抗战史上的胜利颂歌。

顺河集战斗是一次敌我双方不期而遇的遭遇战。正月初三，我部完成了守卫原四师防地的任务，从泗洪的朱湖出发，向苏中地区开进。部队刚行动不久，新四军军部给我团发来急电，说盘踞在淮阴、宝应、高邮、扬州、仪征、六合、盱眙、来安八处的日伪军，企图分进合击，奔袭我驻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命令我团火速奔赴黄花塘，保卫军部。我团接到军部命令后，迅即沿洪泽湖的北侧，准备从盱眙县的顺河集渡过张福河上淮浦公路，尔后折向南直奔盱眙县的黄花塘。从淮阴出发的那路日伪军，顺着淮浦公路由北向南，打算在马坝同宝应和高邮那两路日伪军集结，正巧在顺河集同

我团相遇。

初五早晨，我们部队到了离顺河集 10 公里的地方，只见淮阴往南一路浓烟滚滚，战士们正议论时，东边飞来两个骑兵侦察员，向团首长报告了淮阴日伪军 1500 余人南下“扫荡”的情况：团参谋长胡乾修摊开地图一看，感到顺河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位于张福河的西岸，又能控制紧贴张福河的淮浦公路的南北交通。顺河集的正北约 1 公里的地方有个马庄，马庄隔河正对公路西侧的十堡村，便命令担任警戒任务的三营八连轻装跑步占领顺河集，并渡过张福河在洪泽湖大堤上淮浦公路的两侧狙击敌人。又命令七连从顺河集北边向东北方向张福河畔的马庄斜插，在公路西侧打援，配合八连狙击敌人，掩护群众向顺河集西南的湖滩转移。

七连、八连刚拉走，军部又发来一份急电。张云逸副军长命令我团以最快的速度抢占顺河集，狙击日军天井大队和伪军潘干臣二十八师一个团南犯，并立刻以两个营的兵力火速南下，保卫军部。胡参谋长与从后卫纵马赶来的张宜友团长研究后。命令我们二营四、六两个连全部轻装，准备协同三营七连、八连狙击南犯之敌，团直机炮连也抽两个班配合我们作战。淮阴这路日伪军是敌人的主力，为了打胜这场遭遇战，张团长和胡参谋长留下指挥战斗，其余部队在政治处副主任郑克同志的率领下奔赴黄花塘。

七连到了小东庄，庆丰乡民兵班长周明甫自告奋勇把队伍带到马庄。马庄东南方向有一片乱坟地，七连利用这有利地形，迅速占领了侧击阵地。

八连跑步占领顺河集后，派一个排向北运动，迅速占领苹果园，重机枪班选择街北的城隍庙制高点架上重机枪，以钳制十堡村方向的敌人。其他两个排在指导员岳行和、连长张仁远的率领下，由顺河集的工会会长朱兆芳领路，准备渡过张福河，抢占从淮阴通往高良洞的公路大堤。朱兆芳把队伍带到杨家渡口，渡船早已不见踪影，只见两岸稀疏的芦苇在冷风中不停的晃动。河边结着一层薄冰，河中心无冰有浪。这时水寒彻骨，而且河深水急，要抢渡过去是困难的。往日的渔船，今朝听见枪响，早起锚进了洪泽湖。怎么办？耳听得北边十堡方向，枪声越来越密集，敌人越来越近，我区队、乡队的民兵力量薄弱，在沿途狙击中必然会有较大的伤亡，如在半小时之内不能进入大堤阵地，那么敌伪军就会不顾我侧面封锁而长驱直入，时间十分紧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工会会长想起下游一里多路的地方，河中有一浅水坝子，估计那里只有齐腰深的水，可以涉水过去。他马上带着八连往南跑去，过了一片柳树丛，忽见三年前当过伪保长的曹志献撑条小木船靠了岸。老工会会长叫他把部队送过河，哪知这个家伙非常狡猾，推说船里满满一舱煤，不能再装人。老工会会长不由得火冒三丈，当即喊来十多个民兵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把船上煤统统卸掉了。他随即跳上小船，手握船篙，冒着寒风一趟一趟地把同志们送过了河。

八连过河后，由民兵分队长邵官堂带路，沿着大堤上的交通壕，迅速运动到了丁家窑跟前，占领了阵地。这里离被敌占领的十堡大沟不足一里路。大堤西边是张福河，东边是

一片沼泽地，淤泥很深，不能行人。大堤顶上是公路，被民兵挖成“之”形交通沟，沟沟相连，沟沟相通，只能走人。不能行车。战场就是堤顶加两坡，不超过60米宽，敌我双方兵力都受狭长地形限制，大部队展不开，阵地上只能横排几十个人。

三排刚进入阵地不久，伪军一个连朝这边冲来，上午10时，双方接上了火。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打垮了伪军两个连的轮番进攻，我军守住了阵地。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碰上我们这支部队。当他们发现我部从西向东开过来时，他们原想乘我大部队尚未过河，向南冲过这一段公路，没想到新四军这么快就出现在这里。

敌人见冲锋占不到便宜，就从十堡村北面向我阵地打九二步兵炮、掷弹筒。一阵狂轰滥炸过以后，伪军在前，鬼子在后，凭借轻重机枪火力掩护，又向我阵地扑来。敌人以为新四军主力到津浦路西去了，狙击他们的只是淮泗独立团地方部队，因而相当骄横。一个鬼子中队长手举指挥刀，站在破膏药旗下嚎叫：“八路小小的，皇军大大的！”催促部下往南冲。

八连三排在年轻的指导员岳行和、排长杜金飞的指挥下，越战越勇，接连打退敌人两次冲锋，守住了阵地。

一会儿，后退的伪军又被赶了回来，在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向我阵地再次发起了冲击。岳指导员倚在交通沟旁指挥，不幸左胸中弹，理发员王有芝急忙冲上去救护，也被敌机枪打中牺牲。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八连张连长率领二排冲了上来。在“为岳指导员报仇”的吼声中，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了回去，敌人在大堤下蓄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我方伤亡也不小，三排长杜金飞和二排长赵有土都先后牺牲了。

二

我们四连刚进顺河集，见一股跑反的人流由北向南似潮水一般涌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牵牛赶猪，

扛粮挑被，黑压压一片，布满了麦田，挤满了街道。有的要继续往洪泽湖下滩跑，有的要回头找人，你冲我撞，乱成一团。跑反的群众经区、乡干部、民兵的维持，又加上见我们主力部队到了，情绪才稍有稳定。

目睹这哭爹喊娘，呼儿唤女的惨状，我们恨不能立即上大堤痛揍日伪军。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请战。

这时，顺河集西街急驰来十余骑，张团长和胡参谋长并辔而行，来至镇西交通沟前。张团长勒马后退数步，正欲策马跃过沟去，跑反的群众立即围上去，控诉鬼子、伪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十堡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张业正老汉同他一起跑出村里把路，见自己的小女儿还没有跑出来，忙跌跌撞撞回头找，边走边喊，还没有到村口，就碰上了敌人。顺河集的地痞、伪军李小狗子指着张业正说他是新四军家属。鬼子一听，手举枪响，张业正老汉便倒在血泊中了。人们争相诉说，纷纷要求首长下令消灭这股敌人，为死难者报仇。张团长向群众说：“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为大家报仇雪恨。”群情大为振奋，大家不再往湖滩跑了，区乡

干部忙着组织担架队，征集木料搭浮桥。团首长纵马跃过交通沟，沿张福河的西岸，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

大堤上硝烟弥漫，枪声、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我们四连奉团首长命令。由二营副营长李昌义率领去八连阵地换防。当我们赶到张福河边时，民兵和群众搭的浮桥即将完工。指导员余志耀抓紧时机作了战斗动员：

“同志们，你们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正月初五。”战士们齐声道。

余指导员接口说：“对！老百姓把正月初五看作是接财神的日子，今天我们要接个活财神，日本鬼子给我们送来了三八大盖子枪，你们手里的七九枪要换换装备了。我们要保持‘江阴老虎团’的光荣称号。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军部！保卫根据地！”

我们眼望着十堡村北滚滚浓烟，听着大堤上的炮声，心潮汹涌，杀敌怒火高万丈。

四连和炮班上了大堤以后，由我们一排先上去换八连的防。敌人发觉后，炮火延伸，轰击我四连与八连之间的大堤，妄图切断我前后方的通路。炮班用我根据地自制的两门八二炮反击，敌炮略一停歇，连长张云龙率领我们排突破了敌炮火封锁线，进入了八连阵地。

八连阵地上到处是伤员，战斗员都到纵深处设伏击圈去了。我请示张连长后，喊了声“二班、三班跟我来”，冲了上去，顺着交通沟运动到八连设伏击圈的地方。我们刚部署完毕，几十个伪军在前，十几个鬼子在后，进了伏击圈。当

敌人发觉中了埋伏时，我们的步、机枪一起吐出了仇恨的子弹，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丢下几十个死尸溃退下去。我们活捉了7个敌人，缴获了近20支三八枪。俘虏让八连带了下去，阵地上又恢复了平静。

我利用战斗间歇召开了紧急正副班长会。大家表示，一定要打胜这场狙击战，保卫根据地的群众，保卫新四军军部，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最后大家宣誓：“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

隔了十几分钟，敌人从大堤东西两侧分两路冲上来了。在离我阵地不足100米处，我步、机枪一齐开火，敌人又被撂倒了十余人，剩下的往回跑，我见敌人阵容已乱，跳起来大吼一声：“冲啊！”全排战士犹如猛虎一般跳出战壕，发起了反冲锋。我们边冲锋边向敌人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新四军优待俘虏！”有五个伪军跪下来缴了枪。我们把敌人一直赶至十堡大沟，又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一挺轻机枪。

正午时分，敌人的火力更猛了，他们用曲射炮、掷弹筒向我阵地猛轰。战士们说：刚才二鬼子蚀了本，现在日本鬼子要亲自上来了，我们照样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我们这个排战斗力比较强，有两个步兵班，一个机枪班。机枪班原有3挺轻机枪，刚才又缴获了一挺加拿大造机枪。枪不算少，但子弹不多了。张连长检查了武器弹药后，命令大家节约子弹，要在30米内显威风，坚守阵地。

不一会儿，敌人的步枪、机枪子弹又像大雨泼了过来，

打得我们掩体前的土堆像马蜂窝一样，弹洞密密麻麻。我们的战士对敌人的扫射冷眼相看。除几个人监视敌情外，其余的人有的加固工事，有的互相裹扎伤口，还有的从敌火力死角跑到河边捧冷水解渴。

张连长和我趴在土堆后面朝十堡村方向了望，从望远镜中。我清楚地看见一匹训练好的无人驾驭的日本大洋马驮着弹药箱在阵地上跑前跑后。我说：“怪道敌人子弹那么充足，原来有这畜牲从十堡村往阵地上运送弹药。”连长说：“找个神枪手来干掉它。”正好一班长周阿福刚从前面死鬼子身上找了弹药回来，连长把他叫到跟前说：“一班长，你看那匹大白马，干掉它！”一班长是个弹无虚发的射手，他转脸看见那头白马跑到大堤上，便端起三八枪，略一瞄准，“叭”的一声响，马头中弹，翻下堤坡。战士们见了拍手称快，敌群中引起了一阵骚乱。

敌人在疯狂地倾泻了大量子弹、炮弹以后，嚎叫着又发动冲锋。我们机枪班的几挺机枪枪管都打红了。战士们用小便泡湿了毛巾捂着枪管降温继续打。二班副高康的左胸中弹，趴在地上圆瞪着复仇的双眼对我说：“排长，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守阵地了，你们一定要狠狠打！”我说：“你放心吧，一定叫敌人用加倍的血来偿还。”我刚叫通讯员顾恒高同志把他背到后方抢救，余指导员的右腿又中了敌人的机枪子弹。

鬼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每人四颗手榴弹也撂得差不多了，子弹也所剩无几。我命令战士们准备拼刺刀。在敌

人离我们 30 米时，我喊声打，几颗手榴弹刚掷出手，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还没有停，全体战斗员端着刺刀乘着浓烟跃出战壕，杀声震天，冲入敌群，白刃格斗开始了。二班长虞阿品首先戳死了一个鬼子，我也跟着捅倒了一个。一个大块头鬼子兵睁着血红的眼睛向我扑来，被高邮小战士一刺刀捅进这个鬼子的左眼，鬼子“嗷”的叫了一声，手中枪刺一偏，戳进了我右腋下的棉袄，我往左边一闪，敞开着的棉衣被鬼子刺刀挑出去丈把远。高邮小战士反身又是一刺刀，来个后心见前心，结束了这鬼子的狗命。高邮小战士正从鬼子身上拔刺刀，另一个鬼子端着刺刀从他背后偷袭。我一急，腾身跃起，一个突刺，又把这个鬼子撂倒了。

我转身见三四个鬼子围着张连长转，张连长抡起大刀片，左挥右舞，前砍后拔，砍得鬼子刺刀火星迸发，当当作响。看情势张连长腹背受敌，一时难以取胜。我招呼了一声高邮小战士前往支援。里外合击，三个鬼子兵先后毙命。

别处的一个日军军曹吆喝十来个鬼子兵“啊啊”地喊着，像野牛一样地冲了过来。张连长一见，忙把我和高邮小战士一拉，三人背靠背，组成三角形，各对付一面，以守为攻，攻中有守，十来个鬼子近不得身，只得困着我们团团转。这样相持有十来分钟，鬼子稍懈，张连长眼尖，见左边二班长捅倒了一个鬼子，过来解围。便暗示我们俩，三人同时发一声喊，朝左边冲出去。在二班长的配合下，我和张连长接连捅倒四五个鬼子，带一身轻伤回到了同志们中间。不幸的是，断后的高邮小战士退步时，绊了一跤，未及爬起，便牺牲在

敌人的刺刀下。他的名字叫韩寿桃，不满 18 岁。小韩是贫农的孩子，放牛娃出身，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参加了新四军，他的英雄形象使我终生难忘。

这一场白刃战从中午 12 点一直杀到下午 2 点钟左右，我阵地后面传来了喊杀声。鬼子胆怯，仓惶往北溃退了。我们排原有 45 人，现在只有二十多人能作战了。各人的手上、袖子上、身上都溅满了鲜血，也不知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敌人在阵地上撂了上百具尸体，我阵地巍然不动。

喊杀声未落，二排与炮班赶了过来，见鬼子已退回去了，略追了一阵，便返回到阵地。二排来换防，张连长叫我们把伤员都送到顺河集去。战士们纷纷要求留下来，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张连长除允许我和机枪班长留下外，其余的都由余指导员带下去。余指导员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他指着张连长的肩头关切地说：“你淌了那么多血，也该下去包扎包扎。”张连长歪着脖子看了一眼肩头笑道：“蹭破点皮，没问题，你的伤势重，快放心下去吧！一排长给我留下来了。”说完，硬扶指导员上了担架。正巧，救护队也上来了。营部、连部卫生员抓紧时机帮伤员包扎伤口。当连部卫生员掀开张连长右肩破布片时，发现骨头已露了出来，不禁失声叫了起来，张连长训斥道：“小鬼呀，喊什么？包一下就是了！不要噓。”小卫生员点点头，眼泪簌簌地给连长包着。

邵官堂刚指挥民兵把余指导员等十余个重伤员抬上船，运往高良涧团卫生队抢救，老镇长等人挑着水桶，拎着篮子上来了。

二排长毛信存迎上去亲热地问道：“老镇长，有什么好吃的？”

老镇长笑道：“年糕、包子管你饱，山芋甜茶你喝不到。”说着，敲了敲被敌人机枪子弹穿了几个孔的水桶。

二排长伸过头去一望，见山芋茶桶漏得只能盖住桶底，馋得干咽唾沫，做个鬼脸，逗得战士们朗声大笑。

十堡村后的鬼子又朝我阵地打炮了。张连长命令二排立即作好战斗准备，炮班的同志回到炮阵地去以炮还击，掩护伤员、群众后撤。

三

敌人见正面硬攻不行，吃了大亏，就想设法从侧面迂回包围我堤上部队。汉奸李小狗子带路，领着敌人从张福河的暗坝上趟水过河。当这股敌人快踏上西岸时，柳树丛里七连指战员射出了密集的子弹，上岸的鬼子伏地还击，大部分纷纷后退。坝窄人多，鬼子中弹的中弹、落水的落水，不淹死也冻个半死。经过几分钟的激战，爬上西岸的敌人没有一个是活着回去的。坝上的鬼子也只逃回去半数。李小狗子刚溜回东岸，就被我击毙，一条腿还拖在水里。

日军天井大队长恼羞成怒，迂回不成就加强正面进攻。敌人的机枪子弹贴着地皮，打得尘土直飞；掷弹筒、小钢炮又封锁了我前沿通后方的道路。敌人看样子想在天黑前突破这道防线，又发动了冲锋。我们手榴弹几乎打光了，张连长把驳壳枪上的皮带往脖颈上一挂，号召同志们发扬四连老传统，用刺刀杀出威风。这时，五十多个鬼子突破我前沿阵地。

张连长在近战中发扬短武器的威力，用驳壳枪连续打死了4个鬼子兵，刚要向第5个鬼子射击时，一个日军小队长带了两个鬼子兵扑向张连长。日军小队长一发子弹打中了张连长的右胸。张连长左手捂着冒血的枪眼，继续射击，又击中了一个鬼子。不料侧面跳过来一个鬼子，一刺刀刺中了张连长。他正欲扑向鬼子小队长时，又被两个鬼子各刺了一刀。卫生员小刘不顾生命危险，徒手背着急救箱上去抢救，被一个鬼子迎住，鬼子连向他猛刺三枪，小刘灵活地躲避，头皮被刺了一条长长的血口。我一个箭步冲上去解救小刘，一刺刀戳进鬼子的背部，赶忙叫一个战士把小刘背回阵地包扎。这时，二排长毛信存一枪击毙了日军小队长，又一枪刺死了一个压在张连长身上的鬼子兵，把另一个鬼子吓跑了，他又去解救另一个战士。我戳死一个鬼子兵后，把张连长背回战壕。这时，连长的呼吸已很微弱了。

我跪下一条腿，把张连长倚在膝上，连声呼唤：“张连长！张连长！”

张连长的嘴唇抖动了一下，就在我怀里牺牲了。

我脱下自己一件单军装盖在张连长的遗体上，端着三八枪冲进格斗阵地。经过一番血战，敌人又抛下二十多具尸首缩回去了。

战士们抓紧战斗间歇从死鬼子身上搜集弹药，或者换去捅弯了的刺刀。

在我阵地后面的炮班，他们使用的八二炮，由于敌我相距太近，不能发挥作用。全班16个战士，除留下两个人看

炮外，其余的人全部从牺牲的战友手里拿过步枪进入了前沿阵地。

太阳偏西了，鬼子又组织了两次冲锋。由于我们缺乏弹药，不得不靠刺刀解决问题，后一场鏖战比前一场打得更艰苦。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同志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充分表现了革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炮班大脚板战士王开全，力大过人，他的脚特别大，总没有合适的鞋穿，行军时经常穿草鞋，破了赤脚走，还背一门八二炮。在这次格斗中，他左冲右突，撂倒好几个敌人，敌人见了，畏之如虎，往往几个鬼子合在一起也近不得他。我们使用的刺刀钢质差，王开全的刺刀不是捅弯了，就是捅断了，两场格斗，他前前后后换了五六根带刺刀的七九枪。王开全的骁勇引起了鬼子的注意，便向他打冷枪。大脚板战士不幸遭了毒手，头部中弹，鲜血直流，倒在堤坡上。二排长见状，丢下一个敌人给我对付，自己抢步上前抢救。这时，横里冲过来一个大个子鬼子兵，二排长蹲在地上，一个扫膛腿，把大个子鬼子摔了个仰八叉，三八枪撂出一丈开外。二排长刚要背大脚板战士后撤，那个鬼子又爬起来，猫着腰冲了过来。二排长一见，丢开王开全，迎了上去，两人扭在一起。在地上翻滚，刚翻到一个土堆下，二排长骑在大个子鬼子身上。正使劲卡鬼子脖子，不料，肩膀被一个鬼子小队长劈了一刀。炮班班长陈彬杀得两眼通红，刺刀捅弯了来不及重换，大步赶过来抢救二排长。他一脚蹬开那个鬼子，手背被鬼子刺刀穿了一条口子，也不顾疼痛，抡起枪托砸烂了鬼子小队长的

脑壳，招呼另一个战士，背起昏迷过去的二排长退到了战壕里。

阵地上，虽然敌人死伤数量几倍于我，但我方战斗减员也越来越多。正在这时，三排增援上来了，喊杀声震耳欲聋，顿时堤顶上、堤坡上到处响彻刺刀的碰击声，勇士们的呐喊声和敌人的嚎叫声。经过十多分钟的格斗，敌人招架不住了，狼狈逃窜。只见南边的敌人转身夺路而逃，挤得北面的立脚不稳，互相践踏，我们把他们一直压回到十堡大沟。

环视阵地，敌尸狼藉，枪支弹药扔得到处都是。我方的伤亡也较大，二排长毛信存、三排长贵瑞兴都在白刃战中壮烈牺牲了。一个炮班和两个排加在一起，连带伤作战的也不足一个排的兵力，连排干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时我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支部委员，应该把指挥部队的任务担当起来，继续作战。为了军首长和根据地人民的安全，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同敌人拼到底。我迅速地把战斗兵员召集起来，重新编了四个班，临时指定了班长，分发了弹药，准备好对付敌人的再次冲锋。

十堡村的敌人又蠢蠢欲动了，轻重机枪声越来越紧。我方阵地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在静静地等待敌人送上门来。突然，南边响起了急促、昂扬的冲锋号声，原来是六连在张团长指挥下增援上来了，担架队、救护队也尾随着上来了。

与此同时，胡参谋长带了团部的几个参谋人员骑马从马庄向北至赵集桥口，从望远镜中观察九堡与十堡之间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发现一群鬼子、伪军军官簇拥着一个骑高头

大马的老鬼子军官出了九堡村。胡参谋长断定：这老家伙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天井少佐，便翻身下马，从警卫员手中取过一支三八枪，利用柳树林作隐蔽，悄悄地接近河边。离目标 200 多米时，选择一棵老棠梨树作依托，“叭”的一枪。天井少佐颈部中弹，栽下马来。顿时，枪声大作，敌人失去了指挥，乱作一团。再加上南边冲锋号一响，六连和四连一部分兵力发起了猛烈的反冲锋，十堡的敌人抗不住了，九堡的敌人也不想守了，一窝蜂似的朝淮阴方向溃退，兵败如山倒，越发不可收拾了。

狙击战胜利结束了。顺河区远近十几里的老百姓带了煮熟的鸡蛋、包子、馒头、年糕来慰问子弟兵。我们在晚霞中整顿了队伍，高唱着《胜利之歌》《大刀进行曲》《我们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南下了。顺河集一带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送，张团长一再挥手请老乡们回去，乡亲们仍站在老堆头高处招手，依依不舍。我们连的战士不断回首，直到老堆头上的人影完全消融在苍茫的夜色里。

第二天，我们部队行进至淮河边的观音寺附近，又遇上了从宝应乘船来马坝集结的那路日伪军，轮船头后边挂有大约十一二条拖船。我们刚开火，敌人的船队连忙掉头往回逃窜。以后听说，在我们进行顺河集战斗的同时，我们的来安支队把来安这路日伪军也击溃了。我们的节节胜利，把其它各路去围攻黄花塘的敌人吓得龟缩回去了，日伪军妄图围歼军部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

气壮山河的顺河集狙击战，我们共打垮敌人 14 次冲锋。

敌人被打死 270 多人，其中日本鬼子近 70 人。我方当时阵亡 26 人，以后重伤员中又牺牲了 9 人。顺河地方政府和群众收埋了烈士的忠骨。造了陵墓，建了纪念碑。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在追悼大会上向死难烈士致哀，并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他说：“顺河集这场血战，把日军八路进攻淮南，‘扫荡’军部的部署粉碎了。”烈士和英雄们的碧血保护了根据地的人民，也赢得了保卫军部的主动权，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悲壮、慷慨的篇章，为顺河地区的人民世代传颂。

在淮南军工厂的艰苦岁月

吴运铎

1941年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等四十多位干部和工人分配到二师去建立新的兵工厂。

我们背上了背包，从苏北阜宁出发向淮南前进。我们日夜赶路，穿过日军据守的炮楼，越过敌伪日夜巡逻的公路，渡过大运河，乘船进入洪泽湖，到达淮南新四军二师司令部。在欢迎我们的晚会上，罗炳辉副师长致欢迎词，还宣布成立二师军工部，吴师孟任部长。师文工团特地为我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次日，吴师孟部长找我们谈了半上午，给的任务是，要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年产60万发步枪子弹的工厂，还分配给我8个技工，由我任股长。

当天傍晚，我们9个人就到了天高县金沟区的平安乡小朱庄（现为江苏省金湖县）。庄子里有二师的一个修械所，这就是我们建厂的基地。区乡干部热情地为我们腾出两间大草房，我们的“茅屋工厂”就从此诞生了。但要建立子弹厂，首先就得有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床。可是在这被敌人封锁的敌后根据地，工具和机床又从何而来呢？我们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从铁锤、锉刀到各种机床，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劳动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纵有困难九十九，难不倒我们工人一双手。

为了早日建成子弹厂，从师参谋处到军工部领导，从区县政府到广大群众都动员起来，为我们收集破铜烂铁、木材煤炭。收来的破锅烂罐，只能做手榴弹，要寻找制造工具和机床的钢铁，不知何处才能找到，急得我们日夜奔走，四处打听。

后来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打听到：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要在高良涧一带建造水闸，兴修水利，运来过一批钢材和破旧机器。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那批钢材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沉到三河里了。这波涛汹涌的三河，钢铁究竟沉在何处？材料科的同志们走家串户，终于查明了那批钢铁的下落，并由当地区委和材料科组成了潜水的打捞队。他们都是渔民，只穿一条裤衩，在船板上忙着下水前的准备。打捞开始了，他们接过人们递来的半碗抗寒酒，咕噜噜一饮而尽，纵身一跳潜入河底。只见所有的潜水员忽沉忽浮地换气和掏泥挖沙，直到太阳西沉，一根钢棍也没捞上来。

次日一早，打捞工作继续进行。随着缆绳上升，一根粗8公分、长5公尺的钢柱被提出了水面。岸上和船上的人们，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紧接着各条打捞船上响起了时起时落的欢呼声，一根一根钢柱被提出了河面。这一大批钢柱不但解决了眼下急需制造子弹冲床的丝杆的钢料，并为后来生产迫击炮弹、枪榴弹筒和平射炮打下了物质基础。

我们获得了大批钢铁后，军工部又送来一部4呎(英尺)皮带车床，一部皮带钻床和一部牛头刨床。这真是双喜临门，

同志们更是信心百倍，喜笑颜开，建厂工作日夜加紧进行着。可是新的矛盾又发生了，这“茅屋工厂”既安装不下机床，也放不下钳工案子，需要找到更大的厂房。房东大娘热情地告诉我，小朱庄北边有一个仙墩庙，可当工厂。当天，我就找到仙墩庙，取得日光和尚的同意，我们搬进了仙墩庙，在大殿里安装了机床，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加工车间。

我们还在庙门外搭了席棚，用土砖垒个打铁炉，支上风箱和铁钻，建立了锻工车间。同时，还建立了木型(模)车间。所有铸造件，只要把(模)送到手榴弹厂，同志们就会迅速为我们铸造出来。我们的军工厂已初步建成，这只是一个机械加工厂，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制造生产子弹的机床。

进庙以后，二师司令部周骏鸣参谋长、军工部吴部长都常来指导，首要的工作是制造冲压子弹的大冲床。由于有了钢材，我开始了这冲床的设计。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我设计的是螺旋冲床，由3根螺旋杆组成。每根螺旋杆上有六条方形螺纹，每条螺纹是360毫米为一圈，

它像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油条。按常规加工就得使用铣床，我们没有铣床，只得让钳工用钢凿雕刻出来。为适应经常进行反“扫荡”战争的环境，我们设计的冲床必须是积木式的，打起仗来把螺丝拧掉，一人拿一件就走，打完仗把机件拼起来拧紧螺丝就干活。最后一个设计要求，是我们没有发动机，推动机器的动力是人。

图纸画完后，我们的工作更是紧张了。大冲床一天一天地接近完成，可是没有水泥作地基，用木料代替水泥作地基

是可能的，但必须是质地坚韧的高级木料。这样大块的木料又到何处找呢？

我给金沟区政府写信，请求帮助。离工厂不远的东阳大云山上有株特大的白果树，区政府把它给了军工厂。

冲压子弹的冲床上三根螺丝杆已刻制成功，可是这螺丝杆上的母螺帽又怎样能制造成呢？我们没有铣床做不成。在当时条件下，办法就是做一个有母螺帽空腔砂型的砂箱，把刻制成的丝杆置在砂箱中，将融化了的铜水铸入砂箱而形成母螺帽。偏偏我们又没有大型的熔铜坩埚。在那年月，别谈我们这毫无工业的农村里找不到，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这熔铜坩埚也是要进口的。我们的办法就是找来大口径的废炮弹当坩埚来熔铜，不料炮弹用一次就腐蚀得像个蜂窝，熔铜是生产弹药必不可少的工序，我们必须建立熔铜车间，这就首先要学会制造坩埚。

我们买来了造坩埚的粘土，造了一个小坩埚，把它放在炉火上，不料刚一转身，坩埚炸成了碎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坩埚，结果都一样。我们召开了“炉前会”，都认为坩埚放在火上温度太高，干燥太急，湿坩埚内的水蒸汽来不及放出把坩埚引炸了。我们总结了教训又继续试验，把湿坩埚放在火上缓慢加温，坩埚慢慢地烧红了，同志们都为这点进步高兴。我拿起铁钳把一块一块碎铜添进坩埚，风箱越拉越快，蓝色的火焰从炉中升起，屋子里飘浮着柳絮般氧化铜，金黄色的铜液已熔满半坩埚。不料，忽然又是一声爆炸，铜水向四方喷射，拉风箱的同志的头被烫伤了，几小点铜水喷

上我的胳膊。铜水下流，把炉桥也凝结了。我们修好炉子，继续干，一连几次都失败了，急得大伙饭也不想吃，觉也无心睡。夜，静悄悄的，疲倦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院落里，有人抽着烟锅子，低头想心思，有的在低声议论，“别看咱们这么大个工厂，连化个铜也化不了”“瞎！真没出息，还不如一个补锅匠”。我思想突然受到震动，是呀！补锅匠的坩埚不是很耐用吗？他是怎样做出来的？鸡叫头遍了，我跑到区上，找到何区长，说明来意，我要去龙岗镇拜师。在何区长的帮助下，我们请来了补锅的刘师傅。

刘师傅一到厂就检查了我们做的坩埚，还看了我们做坩埚用的粘土，摇着脑袋说不行。他立即带领我们去铜城，买来一种硬得像石头般的灰黑色的耐火土，并在炭渣里找了几块没烧透的炭块。他把耐火土和炭捣得粉碎，加上水像做馒头和面似的，把一团泥揉来揉去，挖了一个坩埚，然后寻来一些碎柴慢慢烧着，把坩埚烤干。

大家留心地观察着刘师傅的一举一动，看他怎样装炉、安坩埚，怎样掌握炉温。刘师傅若无其事地操作着，坩埚里熔满了金黄色的铜水。我用长柄铁钳夹住坩埚，把坩埚里的铜水浇铸到砂箱里，坩埚仍然是完好的。就这样，试验成功了。我们激动地感谢刘师傅，他也高兴地捋胡子笑了。

我们白天黑夜的劳动，相继制成了生产子弹和迫击炮弹所需的工具和机床。司令部又派来一百多个小伙子当工人，区政府把派到工厂摇机床的民工也组织好了。开工这天，我们像过节似的高兴。同志们穿上新军装，铁钟一响，涌进了

大殿。我装上一发子弹壳，在冲床的吼声中，第一发弹壳形成了，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民工们把机床摇得飞转，机床全部开动了，弹头冲床也压成了一颗颗弹头。装备车间的女工同志忙着制造火帽，装填弹药。

在党的领导下，在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下，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终于建成了新四军第二师的军工厂，我任厂长，洪泽同志任指导员，生产了子弹、追击炮弹、地雷，不断补充部队弹药，坚持敌后抗战。

大王庄沸腾的生活片段

梅延庆

抗日战争进入后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在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地区的扫荡以后，于一九四二年底至四三年初，新四军军部直属单位转移到津浦路东的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军部驻在二师师部原驻地黄花塘，军政治部，华中局的城工部，新华分社，在离黄花塘约三、四里路的大王庄。陈毅代军长、饶漱石代政委、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等住在黄花塘。住大王庄的首长还有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组织部部长张凯(兼军直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部长钱俊瑞、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锄奸部部长汤光恢、副部长梁国斌，城工部的刘晓、刘长胜两部长，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新华分社社长范长江、副社长于毅夫等。

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的战线拉得很长，兵源不足补给困难，日本本土常遭美国空军轰炸，军事上处于顾此失彼的困境，日子很不好过。与此同时国民党驻安徽的李品仙部队，常常对我二师制造磨擦，我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根据毛主席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指挥二师指战员奋起反击，给李品仙部队以狠狠地教训，李品仙成了我罗师长的手下败将，从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期抗日战争的形势对我有利，我军得以争取这一段较为稳定的间隙和良好的环境进行整风、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大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

我当时在军直政治部当通讯员，不接触上层领导，但毕竟置身于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而且生活在一起，也星星点点耳闻目睹了一些生动有趣的动人事例，受到了教育。时间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从不忘怀，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好像还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我觉得在淮南大王庄这段时间的工作、学习、生活非常有意义。现就我所知追忆如下：

军民关系 亲如一家

我们进驻大王庄后和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好似兄弟，军爱民，民拥军，老百姓把宽敞的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后来我们自己也盖了些干打垒的房子），平时我们帮老百姓做一些挑水、扫地等家务劳动，农忙时帮助他们插秧、除草、割麦子等农活，我们虽然不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但干起来卖力、认真，又不取分文报酬，老百姓感动不已，说新四军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民军队实质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工农及其子弟。当时流传着一首歌：“青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前线？叫声呀老乡，你听分明，这个就是坚决抗日的新一军，新一军呀来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呀也要拥护抗日的新一军，军民呀合作大家一条心，赶走那个日本鬼子享太平”。这首歌生动地反映了军民鱼水之情。

除了军民关系外，我们和地方的关系也很协调，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真正做到了军政一致，军队尽量减轻地方和人民的负担。节约开支，还帮助地方政府做宣传工作，不仅宣传抗日打鬼子的道理，还号召群众支持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协助社会治安等，同时宣传地方的好人好事。如淮

南大众剧团，春节时来大王庄开军民联欢会，玩旱船时，唱了一首用民间曲调谱写的歌子，歌词有好几段，我现在仍能记得头两段：“半塔有个山头乡，全乡都在山顶上，山东的老乡当家乡，赵明奎当乡长，群众中有威望，咿呀子哎，他这个乡长啊不平常啊。”“赵乡长老家啊是山东，十多年前来路东，山头刨荒苦混穷，砍砍草帮帮工，苦生活省吃用，咿呀子哎，苦到后来成啊成中农嗯。”这歌子在群众、军队中流传演唱，效果很好，增进了军政军民感情，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军队。

自力更生 克服困难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封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毛主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驻大王庄的军政治部、军直政治部、华中局城工部、新华社分社都动员起来上至部长、秘书长、社长，下至警卫、通信、炊事、饲养、运输人员，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去了，我们自己种稻、种菜、养猪、磨粉丝，尽量自己解决粮食蔬菜的供给。烧草，我们年纪轻的就到离大王庄30里路外的天长县的铜城镇上去挑柴草。为了把稻子、蔬菜种好，白天积肥拾猪粪，晚上送肥下田，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虽然辛苦，但情绪高昂，虽苦犹乐。夜餐只啃几个冷馒头，吃的还津津有味。为配合地方的集市贸易，方便群众，政治部领导还组织我们警卫班和通讯班的年轻人去铜城镇运盐，晚上挑到高桥，在当地歇一夜，第二天在高桥集市上卖。这也可算是当时的“官商”吧，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谋取暴利，而是方便群众，活跃市场。这是领导交待的原则，我们是明

确的，自然是严格遵守。销售食盐是一时之举，时间不长，只是整个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在种番茄时，我们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在军直政治部门前，由干部种了一片番茄，军直政治部的组织股股长刘志诚同志，干事黄群华同志，还有城工部的徐雪寒同志等，都亲自参加栽种，宣教股长顾前同志，副股长冯村同志，宣教干事单士忠同志，搞美术工作的老宪洪同志，组织干事李康同志，锄奸股的贺孟先股长，胡福瑶副股长，文工队队长张望同志，队员丁世贤，魏娥同志等都为种好这片番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整地除草施肥，淌了不少汗水。植株成活后，长势喜人，枝叶繁茂，颜色绿中泛黑，大家以急切的心情欣赏自己亲手栽种的番茄，心想滋味一定甘美适口，可是长出的番茄只有鹌鹑蛋那么一点大，颜色倒也好看，橙黄晶莹，大家还以为没有成熟，天天盼望，恨不得“拔苗助长”，结果再等还是那么大一点，这时大家还以为我们没有经验种坏了，长僵了，后悔不已，把它统统拔掉了。后来不知道那位同志说，我们种的那种番茄，是优良品种，叫葡萄番茄，就是那么大，营养价值可高啦，生吃、做菜味道俱鲜。还是供给罗斯福总统吃的好品种呢。大家一听恍然大悟，非常可惜，但农时已过，不好再种，无可奈何大笑一阵，自我解嘲了事。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克服了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吃上了米饭、馒头，蔬菜品种也较丰富，有时还能吃上一顿红烧肉，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增强了干部战士的体质，提高了工作、学习效率。

整风学习 统一思想

在大王庄期间，除正常工作、生产外，干部还要参加整风学习。我们当战士的虽然不参加整风，但也间接受到了一些教育，如文化教员教我们唱的歌子，就是以整风为内容的；现在我还能记得这首歌的歌词：“敌后五年，坚持着万里战场，牺牲奋斗，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为了胜利，为了胜利，更要把我们的党性加强，反对主观主义，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宗派主义，要一切服从党，反对党八股，不做空洞无物的文章，把毛泽东同志做榜样。……”这首歌把这次整顿三风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文化教员再作些讲解，我们大体上也晓得整风的意义了。为配合整风学习，政治部还组织演出了苏联话剧《哥尔洛夫》，当时条件很差，布景道具只好因陋就简，沙发用木头钉个架子，再用稻草垫垫，蓝布包包扎扎。话剧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客里空”。这是，翻译过来的名词，意思是反对新闻报道中的凭空胡编欺骗读者。对改造我们的思想，提倡实事求是起一定作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黄克诚、粟裕、罗炳辉、谭震林、彭雪枫等首长都来过大王庄，我们当小鬼的也正好遇到这一难得的机会，眼福不浅，目睹这些身经百战首长的英姿，感到是一种特殊荣誉，兴奋异常。谭震林同志、彭雪枫同志还给政治部的全体同志讲了话，我们有幸聆听，很受鼓舞。当时我们这些“小鬼”不知道这么多首长来军部的任务是什么，后来想，可能是来华中局参加整风学习的。驻大王庄时，上海来了一批青年，年龄均十八、九岁、二十几岁，有男有女。来后有的参加速记训练班学习，有的分配到直属政治部

文工队，有的分配做了其他工作。来的这批青年中有“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的女儿沈普小姐（范长江社长的爱人），有沈映虹同志（刘志诚股长的爱人），有陈明同志（黄群华同志的爱人），有白文同志及其母亲，白在上海时就是知名度很高的话剧演员。这些热血青年，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的投笔从戎，有的放弃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优越舒适的生活，毅然来到艰苦的淮南根据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革命壮举！特别是沈普同志这样的名门闺秀，坚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战争，过那样艰苦的生活，真是难能可贵，精神感人。

日本战俘 接受教育

1944 在大王庄时，敌工部还办了一个一日本战俘训练班，和军直政治部住在一起，大约有十几个人，看样子年龄均在二十几岁，有的甚至三十岁以上。训练课程由李亚农部长担任，李是日本留学生，讲的一口流利的日语，李在讲课时，我能听到，但听不懂。

这些日本战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天天见面，开饭时我们一起到大伙房打饭，其中有的汉语讲得非常好，听起来不像日本人学讲中国话，一点也不生硬。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战俘一起去伙房打饭回来，我把他叫到我们宿舍，问他日文里的那个“④”是个什么字？怎么用？他告诉我这个“④”字在汉字里是草写的“四”字，在日文里是当“的”字用，发音不读“的”。一个字给我讲的清清楚楚。这些战俘和我们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但情绪活跃，虽然语言不通，但从表情手势看，和我们打招呼，相处不错，看不出有敌意。我当时

看，这些战俘不是才被俘的，可能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后，再送到军部来进一步“深造”的。我曾听我们的文化教员王枫荣同志说：这个训练班中有三个人是在皖南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的，后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他们冒着风险辗转到了上海，再由上海找到淮南来的。这是多么感人的事例！我猜想这三人可能就是训练班的骨干，李亚农部长的得力助手。只有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能把自己的敌人改造过来，“化敌为友”，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其中有的人竟成为我们的同志，我记得我们驻在葛家巷时，敌工科有个科长就是日本人，络腮胡子，沈映虹同志说他名叫龙泽。他每天晚上都在写传单，我有时趴在桌旁看，他也不回避，他知道我看不懂日文，日文是边旁和汉字相间，我连看带猜内容是向日本士兵作宣传的传单。这些日本士兵经过我们的教育以后，提高了觉悟，和正常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正如日本战俘自己所说：是日本法西斯使他们失去理智，变成了兽性，现在通过学习，在真理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恢复了人性。这是多么深刻的概括！后来听说他们经过训练以后都参加了“反战同盟”。

以礼相待 营救盟兵

1944年夏天，有五名美国飞行员，降落在苏北某县的滩涂上，新四军三师派人把他们营救出来，送到黄花塘，由政治部接待。在接到通知后，政治部领导组织人员做接待准备工作，把邓逸凡秘书长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干净，刷上石灰水。做被子枕头，做内衣用的都是白布。这些事是几位女同志做的，其中有一位是于毅夫副社长的爱人。他们到达大王

庄的那天，我们站在村口欢迎他们，于毅夫副社长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表示欢迎，他们也招招手，表示谢意。这五名飞行员中有一个是黑人，身体高大，我听一位女同志说给他们做的衬衣，其他四个人都能穿，就是他左试右试都穿不上，只得临时再给重做。除安排生活外，还要组织懂英语的同志当翻译，有的写英语欢迎词，有的写英语欢迎歌找一批同志练唱。第二天开欢迎会，用英语致词，唱了欢迎歌。这些同志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我印象里好像有饶漱石的爱人陆瑾和范长江的爱人沈普也参加翻译方面的工作，有些女同志是从卫生部临时集中的，唱英语欢迎歌的是干部和女同志。欢迎仪式结束后，接下来由淮南大众剧团玩旱船，唱词是汉语他们当然听不懂，可能由翻译把内容讲给他们听，听歌词大意是欢迎他们，称赞盟国飞机炸日本。旱船结束，由演员给每人献上一束花。从表情看他们是满意的。这五个人还受到了饶漱石的接见并一起拍了照片，就在邓逸凡住房的门口拍的。这五个人对中国的农村很有兴趣，什么都感到新鲜，每个人都骑在水牛背上拍照。这五个飞行员在大王庄住了一些日子后，我们把他们送到了国统区，交给了国民党军队。

精神生活 丰富多彩

在大王庄时，机关内部工作、学习、文娱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在这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工作时严肃认真职责分明休息时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看不出上下级之间的界限，有时做做游戏，讲讲笑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范长

江同志，一个是钱俊瑞部长。范钱两位首长，风格各异。范显得才华横溢，非常健谈。一口四川官话，说笑起来绘声绘色，内容广泛，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蒋管区”的新闻。夏天一到晚上乘凉时，大家都到军直政治部、新华分社驻地来和范长江同志聊天，范自然而然成了聊天的中心人物。钱俊瑞部长常常在晚上来军直政治部和大家一起做智力游戏，钱总是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和蔼可亲，一点没有部长的架子。他知识面很广，本来就是经济学家和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好的教益。

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有时还组织演出。有一次在一个开会用的大房子里演出了好几个节目，速记班学员自编自演的歌剧，因人手不够，有的演员男扮女妆，女扮男妆，非常新鲜，别有一番趣味。压台戏是扭秧歌，由军直政治部表演，因为人多热闹，可以使演出达到高潮，让大家乘兴而归。但这场秧歌扭的“乱七八糟”，扭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会扭的扭得认真的，也有不会扭的但很认真的。张望扭的最认真，身段也自然。胡福瑶扭得最不好，他身体肥胖，腰弯不下来，他根本不是在扭秧歌，而是晃膀子，甩大步，但是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一看他这副样子，大家捧腹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他很认真的扭着，以为大家觉得他扭得好呢，这就更加逗得大家发笑。

我们军直政治部的张凯主任，他虽不像钱部长、范长江同志那样活跃，但他平易近人，对同志很和蔼，对文化工作很重视，很支持。我记得在葛家巷演出《雷雨》时，他亲自介绍了曹禺的生平及《雷雨》的主题，以及我们观众在看演

出时应该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来分析《雷雨》。这话至今在我脑海里印象都很深。

回想当年大王庄这段时间的生活很有意义，叫人留恋，我未去过延安，但从一些报道和到过延安的同志交谈中得知延安的情况，比比大王庄好像也像个小“延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受到了教育，增长了知识，每一位干部、首长我对他们都感到亲切，工作、学习、生活朝气蓬勃，上上下下团结一致，对抗日战争都充满胜利的信心，军队、地方非常协调，军民亲如一家，整个环境呈现出一派革命的喜悦气氛。我们党正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才和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在内部，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团结战斗、同心同德。这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沐浴在爱的海洋中

——记乔信明在黄花塘养病的日子

于 玲

提起乔信明在黄花塘养病的日子，就不得不先回顾他的光荣的战斗历史。乔信明 1934 年 10 月曾任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二十师参谋长，1935 年 1 月因北上抗日行动失败，寡不敌众，被捕坐牢三年。直到 1938 年 1 月被徐特立同志营救出狱。出狱后，由于皖南军部所处的艰难环境。他没有时间和条件享受延安的规定（即休养半年、享受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来恢复狱中被摧残的身体，就立即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去工作了。1938 年 11 月调到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任参谋长，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部参谋长。不停地参加和指挥战斗，和江抗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敌伪心脏里战斗，打日伪，抗顽敌，令敌人闻风丧胆。同时把原来只有 1000 多人的部队发展到四五千人，缴获的武器装备之多，使陈毅同志惊讶，数次调拨给兄弟部队。1939 年 11 月乔信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团长。到苏北后，接连参与指挥了车桥、驰援半塔集、保卫郭村、黄桥决战等重要战斗，为这些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他从出狱后，就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中，没有得到休息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了。到曹甸战役时，他累得话都讲不出话来了。陈毅同志立即命令用他自己乘坐的小火轮把乔信明送到后方去休养。1941 年 4 月乔信明参加苏中军区成立大会时，粟裕、

刘炎、钟期光等苏中军区领导决定让乔信明到华中党校学习兼休养。在党校，乔信明的身体逐渐恢复，1941年底1942年初被分配到苏中军区二分区任副司令。但二分区一面对海，三面是敌伪，环境异常严峻，战斗频繁。乔信明刚恢复的身体又垮了下来，连马都不能骑了，常常是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1942年6月的一天，他在听完侦察员的汇报后突然倒下，站不起来了。于是只得紧急送往盐城军部治疗。到军部后，陈老总立即来看乔信明，安慰他，并对我说，乔信明看病用钱不受限制。但是当时军部卫生部的医疗手段有限，没法治好乔信明瘫痪的双腿。他只能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只有打了止痛针后，才能缓解一下疼痛。1942年10月陈毅军长找了一个大商人帮忙，派我一人陪同乔信明到上海去治疗。临行前，陈毅同志细心地为我们的女儿做了安排，他说：“孩子交给崔部长，你放心，有我的就有你的。”这样，女儿就由保姆带着留在了军部卫生部，和陈老总的儿子昊苏一起吃军部卫生部为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养的羊的奶。

不久，敌伪顽又发动了对阜宁军部的大“扫荡”，军部只得转移到淮南盱眙县的黄花塘去，不便带着孩子行军。组织上就把女儿一年的保育费和保姆一年的津贴发给了那个保姆，让女儿暂时寄养在她家。陈军长自己的儿子也留在了老乡家“打埋伏”。

由于经费紧张，在上海也没有治好乔信明的腿。1943年7月由于上海形势紧张，刘少奇同志命令所有在上海治病的同志都回根据地来。1943年7月7日，乔信明和我就回来了。

虽然这时乔信明还不能走路，行军就要坐担架。陈毅军长却从未想过卸掉乔信明这个包袱，仍然把乔信明安排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休养。这样，乔信明直到1945年初离开黄花塘到苏中军区，在黄花塘休养达一年半多。

我们到黄花塘军部的那天上午。刚巧陈毅军长做形势报告，我就去听了。休息十分钟时，陈毅军长就过来和我握手，并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在上海吃霉米煮稀饭，穿夹旗袍过冬，你们是去上海治病的人里用钱最少的。”

我们刚到黄花塘时住在军部招待所，离军部不远。一天中午，乔信明正在睡午觉，忽听门外有人问：“乔信明同志住在这里吗？”我连忙出去一看：“啊，是粟司令来了！”只见汗水把他的衣服都湿透了。乔信明急忙用手撑着身体坐起来，喊了一声“粟司令”喉头就像被棉花塞住似的说不出话来了。他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远在苏中的粟裕同志会来淮南军部看望自己。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都午歇了，粟司令怕影响随行人员的休息，竟然冒着酷暑一个人跑来看望乔信明，多么诚挚的心意啊！我从水缸里舀了盆凉水给粟司令擦脸，可是汗还是不断地冒出来，天实在太热了。粟裕同志边擦汗边对乔信明说：“我这次是到军部开会的，因情况变动，今天下午就要走，所以只能抽中午时间来看看你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乔信明说：“这是带给你的休养费，军部困难较多，所以给你带一点钱，自己买些东西，补充营养，让身体快点好起来！”

乔信明握着信封，面对粟裕同志竟讲不出一句话来。粟

裕同志抚摸着乔信明的病腿，不断地安慰他。乔信明见到老首长，不由想起了过去在他领导下杀敌斗顽、驰骋疆场的时候，是多么的神气啊！现在却被病魔捆住了手脚，成了一个上不了前线，干不了后方，行动还要坐担架的部队的累赘。想到这里，他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竟痛哭起来。粟裕同志体会他的心情，再次安慰他说：“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与牺牲的同志相比，你还有座青山，休养一段时间，即使不能走路，革命工作还是有你做的。何况社会在进步，医学在发展，只要我们胜利了，完全治好你的病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现在你的任务是安心养病，可能的话，搞好学习。这方面失掉了，那方面又获得了。你文化不高，正需要学习啊！”

乔信明边听边点头，一席话使他豁然开朗，不觉脸上绽开了笑容。粟裕同志看他高兴起来，又亲切地问：“你还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以后有什么问题可托人带信来，苏中还是能解决的。”“我还有什么困难呀！即使有，我也会努力克服的。”粟裕同志听了很高兴，他看了看表说：“时间到了。”就迎着那如火的烈日匆匆地走了。

从此，乔信明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请供给部长宋裕和同志找木工帮他制作了一张可放在床上的矮脚小桌子。每天伏在上面，读书写字。这样边养病边提高文化，生活有了明确的方向，心情舒畅起来，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不久，乔信明住到了张庄。因没有房子，临时用原来的养马的房子改造了一下暂住。由于乔信明生病，我已一年多

没有工作了，十分渴望早日重新开始工作。乔信明建议把寄养在保姆家的女儿接回来再去工作。

我从曾山部长那里知道了保姆家在阜宁县杨集，那儿是三师的驻地，与黄花塘相距二三百里。从军部所在地二师出发，要经过四师、一师，才能到达三师。而且一路上尽是日本鬼子、和平军、国民党顽军、流氓土匪等，异常危险。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险情，在当地交通站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女儿。我带着女儿和保姆一起安全地回到了黄花塘军部。

1943年11月陈毅军长要离开军部去延安开会了。他一个人徒步走了三里路，来和乔信明告别。在打谷场，他碰到抱着我们的孩子的阿姨，就把孩子抱了过来。一进门他就对我说：“这孩子的肚子这么大，是不是有病？”我说：“不是。是在乡下吃大麦糝子稀饭吃的。”他说：“这么漂亮的姑娘肚子大不好看。以后每天少吃多餐，慢慢就会小下来的。”他抬眼一看，看见桌子上摊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我正在收拾准备带到离军部十五里的泥沛区去工作的东西。他从衣服堆里拿起一件旗袍，问道：“这就是你在上海穿的夹旗袍？”我答道：“是的，那时还用它装扮成地主太太呢。”

寒暄完毕，他才把这个令乔信明震惊的消息讲出来。他说：“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乔信明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他立刻安慰乔信明说：“不要难过，我和张云逸副军长谈好了，以后由他负责，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后来乔信明才知道，军长当时受饶漱

石的诬告，压力非常大，心情非常沉重。正如他在《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一诗中所述，是“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但他没有忘记为乔信明拜托可靠的人，安排好乔信明的生活。

张茜同志在陈毅军长走后，就在卫生部住，由卫生部长崔义田负责她的生活。她和乔信明在皖南军部时就认识，在华中党校时还送给过乔信明一张她和另外两位女同志的合影。那时她一面喂奶带孩子，一面每天学习英语到晚上12点，还经常抽空来看乔信明，关心和帮助乔信明。她曾在卫生部演过一个话剧，内容是讲一个日本慰安妇在慰安所遇到了自己的哥哥的悲惨故事，我们都去看过这个话剧。

张云逸副军长在陈毅军长走后，挑起了照顾乔信明的休养生息的担子。1944年过年时，张云逸副军长请张茜、乔信明和罗炳辉夫妇一起过年吃饭，我因在泥沛区工作没能参加。

不久后，我们搬到罗炳辉同志住过的房子住。由于罗炳辉同志住过的房子位于军部和卫生部之间，供给部长宋裕和和卫生部长崔义田每次到军部开会，路过我们的住处，都要打个招呼，喊一声：“老乔！”

1944年7月我在常庄军部卫生部生下了二女儿，是宫乃泉副部长的夫人刘球接生的。生完孩子不久，刘炎同志来看乔信明。他看到我正在扇扇子，就说，刚生完孩子不能扇扇子，会得病的。当时刘炎同志也正因病休养，两家相隔不到一里路，他就经常来看乔信明，两人成了好朋友。1946年他

病危时还喊着乔信明的名字，渴望见他一面。但是乔信明远在数百里之外，且不能走路，无法去看望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刘炎同志去世后，我们一直关心着他的遗孤，或去看望他的女儿们和照看她们的婆婆，或把她们接来相聚。刘炎同志的夫人陈模同志 1959 年 10 月赠送给我们一张刘炎同志 1939 年时的照片，使我们更加怀念和刘炎同志相处的日子了。为了永远记住他对信明的关爱，我们把这张照片连同陈模同志在照片背面的题字一同放进了纪念信明的纪念文集里。

在此期间，军部的领导同志饶漱石也来看望过乔信明。还有许多同志都借来军部开会或到新铺党校学习的机会来看乔信明。谭震林、叶飞、陈同生等同志都来看望过乔信明。陈丕显同志和储江同志来看他时还送来了营养费。

一天乔信明正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坐着。看院子里种的八棵番茄。突然钟期光进来了，乔信明真是喜出望外。原来钟期光同志是到龙岗抗大八分校去检查工作，特意绕道几十里到黄花塘来看望乔信明，并给他送营养费，。

乔信明的亲密难友曾如清同志自己就是个的老病号，却把自己仅有的一个月买几斤鸡蛋的营养费节省下来，按月寄给在黄花塘军部休养的乔信明。

特别党员季恺同志趁来党校学习的机会来看望乔信明，并送给他钱作营养费，他还说：“需要用钱，尽管对我说，保证帮你解决。”

我在泥沛区工作时，曾搞过互助合作的工作，组织起了

一个互助组，并在1944年秋写了一篇关于办互助组的文章，发表在了《淮南日报》上。张茜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夸我写得好。我还参加过动员群众参加常备队的工作，遇到过一些困难，但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们那时生活很艰苦，没有油盐吃，只好把猪大肠里的油刮下来炒菜。但是老百姓对新四军非常好，当地老百姓曾杀了一头猪，跳着秧歌，划着旱船去慰问军部。

当时虽然战斗紧张，但文化宣传工作也没有放松。范长江和刘晓两位同志还到泥沛区采集过民风民俗。在新铺党校还上演过一部苏联话剧《蜕变》，主角叫戈尔巴洛夫，可能是刘季平弟弟演的。

1944年秋，美国飞机失事，5个飞行员降落苏北，被我军护送到黄花塘军部。但为了保密，他们的住地被围上了大白布，我们都想去看美国飞行员，但只看到了白布。

1944年底日寇对黄花塘军部“扫荡”，乔信明被转移到老乡家“打埋伏”。局势缓和后，乔信明回来没有地方住，张云逸副军长就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我们的二女儿在奶妈家不幸夭折，也埋在了张副军长的房子附近。后来乔信明又搬到了罗炳辉的房子里住。不久，日寇又要来“扫荡”。形势又紧张了，曾山同志建议我带乔信明再去上海，我担心安全，觉得不能再去上海，就安排乔信明到老乡家“打埋伏”。后来组织上和苏中军区联系上，就把乔信明转移到苏中去了。临行前，曾山同志亲自检查行李是否捆紧，绳子是否结实，还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1945年2月，我们就到了苏

中军区招待所，受到了苏中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照顾。

乔信明在黄花塘一年多的时间里，时时享受着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始终沐浴在爱的海洋里，心情愉快，身体也逐渐好转了。这为他后来带着瘫痪的身体走上苏中军区后勤部长的岗位和后来在华东军区总留守处带领数万老弱病残完成粟裕同志布置的三大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坚持敌后医疗工作

笪根庭

1942年11月，我被调到新四军二师所属的第一卫生所任医务员。当时，所址在盱眙县蔡家港。这里众山环抱，四周树木参天，房屋在大山洼的绿树丛中，敌人飞机从天空是难发现目标的。

所长时常更换，我记得在蔡家港时的第一任是李德，第二任董学余(我的同学)，第三任孙森，第四任是殷星。当时敌后环境紧张，日伪经常下乡“扫荡”。卫生所分若干小组，情况紧张时，伤病员分组疏散到更偏僻的地方，住到老百姓家里。每组有三十人到五十人不等。工作人员、伤病员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姓(即跟房东姓)，以防敌人“扫荡”时盘问，我们每月付给老百姓所必需的津贴和粮票(根据地粮食凭证，以后群众和乡政府结算)。

在分散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伤病员分散在各庄上，医护人员穿便衣，手提篮子，内装药品和敷料，到各庄上换药、打针、服药。遇到群众家里有人患病，我们也免费治疗。西高庙有一个群众家的小孩，患流行性脑脊椎膜炎，我给他服了几片“消发密定”，病好以后，那家送了一百多斤鱼给我们改善伙食，我们再三谢绝也不行，只好收下来，分给伤病员吃。

1943年初，卫生所将原来的若干小组，集中分为三个大组，我负责一个医疗组，另一个组的负责人是张云武，还有一个组的负责同志的名字记不清了。我带的一个组住在水冲港西边约四、五里远的一个庄上，当时这个组有医务人员七、

八名，事务长一人，炊事员六、七人，伤病员最多的一组达到七、八十名，最少的时候也有三十名左右。

我们以组为一个伙食单位，自己做菜做饭。伤病员的住地也相对的集中，群众住宅宽敞的，每户住四、五人，房屋少的，就住一、两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组的人尽可能住在一个村上，有时至多住两个村庄。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还养猪、种菜。群众也主动让出一些宅边地给我们种菜。

当时，我住在水冲港右边山巍港里面一个庄上，房东姓苏，贫农，有一个儿子年约十八、九岁。我发展他参加了共产党。那时，我跟房东姓苏，改名叫苏书文。

这年秋天，情况好转，三个大组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全部集中到卫生所所部蔡家港。集中后，组的建制撤销。我被调到盱嘉支队司令部门诊所工作。同组的韩光成、冯文斌、刘永清、汪波、夏静波、裴长德等同志也分别调动了工作。其余仍留在所里。

次年春夏之交，我们一分所办了两期卫训班。我担任了第一期的教员，主讲内科部分，韩光成讲的药理学。

卫校学生，结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连队当医务员、护理员，少数留在卫生所当见习医生，后来有不少同志担任了医务界的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飞行员在黄花塘

刘志诚

1944年8月20日，美国一架B29巨型轰炸机，完成轰炸日本军火工业基地——九州八幡钢铁基地，返航途中引擎突然发生故障，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在苏北建湖县地区属于新四军三师部队驻地附近。萨沃依中校等五名飞行员得到当地军民的营救。为使他们尽快返回成都空军基地，新四军三师首长指派政治部保卫科长周斌率领几十名战士，经过长途护送，于1944年9月6日，到达安徽淮南路东盱眙县（今属江苏省）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在这里，美国飞行员受到了军部热情的接待，度过了29天愉快而难忘的日子。

黄花塘，是个只有几十户农家的村子，当美国飞行员一行人来到黄花塘村口，前来欢迎的新华社华中分社副社长于毅夫用英语向他们问候，萨沃依听到熟悉的英语，激动地和于毅夫久久握手，表示感谢。在军部，赖传珠参谋长亲自接待，代号为“707”的副军长张云逸接见了美国友人，并请他们吃了午饭。接待工作由军部参谋处长陈锐霆负责，又从军部特务团抽调文化干事柳央（曹毅风）充当翻译，并一直陪送美国友人到最后移交分手。

第二天，军部为美国友人召开了热烈的欢迎会。会前，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赶来大王庄接见美国友人，并在他们的住房前一起照了相。在欢迎会上，于毅夫用英语致欢迎词，陆瑾、沈谱等女同志和其他一些干部唱了英语欢迎歌，萨沃依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下来由淮南大众剧团表演跑旱船，柳央把歌词大意翻译给美国友人：欢迎你们，称赞盟国飞机轰炸日本。表演结束，演员们热情地给每个美国友人献了一束用纸扎的红花。

美国友人住的房子，是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和宣传部长钱俊瑞腾出来的，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刷上石灰水。被子、枕头、内衣都是买的布新做的，又派人到较远的大镇上购买好烟招待美国友人。

几天住下来，住地环境慢慢熟悉起来，五个美国友人对中国的农村很有兴趣，经常到村里各处走动，什么都感到新鲜，每个人都骑在水牛背上拍照。

有一天晚饭后，由柳央陪同他们到住房后的一大片菜地边沿小路上散步，望见绿油油的一畦畦菜地里，有许多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在锄草、浇水、除虫，一位美国友人在劳动的人群中认出了军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不禁大为惊奇：“你们的高级军官也种菜？”柳央笑着告诉他们：这些干活的人里有好多是军政治部的部长，他们都是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的老红军，有的负过伤，现在身上还存有弹片。干活的人里还有许多科长、股长及其他干部和战士。我们为了克服抗日根据地物质上的困难，减轻群众负担，从上到下官兵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官兵之间亲如兄弟。

当时我在一旁锄草，就接着话茬说：“我们军政治部官兵一年中八个月的粮、油、肉、菜都是自己动手种养出来的，保证了自给。你们吃的蕃茄、白菜、萝卜等就是这片地上种

的，猪是自己养的。”美国友人点头称赞：“原来，让我们吃得那么好，肉、菜还是你们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太感谢你们了！”

9月27日下午，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向美国友人谈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对日军作战的情况，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除了军首长亲自谈话外，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原江淮大学校长、著名学者韦悫同美国友人交谈次数最多，向他们详细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一次交谈中，萨沃依中校说：原来我们不知道在华北、华东一带还有抗日根据地，否则，会有更多被迫弃机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在这些根据地降落而得到营救。他表示，回到空军基地后向上级报告，要求与新四军建立联系。

知道美国友人想实地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后，军政治部就安排他们去参观新四军第二师的兵工厂和部队。在兵工厂，美国友人看到简陋的草棚、瓦屋和陈旧的机械设备，可是战士们个个汗流浹背地干得十分起劲。他们自豪地把自制的刺刀、手榴弹、地雷和枪榴弹展示给美国友人看，地上还堆着许多待修理的三八式等步枪，通过介绍他们知道了，这些都是从日伪军手里缴获的。萨沃依很感兴趣地拿起一把刺刀说：“用你们自己做的刺刀，去缴日本兵的枪，我回国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的朋友们！”萨沃依说他们跳伞前，为减轻

飞机重量，曾把三颗带保险的炸弹投下，兵工厂负责人立刻兴奋地告诉：我们当地的三师部队已经找到了这三颗炸弹，准备用其中的黄色炸药来制造迫击炮弹哩！萨沃依非常高兴，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还是用它们来打日军了！”在参观部队时，美国友人来到某营驻地，正好看到战士们练刺杀，只见刺刀闪闪发亮，吼声震天，气势威武雄壮。该营干部介绍说：我们经常跟日伪军打近战、夜战，因此要求战士们拼刺刀如猛虎，扔手榴弹是神投手。几位美国友人笑着称赞：“敢打近战、夜战的士兵当然是最勇敢的人！”

美国友人在军政治部休息期间，为早日把他们平安送回成都基地，新四军军部通过延安总部与美军联络组、国民党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交涉，曾考虑安排飞机来接他们回大后方，都因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不和新四军打交道，更不许美国人直接和新四军打交道而作罢。经反复努力进行交涉后，国民党政府才被迫同意由驻安徽的五战区广西部队接收，再转送回成都空军基地。为护送美国友人去安徽淮南路西，军部派了一个排的战士全程护送，由参谋杨易风带队，翻译柳央陪同。

10月4日上午，美国飞行员离开了新四军军部。美国友人骑马，战士们步行，根据情况或白昼或夜间连续艰苦行军，经过沿途许多军民一站一站地配合接送，在一个黑夜，靠近了明光(今嘉山)和滁州之间津浦铁路日伪军的封锁线，我新四军二师五旅已派部队在此接应。津浦铁路的封锁线外设铁丝网，内挖深沟。沿线日伪军的碉堡彼此呼应，把守森严，

还不时有满载日本兵的铁甲车隆隆地来回巡逻。但是，我新四军凭着勇敢机智和对地形、敌情的熟悉，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选定了一个比较容易通过的线路，趁着浓黑的夜幕，在护送部队的掩护下，美国友人顺利越过了封锁线，后由新四军二师五旅参谋长张元寿带领，到达安徽省淮南路西，二师五旅驻地。美国友人在这里得以作短暂休息，并稍加休整后继续行军，来到安徽省淮南路西叫界牌集的地方，这里已是五战区国民党广西部队的驻地了。

10月14日，在距界牌集不远的瓦屋刘，新四军二师五旅参谋长张元寿，负责把五名美国飞行员移交给接收者，即国民党五路军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二团第三营机枪连指导员张国弼。为表示郑重负责地交接，也为与美国友人留下临别纪念，五旅参谋长张元寿、翻译柳央，国民党五路军下属机枪连指导员张国弼，与美国飞行员萨沃依中校、奥勃朗上尉、鲁茨中尉、斯太尔美克中尉在此合影（布伦戴奇军士因留在界牌集未参加合影），照片上写明以上各人所属部队的番号、姓名、交送时间、地点，以及五名美国飞行员的姓名和军衔。这张照片柳央至今仍然珍藏着，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患难与共、结下深情厚谊的生动的历史见证。

合影之后，柳央和护送的干部战士们同美国友人依依不舍地握手、拥抱，美国友人激动地喊：“再见吧，亲爱的中国朋友！”柳央和干部战士们也深情地问答：“再见了，美国朋友们！”萨沃依中校回国后，把被抗日军民营救后两个来月的切身感受总结了一段话：“如果没有新四军不知疲倦的

努力和杰出的援助，我们是不可能返回一千多英里外的基地的……我们受到了极其友好的热情的接待。共产党的部队和官兵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这以后，中美两国军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了长久的友谊。

我的日记

贾顺

按：这是在我背包中珍藏了将近70年的日记，记载了从1943年9月至12月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进入华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淮河之滨的江淮大学艰苦历程，这是一份历史的见证。由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有限，记得比较简单，很不完整，十分遗憾。承张立同志如实整理出来，作为即将到来的江淮大学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礼物。

1943年9月8日 星期三 阴雨

踏进了根据地十多天了，因为总在行进中，许多事情都做不了，也无法写日记，今天总算安定下来了。

自7月25日起，听到“能跑”的话后，内心整天纷乱没有安定过，思想成了交响曲，脑子里每个细胞起了作用。家庭问题、私人问题以及种种其他问题，全都缠绕在一起，使我痛苦地不能自拔，甚至我想忘去一切，宇宙中的一切，但不可能的事啊。一直到8月23日那天，汪祁兴冲冲的赶到我家，说一定“能跑”了，问我究竟作何打算。在这紧要关头，终于“理智克服了情感”下了最后的决心，立刻准备走了。不惜一切，抛弃了家庭中所有可恋的人们，放弃了五百元一月薪水的写字间生活，先往上海走，和同路的朋友汇合。在8月25日那晚，来到北火车站，怀着一颗急急想乘车飞跃的心情。深夜两点钟火车停在苏州站上，我们已离开上海有两小时多了，在车中买汽水、面包，似向苏州作最后

的一次买卖交易一样，我的心很不好过。十数年来的故乡啊！跟您作长期的分离了，我亲爱的妈妈、妹妹、弟弟嫂子、侄儿们，您们都在深深的酣睡中，做梦也想不到您们的反叛女儿，在拥挤不堪的车中遥遥地向您们作别！

足实的九天在路上奔走，“晓行夜宿”真是名副其实，“日晒夜露”也受之无愧，路上情形这八个字也形容得够了，脚底心隐隐作痛，开始起泡，全身肮脏不堪，总算吃尽了苦头，踏进了我们的理想中的“乐园”。

到了河头，见到了敬爱的老师和同学们，那位盘绕在我脑海中的可敬可爱的伟大人物韦校长笑容满脸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多么开心，多么叫人兴奋。可又听说明天还需跑三天路，赶到淮北校舍去。啊！未能在河头多玩几天，来的太迟了！抓紧时间跑到河边，那里的溪水竟是最可爱的溪水，我惬意地洗了一次河浴。这是我永不能忘记的，出世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从未在河中玩上一次，要玩也只是梦中想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终成事实了，站在清凉透彻的溪水中，湿润的长发随山风飘拂，我好像做梦似的迷茫。

这次先记上一些同路来的同学们，跟我一组上火车的是颜英浩、徐欢、王嘉华四个人。到镇江后碰见的人便多了，汪祁、老宪洪、邢浩林、红雪璧、顾欣等等。在东王庙又碰到更多的，如赵开祺、汪丰业、王成、王慎行、顾芸仙、张敬岳等六人，一路上浩浩荡荡。到河头的翌日便动身向淮北行进，第一天跑了四十多里路，到大王庙军部住宿。却不料天下雨了，路上泥多，不能走，我们这些疲倦的人有了一天休息的机会。悉悉沥沥的雨下了一天，没有停过，男同学们

睡了一天，女同学们大家做了一天针线活，我和徐欢各人做好一只饭包，其他有的做好一件短衫、裤子等等。到晚上军长请我们吃饭，这是一顿丰盛的夜餐，大块肉、大碗肝肺汤，从踏进根据地后，第一天尝到肉味，大家非常开心，吃得津津有味。这样一天算平平地过去了。哦！晚上听到了钱部长的演讲，可惜天黑的关系未能记录下来。

4日，天气变晴了，大家都想早一日走，能早一天到学校。但人家说，天才晴，田岸上的泥路很烂、很滑，不容易走，改为明天走。这一天预备听演讲，陈军长和许多部长等要人，均不易听得到的演讲。本拟上午开始的，后又定于下午。遂和方方等要到卫生部去瞧一位同志，我就跟了去，邢因为咳嗽很厉害也想去，顺便配些药水，同去六个人。遂的那位好朋友叫小宋，名字我忘记了，是个极有趣的人物，她做医院中的卫生部处长或主任，担任很忙的工作，我们许多人去了，她很客气的和我们谈天说地，一点也没有架子和虚伪，这是在一般地方难得见到的人物。她是个北方人，长方脸，两颗明亮的大眼睛，不十分高大的个子，说一口极清脆流利的土话，无拘无束，很勤俭的样子，穿着一身七分旧的军服，皱皱巴巴的像个巾帼英雄。玩了一会，经不住她殷勤的招待，叫我们吃午饭，就老着脸皮留下了。累她忙了几小时，做了一顿特别饭菜给我们吃，一大碗炒蛋，一大碗鱼烧豆腐，一大盆炒豇豆，一锅甜南瓜，烘麻、煮麻等，一桌九个人，吃得很痛快，吃了个精光，每个人的肚子填得满满的。可以说这一次的盛餐，是我出生以来第一顿美味佳品，吃得舒服畅心，饱到不能再饱了，吃好近二点了才走。急匆

匆赶到大王庙，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韦先生打电话到卫生部去催我们，陈军长已等了多时。咱们六人纷纷扮鬼脸，自觉好笑，都是贪了口腹之命，弄得如此结果，大家都是面有愧色，想必定有一顿“大菜”吃。不料韦先生太好了，并没有说我们。整个下午听了很多要人的演说，有陈军长、刘部长、李部长、吕部长、范长江等等许多人。

在9月5日的清晨，匆匆吃过早饭，赶到淮河边渡河，守候了二小时才全部渡过。有一段是浅河，摇船，大家靠着互相扶着才过了河，真有趣极了，又怕又觉得好玩。我抓着张敬岳渡河，手不敢放，直到上了岸，心才感到安定，顾芸仙在水中跌了一跤，全身都快湿了，气喘吁吁地真危险。嘉华最开心了，她差不多一路上都骑着马，并且还骑马渡河。顶弱的要算红雪璧这个小妹妹了，她人又矮小，又加上吃饭过饱后胃痛，然而她很自强，一切她总是自己忍受着，真是佩服。在河润的时候，因为顾欣、小王、小汪都有病在身，故暂留一天，我们先走，却不料从分手到今天还赶不上来，一定很糟糕，没有人去照顾他们。

走了十几天的我们，身体真吃不消，黑得像泥鳅似的，疲倦得老是想睡，睡眠总是不够，现在虽然是最后一天赶路了，但已筋疲力尽，步履蹒跚，原计划在午饭时能到仁和校址，却不能如愿，直至下午四时三刻才到达。老远就能听到同学们高声呼唤，唱着欢迎歌，直到看见桥上一行长长的人影，脚下才像加上了油，三步并做两步的赶到前面，韦校长兴奋得说不出话来，老是笑着。各人阔别了半年后相聚，见了面反而无话可说了。

6日，许多同学在计划着开欢迎会。我们洗了一上午衣裳，饭后午睡一刻，便开始开会了。全体同学、韦校长、李先生、王先生，另外有二位贵宾，一位是抗大的付校长，一位是陈政委，直到五时许才告结束，相当热闹。还闹个笑话，大家放空话说有一顿点心吃，于是许多同学信以为真，想着分吃点心的态度，足以笑痛肚子。

这里的生活很有秩序，很有规律，阅读、活动、劳作、唱歌、漫谈，还要加上自己的私事，洗衣服、理东西、午睡，一天很充实。但是，因为长途奔波，加上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很多人都病倒了。疟疾占多数，其次是痢疾。今天探望了颜英浩、小胖子、蒋文华、竹宜德、徐欢等人。我真发愁，没有被单、没有枕头，晚上冷得要命，肚子叽叽咕咕的叫，还有点痛，怕也快生病了。还有钱的问题，买纸的钱也没有，别说买东西吃了。唉，奈何呢？

1943年9月12日 星期日 晴

三天来的劳动，兴趣相当浓，精神上十分愉快，可惜身体体质不够，晚上睡觉时，满身全是痛，疲乏极了。昨晚踏着自己用汗水铺砌的道路，小心翼翼，生怕踩坏了。费去了二天工作时间砌成了一条很整齐的石子路，现在走路时，真让人开心舒服极了。想到砌路时的困难，我觉得它宝贵，咱们是铺的最前面一段，这组共有八人，遂和我，小胖、姚守懿、汪祁、陆熙耀、老宪洪、王成，大家都很努力，陆最卖力了。

徐欢身体好得多了，这几天生病的人慢慢减少了，却也

像新陈代谢似的，沈曾华今天也发烧了，大概是太疲劳了吧！

终于搬到新屋子中去住了，陆君是位很可爱的人，她和我们同住一个大房间，计有遂、华、徐、顾、顾欣、我们七个人，分派得很乐意，很快活，高呼：“咱们住新房，过新生活了。”

中秋节快到了，大家都在想，那天痛快的玩一天，计划那晚去划船，有钱的痛快吃一下，但思乡的心同时出现了，在家的時候，我年年想到遥远的他乡去过节，现今我是如愿了，虽然离家只有六、七百里路，却是他乡了，但兴奋的心情呢？这里的学校是培植青年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才，跟别的学校意义有天差地别，同学们思想和行为应该跟普通学生不同。但同学们之间闹恋爱，耍点小脾气，喜欢吃玩还是改不了的。

明天是中秋节，各机关都送东西给我们，有大月饼、石榴、藕、鸡蛋、鱼，大家都喜欢得跳了起来，急盼明天快快到来，好大吃一顿，徐欢快活得连病也忘了，明天一定要起来，过个开心的节日。晚饭后我们第五组开筑路检讨会，在男生宿舍里开，谈得很有意义，约一小时。筑路时大家情绪很高，活不管怎样累和重，都努力去完成任务，特别是咱们组劳动时轻松活泼，长脚陆熙跃是个极有趣的人物，我每隔些时候，总给他的怪模样逗得哈哈大笑，做工作不感到累了。总的看，第一、二组筑的路是最平坦而坚固，然而我们也相当不错，许多从没有动过手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人们，竟有这样的成绩，值得一记。散会后，跟嘉华、汪祁、陆熙跃去摇船玩，月色真美，明朗的月光下，杨柳垂下在堤边，一叶扁舟，浮在平静的水面，幽静、舒服，难得的自然美景！

中秋节翌日，是韦校长的寿诞，在这里没有可送的礼品，只凭年轻同学的热情为他庆贺，全体合送了一只大蛋糕，唱着祝寿歌，晚上许多人乘着四只大船，韦校长和我们同去赏月，他还送馒头给我们吃，每人得到最多有十只左右，边赏月边大吃馒头，月光下陆熙跃、老宪洪俩人在桥上表演跳舞，有趣极了，这晚又玩得非常开心。加上这三天中，编竹排铺石子路都是难得而又愉快的劳动，身心极为舒畅！

昨天尹绮华、王友华来了，路上只有一星期，今天吴天闲也来了，三天中陆续来了新旧同学有十多个，同时来了二位先生，一位宁波人姓葛，教土木的，一位史先生大约是教经济学的，现在同学有五十多个了，离开学也不远了，生活渐趋规律化了。

这天男生宿舍也在搬，我们总算是安定下来了，侯子说可以写信回去，在阅读课时每人埋头在写信，谁都希望家中能寄点钱，我怕难有希望，像我这样没有接济，没有后路的同学也很多，将来经济问题可真难了，肥皂、草纸不能不用，来源缺乏，奈何！

1943年9月18日 星期六 晴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稍开始懂得了战争的可怕，残暴，那时除了愤怒，知道日本人欺侮我们，但还没有更多的深刻理解，而从“八·一三”起的战争，随着年龄增长，懂得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激发了民族仇恨。今天在九点十八分钟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纪念仪式，晚上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九·一八”的事。

本校正式开学是9月23日，24日注册，25日开始上课，26日大家在房间做戏，演话剧、滑稽戏等。昨天一整下午，做得相当有趣味，每组人马都很出力，这次游艺的目的是庆贺开学典礼。预定在10月5日要举行正式开学典礼，补行仪式，那天大会非常隆重，有很多首长来参加，肯定热闹非凡，大约要二、三天，据说还有一个全体人员的化装表演等等。

1943年10月5日 星期二 晴

今晨虽是疲乏，大家虽有些留恋床的样子，但一想到今天是我们渴望了二月多时间的开学典礼，是个郑重庄严的日子，大家不觉振起了精神，兴奋快活充满了女生宿舍。每个房间整理得有条不紊，因为下午有首长要来参观，可以说从来没有如此美丽清洁的房间，太好了！吃过早饭即开始在大会场布置，大会场就设在女生宿舍前面的一块大操场上，设了一个台，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晚上要做戏哩！

昨天来了许多贵宾，陈军长、范长江、潘汉年以及彭师长、季方司令等等，这些要人都是来参加我们这里郑重的开学典礼的，能听到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演讲了，太开心了。

上午八时半，一切准备好了，开会仪式是先各入会场，放鞭炮、升国旗、升校旗，向国父致最敬礼，入座，校长致辞，官长训话，来宾致辞，唱新四军军歌，后散会。陈军长训话很好，可惜他是四川人，说话有三分之一，我还听不太明白，彭师长的训话很清楚，他提出一条意见，我很赞成，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添设一课军事生活，请抗大教员来讲军事课，要站岗放哨、侦察军事化等等，要有反扫荡准备。今

天的太阳特别卖力，把大会场的人晒得汗如雨下，头也有些昏昏沉沉。最后一位是季方司令，是个南方人，本来是国民党人，去年才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抗日。他越谈越长、越说越远，怕收不回来，就半途收场了。我们为他多晒了二个钟头，几乎每个人都要昏倒在场上了。

饭后，先是首长来参观宿舍，其次是淮宝中学的先生和学生来参观，一个下午热热闹闹就过去了。五点半吃夜饭，是一顿最考究的菜肴了，四只冷盆、四只大菜、一只汤。一桌上随随便便坐了四个客人、四个自己同学，兼做招待。我们这一桌有一位是淮宝中学的学生，名字叫陆颜芳，本地人，很活泼，谈谈吃吃，吃得杯盘狼藉，一直吃到天黑才吃完。

1943年10月13日 星期三

昨晚上散会回来已十二时多了，洗脚解背包上床已一时了，疲劳得倒在门板上一动也不动，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腿也麻木了，全身酸痛得很，糊里糊涂一下就进入梦乡了。今早哨子一响，急促地摺被打背包，一刻钟时间就站在操场上听队长的口令，立正、稍息、转弯等等。知道今天的会是为我们江大同学和教师们开的欢迎会，有骑兵团的操练、表演，晚上还有拂晓剧团的京戏演出，同学们精神为之一振，又全都兴奋起来。有件事使人很不好意思，就是早上一顿稀饭、两碟菜，还有很多油条，昨天吃得精光，每人吃了四、五条。他们以为我们吃不够，今天又增加了，每人吃了七条之多尚有余。不敢全数吃光，怕明天再增加，那我们全变成吃油条大王了，哈！

九时出发，阔平的道路上排列着我们许多充满朝气的同学，嬉笑的脸，活泼又快乐，雄壮的歌声伴随着我们，步伐

是那样的整齐，队伍是那样漂亮，太阳也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使出它本能的光照耀在我们头顶上，有趣的人影也一刻不离的跟随着我们。老百姓用那惊奇的眼光一眼不刹的瞧着我们，九时二十分到达会场，坐在最前面的场子上，由吴主任致欢迎词，后看骑兵团的操练。啊，我只有用那句“太伟大，太惊人”的欢呼来表示我的感觉，骑马的姿势是那样灵活敏捷，马蹄轻快，令人惊叹。以前我听到过湖西(洪泽湖)来的同学说，骑兵团的操练的场面是如何紧张宏大，因为我没有亲眼瞧见，心里总是有点半信半疑，这次亲眼目睹的演出，完全证明是事实。我除了像瞧电影一样以外，无法用任何喜悦的心情来表达我的心意。他们从马上救人、马跳高、劈杀的姿态，人从马上跳上跳下，站在马背上威风凛凛，倒骑马开枪，说不完的种种表演，简直使我目不暇接，真长了见识，知道了我们的战士们如何与鬼子去拼杀的，场面英勇壮丽，同学们禁不住不断拍手叫好，激动不已。

.....

华中建设大学

陈修良 梁承志 刘煜 智仁勇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已到了总崩溃的前夜，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了迎接抗日战的胜利，大力培养解放区急需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在盱眙县新铺镇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华中建设大学。

创办建大的通知和招生简章发出不久，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抽调的干部和保送的知识青年陆续来校，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地下党也选送一批地下工作者、职员、大学和高中学生来建大学习。

这所大学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府，是一所新型的综合性的大学。全校设民运、民政、财经、文教4个系，另设高干班、区干班各一个，学生共600多名，学制暂定2年。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原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任副校长兼管党的工作。

1945年5月4日，建大在新铺镇的古庙里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开学典礼。大会由张劲夫副校长主持，彭康校长作报告。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军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都出席了大会，并表示祝贺。

建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教育方针，采取上课与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整个学

习分为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两个阶段，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系业务课程的教育。政治课，全校统一上大课；业务课，由各系分别进行。学校除设一批专职教员外，校长和各系的主任都分工讲课。

为了搞好业务教育课程，华中局从华中解放区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根据建大各系每门专业课的要求，在总结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上百万字的教材讲义。专业课由系主任和专职教员讲授，还请党政军民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专家来校作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例如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译者梅益、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新华分社社长范长江、军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等同志作国际形势、新闻工作、党的有关政策、瓦解敌军工作等报告。

建大是在战争环境和贫困的农村创办的，因此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不仅缺乏教学设施，而且宿舍、床铺、桌凳等生活设施也没有。校部所在的新铺镇，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周围的村子也很小，农民的闲房很少，一部分师生住在群众的破旧草房里，一部分学生搭建简易土屋作宿舍。床铺更简陋，很多学生用泥块垒起两道半截土墙，铺上自编的竹笆和芦席就成通铺。学习、开会都在住处，以床铺作凳子，也是写字的桌子。住房矮小，下雨漏水，夏天晚上闷热，蚊虫又多，有些同学就睡在打谷场上。全校开大会、上大课都在新铺古庙的大殿里，学生们坐在背包上或席地而坐，以两膝当桌子记笔记。各系开会、上课则在旷场上或在小树林里。

建大师生实行供给制待遇。伙食标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5钱肉、1斤菜、1斤草、1斤半粮食。吃菜以青菜、萝卜为主。学生轮流为伙房拣菜、挑水，还到几里、十几里路以外运回粮草。

每个班都分一块荒地，学生开荒种菜，送给伙房。有的系还养几头猪，每逢杀猪改善伙食时，大家就可以喜餐一次大荤。

建大采取部队的管理办法，过准军事化生活。干部、学生每天清晨列队、出操；天天为驻地烈军属和房东担水、搞卫生。农忙时帮助收割、种地，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彭康校长和广大师生一起苦战，为新铺镇整修重铺了一华里多长的街道，使原先凹凸不平、雨天泥泞难行的土石街道变成了一条全用砖石铺成的平坦的街道。

校部和各系都成立了俱乐部，组织学生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最普遍的是大唱革命歌曲，在饭前、课前、会前，学生们都要唱几支歌曲。每逢全校开大会时，各系的同学都要相互啦、唱一番，歌声此起彼落，充满了革命激情。校俱乐部多次组织了全校性的文娱晚会，由各系演出文艺节目。新四军二师和军部的文工团也来建大演出《占鸡岗上》和《雷雨》等大型话剧。

每次演出，都在新铺古庙前的广场上临时搭台，点上几盏汽油灯。校、系领导同志和全体师生以及驻地群众都来观看。学校还经常组织校内外的篮、排球比赛。

学校的各种条件虽然很差，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完全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互相关心爱护，相处亲密无间，政治空

气、民主空气浓厚，大家心情开朗舒畅，学习紧张而获益甚丰，生活艰苦却充实多彩，广大学生深深感到建大确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正当教学工作深入进行的时候，传来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欢欣鼓舞，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朱德总司令发布了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但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抢占大城市，日伪军不向附近的新四军、八路军缴械投降。为此，朱总司令又命令我军向沦陷区的大、中城市进军。

华中局根据新四军各部正向日伪军占据的城市进军、急需大批干部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新形势，决定建大的学生提前结业，立即分配工作。校部召开了各系负责同志的紧急会议，传达华中局的指示，研究执行意见。会后各系分别动员，布置学生迅速做好小结、鉴定，夜以继日地找学生谈话，确定工作去向。全校同学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在8月25日前后就陆续离开建大奔赴工作岗位。

一部分学生由张劲夫副校长率领赴六合前线，配合淮南二师部队攻打和接管六合城。一部分学生去宝应前线，配合苏中一师部队解放和接管宝应城。财经系的一部分学生分配到华中银行以及盐管局，供销、贸易等部门工作。文教系文艺队的部分学生，有的充实到军部文工团，有的去三师七旅文工团，随黄克诚师长赴东北。

建大还有部分干部和学生调往独一军担任政治工作。校部人员在彭康校长率领下于9月3日也去宝应前线。于是华中建设大学第一期就结束了。

1945年9月，华中建设大学迁移到淮阴继续办学，1946年6月起，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不断迁移，由淮阴迁到山东临沂，再由临沂迁到胶东海阳盘石店。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所大学始终坚持教学工作，从1945年春创办，到1947年秋停办，在两年多时间里，共举办4期，培养输出干部达5000多人。这些干部，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我军的新生力量，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分布在各条战线成为骨干力量。有的至今还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岗位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尽心竭力。

这所诞生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屡经战火洗礼的新型大学，为党和国家培养众多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它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史册。

(李振之整理)

抗大八分校

刘扬生

江北军政干校是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为基础成立的，1940年6月1日在天长汉涧镇大觉寺举行开学典礼。学员分三个大队十个队，千余人，主要是部队干部、青年知识分子。当时五队成员大都来自天长盱眙高邮（金湖）六合仪扬，嘉山等地，还有一些从上海与江南来的青年学生。除五队和女生队外，其他队都是连排干部，也称军事队，营以上干部叫上干队。

9月上旬日军对淮南路东地区大扫荡，从六合、天长两路侵犯，江北干校奉命配合五支队承担保卫江北指挥部和中原局的艰巨任务。9月7日，敌人到了汉涧，当时学校还有九个队学员和校部工作人员，由五、六、七队在汉涧南执行阻击任务，保证机关首长和学员转移。敌人遭阻击后用机枪、小炮远距离射击，学员撤到大觉寺附近的汉涧大桥，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在大桥上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这场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此后，我大队人马从汉涧北向西撤往半塔方向（时属盱眙），10日晚到半塔附近。因情报得知来安日军要进攻半塔，又连夜向北往盱眙山区转移。部队在黄天集宿营，这是个小镇，住不下千余人队伍，大部分人在野外露天宿营。

中秋节那一天队伍转移到泥沛湾一带，夜晚听农民放鞭炮，敬月亮。当时敌人从汉涧向大通方向扫荡，离队伍住地只有10多里地，学员和战士们与敌人捉迷藏。当时刘少奇（化名胡服，代号一〇三首长）同志和这支队伍同行，少奇

同志和大家一起步行，他的警卫员牵着一匹马驮着伤病员和背包。9月20日队伍在葛家巷休整三天。敌人从汉涧到张公铺、大通、铜城武装游行一通就龟缩回天长。

我军与敌人周旋了十几天又回到汉涧镇，学校成了一片焦土，大觉寺被毁为平地。9月26日，江北军政干校与五支队在汉涧西南磨盘庄举行反扫荡和苏北黄桥大捷双胜利庆祝大会，江北指挥部邓子恢主任在大会上作报告，并提出了今后工作和作战任务。

10月27日，干校的一、二大队和部分学员在校教育长谢祥军、政治部主任刘毓标率领下随赖传珠护送刘少奇去苏北，只有第三大队在天长继续办学，大队长朱绍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将江北指挥部的四支队、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为适应第二师部队发展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建设需要，2月8日将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留在天长的第三大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学员由四个队扩大到六个队。3月18日干校全体学员到张公铺师部所在地赵庄参加二次师政工会议，会上师首长介绍皖南事变和新四军重新组建情况，目前敌我斗争形势等。5月4日，在张公铺北街一个宽阔的大院内，邓子恢主任宣布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正式成立，张云逸兼校长，罗炳辉兼副校长。

5月底，抗大八分校开学不久，日军对津浦路东淮南地区发动大扫荡，学校撤出了张铺，先后到新铺北面的黄庄、大通、曾家营，铜城的李长庄和铜城镇的杜天庙驻扎。7月22日日军飞机轰炸铜城，学校又转移到东面高庙的仙墩庙驻扎，后到龙岗，在龙岗过的中秋节。

到龙岗后又成立一个队为七队，又叫学生队。为了提高

学员和教职员工的实战能力和指挥水平，学校决定进行一次长途行军拉练，从天长李家楼大王庄出发途经盱眙的莲塘、旧铺、东西高庙、古城、仇集，嘉山的涧溪、白沙王、涝口、自来桥，来安的屯仓、保山集、半塔集，后经六合、仪扬地区回到天长龙岗。通过半个多月的长途实战演习，学员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对八分校教学工作的一次大检阅。

1942年4月，抗大八分校在龙岗举办第二期。1943年春，抗大八分校离开龙岗到葛家巷千棵柳办第三期，朱云谦接替何泽州任政治部主任。秋天，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八分校改为教导团，习惯上仍叫八分校，因为无论从组织规模、办学方针、培训对象、教学内容都没有变化。团长冯文华，政委刘毓标，不久冯文华调四分校任副校长，刘毓标军政一肩挑。那时为了反击敌人发动大扫荡，学校改为以队为独立单位活动，分散农村坚持学习。天长盱眙交界地区多为丘陵，地广人稀，村庄少，校级领导住千棵柳（时属张铺区解放后归盱眙）。干队、一、二队住葛家巷，校部部分机关也住在此，这是个大村庄，房屋较多。三队住益庄。

学校到了新址后，开始整风学习。整风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后期都予以纠正。刘毓标政委还在大会上代表校党委向被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5年春，军部从黄花塘搬到千棵柳葛家巷一带，抗大八分校（教导团）搬到军区原驻地黄花塘办第四期。5月，抗大四期开学，学员300多人，分为三个队，主要任务是对二师基层干部进行军政训练。8月，学员全部分到一线部队，投入对日寇“最后一战”。教导团结束教学工作到接管路东分区为止，自此第八分校胜利完成历史使命。

江淮大学

校史编写组

江淮大学（简称江大）是新四军军部于 1942 年 9 月至 1944 年 6 月间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校址在淮河之滨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所学校是根据地党和地下党通力合作的成果，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体现，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现就江大建校过程和前后两次办校情况分三个部分予以记述。

（一）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上海公共租界，并逐步接管了租界当局的行政机构，原在“孤岛”上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统统被迫取缔；进步的群众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对于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敌伪勒令登记，实施奴化教育，否则禁止开办。各校师生，不仅面临失业的危机，连人身安全也受到莫大威胁。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上海更具有革命光荣传统，他们纷纷投向自由、民主、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寻求全民族的真正解放。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和指示。毛泽东同志指出：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一起合作办学、办报、做事。还告诫我们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 年刘少奇同志在苏北参议会上明确提出：要在根据地发文化教育事

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当时正值新四军黄桥大捷之后，建立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上海知名文化人士和广大知识青年，已陆续来到华中根据地学习、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发挥愈来愈大的威力。

少奇同志指示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来组织落实这一工作。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上海地下党同志经过数次研究，并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商议，决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争取和吸收敌占区知识青年和有识之士，接受高等教育，培养成才，参加根据地建设。

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陈毅同志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这所大学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解决经费，筹办工作由江苏省委负责，上海地下党尽可能组织动员更多的师生去根据地，新四军军部组建接待机构和交通站，保证上海去的师生能安全到达根据地。江苏省委决定由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沙文汉同志具体负责江淮大学的筹备工作。省文委梅益同志、省学委张本同志在上海进行老师和学生的组织动员工作。并在淮南新铺和淮北仁和集成立了招待所，以接待由沪来校的师生。

负责江淮大学教学工作的领导人，有原之江大学、复旦、大夏大学教授，曾在美国留学，早期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韦恂（捧丹）；救国会领导成员、原生活教育社即后来的国难教育社负责人教育家张宗麟，知名文化人、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等。韦

捧丹任江淮大学校长。应韦校长聘请来根据地任教的，还有复旦大学、华夏大学土木系主任孙绳曾教授，之江大学土木系教授陈端柄，交通大学教授姜长英、叶家俊、黄镇、葛文锦，清华大学周国英，大夏大学王书伦、冯邦彦和李洪钟等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教授共约十位，助教十余人。江大学生主要来自上海之江、大夏、沪江、东吴等大学和苏州工专，以及部分中学生，前后两期均为 88 名（男女各半）。

（二）

从 1942 年 8 月至 11 月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上海一百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敌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

1942 年 9 月间，韦校长及张宗麟、孙绳曾、陈端柄等教授到达淮南，受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以及地下党江苏省沙文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不久即是新四军建军节，他们和江大师生被邀请共庆建军节。大会由张副军长主持，由二师郑位三政委讲话。韦校长和几位教授也发了言，表示要把“江大”办好，并抒发了自己从沦陷区初到根据地的舒畅心情。会上新四军战士表演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节目，群情激昂，大会由傍晚一直开到深夜。这次隆重的集会，给从“孤岛”上海初到根据地的江大师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大是理工科大学，设有土木、农学、医学、教育四系及普通科，利用根据地里的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大院作为校舍，以广阔的田野作为教室。江大的导师，既有上海来的教授，也有新四军和当地军政领导同志。陈毅同志在痔疮开过

刀后不久，还专门为欢迎江大师生举行会餐，后来还约师生到他住处去，或在晚上亲自到我们学校里来，和师生们畅谈国内外形势，分析敌我力量的变化，谈论风生，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和学习的信心。还有张云逸、谭震林、邓子恢、彭雪枫、罗炳辉、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冯定、刘瑞龙等同志，他们都从百忙中抽空来校作报告。这许多报告，使师生们了解了党的政策，开阔了眼界。江大师生在根据地接触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先后参加了边区参政会、路东八县总农抗代表大会，并且目睹群众进行投票选举，体验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精神。后来还参加了边区妇代会和冬学运动，很多同学愉快地担任了冬学教师。在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逐步地树立起革命人生观。

在淮北集合的江大师生，受到四师党政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1942年11月，作为彭雪枫同志的客人，江大全体师生曾被邀渡过洪泽湖去半城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观看了骑兵团表演和土坦克攻碉堡等军事活动，并听了邓子恢政委和彭雪枫师长的报告。彭师长还下令骑兵团让同学练习骑马，一个个骑得高兴极了。后来又参加了四师政治部举行的联欢晚会。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到彭师长住处作客，师长总是在百忙中热情欢迎大家，问问姓名，谈谈家常，无拘无束，平易近人。彭师长还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学们的生活，这时天气已寒冷，师长了发给每人一件棉大衣(这是部队里连级以上干部才发的)。有的同学生病了，他就请军医来诊

治，并开病号伙食。对于不善长跋涉的教师，他就送来驴马代步，还给韦校长派了警卫员，送了专用马匹。

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即将结束时，传来消息日寇前来“扫荡”，为了准备反扫荡，领导上通知江大师生乘船回仁和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通知紧急集合，传达上级指示：由于敌人对解放区发动大扫荡，全体师生必须立即向淮南转移。第二天到达新铺时，淮南的同学早等在那里热烈欢迎了，远远近近，歌声一阵高过一阵，两部分师生胜利会师了。

当时淮南的军政干部，正在进行整风学习，江大同学会师以后，也抓紧时间组织起来自学整风文件。约在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南根据地“扫荡”，领导上积极作反扫荡准备，大规模进行破路和全面坚壁清野，因江大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就决定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里“打埋伏”。韦校长和教授们于必要时随领导机关转移。在“打埋伏”期间，与群众一起生活，并作农村调查，参加当地冬学工作，大家干得很欢。由于有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日寇未敢轻举妄动，不久我们重又集合。

根据上级指示，江大成立了学生党支部，由沈乃恭任支书，沈曾华任副支书，支委有侯忠澍、华之毅、邱应鑫等同志。工作重点主要是稳定情绪，组织政治学习，座谈讨论，树立革命人生观；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

这次日寇“扫荡”阴谋虽未得逞，可是它野心不死，还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扫荡”。领导上为了保障江大师生的安全，于1943年初春动员大家暂时返沪隐蔽，等到情况好转

环境稳定时重来入学。

(三)

江大同学陆续回上海“打埋伏”，根据校党支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嘱咐，一是要隐蔽好，不出问题；二是布置一些原地下党员和担任交通的同学，定期与大家保持一定联系，做好思想工作，并要求回沪同学，尽可能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返回根据地后更好的为自己学习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因此，有的同学去学习速记，复习外语，学习中英文打字，参加无线电技术学校，甚至学习驾驶技术等等。

1943年春，陈毅同志在医院，专门把韦校长和陈端柄教授请去面谈，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指示他们，目前江大虽不开学，但一定要坚持办下去，要求抓紧做好开学准备。果然，六、七月间，江大开学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数同学已由地下党分配了工作，大部分都积极迅速返校，共88人在仁和集集中。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北根据地仁和集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到会的有陈毅、张云逸、范长江、彭雪枫、刘瑞龙、潘汉年、季方等领导同志，以及地区负责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宝中学的代表。会场是设在女生宿舍前面的一块操场上。会场布置得朴素庄严，同学们还以墙报形式办了个展览会，汇报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到江大以后的思想变化。上午开会由韦校长主持，他致词后由陈军长、彭师长、季方等同志讲话，全体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下午首长和来宾参观了男女生宿舍和几间教室，傍晚会餐后由同

学们自编自演了一些小歌剧和文艺节目，大家尽欢而散，度过了一个同学们盼望已久的开学典礼。

新的学期开始了，课堂是设在一所不用的祠堂小学里。韦校长亲自教英文，除张宗麟老师已去延安外，在校的教授也分别开课，其中以李仲融老师的哲学课最受欢迎。有的系因为没有老师，也就开不了课。

这时江大又成立了后期的党支部，具体工作由该校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来抓。这一期支书由沈曾华同志担任，支委有侯忠澍、诸启元、徐秉渊、李耀等同志。由于当时江大支部不公开，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学生会来进行的。学生会是由同学民主选举产生的，主席是侯忠澍。这一段时间，党支部领导下的学生会工作做得十分活跃、出色。他们组织学生用自己的双手铺起一条从女生宿舍到食堂的砖石路，解决了下雨天路滑摔跤的困难；组织有医学常识的同学和护士一起为农民治病；组织同学种植蔬菜，既节约了菜金又改善了生活；冬天，还抽出同学协助村上办冬学，既上文化课又上时事教育课，很受村民欢迎。

学生会邀请抗大军事教员来校实地讲课，组织大家进行军事训练。行军拉练，站岗放哨，以加强敌情观念。

1944年春，敌我形势有了根本变化，日寇在太平洋战线上逐渐失利，这时四师对敌作战也连连告捷，先后拔除了敌伪44个据点，根据地扩大了。由于工作的开展，急需补充大量干部；江大本身也由于师资缺乏等原因，不好再办下去；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经领导研

究，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江大结束，全部同学由军部和地方党委安排工作。1944年6月，同学们怀着对母校难舍的感情和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辞别了韦校长，分头走向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党政军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各条战线上，发挥自己的力量。

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余名，吸收了一批爱国教授进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了两年之久，在党的统战史上，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江大师生由于党的培养，从韦校长和张宗麟教授到绝大多数同学，后来均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解放后，韦校长和张教授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七十年前的“江大”，曾是哺育年青人的摇篮。江大同学永远怀念你！永远珍爱你！真如杜淑贞同学诗中所说的：“江淮风雪育新兵，百炼千锤四十春。梦回跃马半城镇，心系高歌大柳营。喜泪纵横花怒放，欢颜焕发草初青。今朝共庆神州好，老骥长存赤子心。”这首诗代表了江大全体同学和老师的心情，愿以此作为结束语。

淮南艺术班

齐锡朋

1940年3月下旬，半塔保卫战获得胜利，国民党的顽固军队被赶到三河以北。四月，淮南路东八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次年四月，为了培养政权建设的所需要的各方面干部，路东省委决定举办行政学院，方毅兼院长，祁式潜兼副院长。该院分设行政系、财经系和艺术系。这三个系驻地分散，不在一起。淮南行政学院艺术系，又称淮南艺术班。

1941年6月底7月初，盱眙县宣教科通知，调我到淮南艺术班学习。当时我在学校工作，办完移交手续后，冒着蒙蒙细雨，踏上泥泞小道，赶到淮南艺术班驻地曾家营。多数同学已经到校了。这个班的学员，是由路东八县的宣教团员、小学教师，淮南联中转来的学生和从社会上招收的知识青年组成的，约有一百余人。班主任(兼教员)是莫明同志。教员有孙铮(女)、张泽易、何铁征、赵迪等七、八人，工作人员只有一、二人。

学员到齐编队，举行开学典礼。行政学院副院长祁式潜到会讲了话。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也来艺术班讲过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作的关于苏德战争的形势报告。他身穿灰布军壕装，用缓慢有力的声音，首先介绍了苏德战争的战争的起因和现状，并且阐述了战争的性质，国家的性质，然后从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等方面，分析了交战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最后，作出苏军能够阻止和打退德军进攻的结

论。他的报告，打消了当时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提高了我们对形势的分析能力，同时也稳定了学员的思想，增强了大家在战争环境中进行学习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艺术班的学习、生活，往事如昨，记忆犹新。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这既是艺术班的教学要求，又是每个学员的行动准则。这是出于处在战争环境，要争取时间培养学员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班设大队部，下设两个中队，一个直属区队。第一、第二中队的代号，分别为“黄河”，“长江”。直属区队的代号为“珠江”。大队干部是何秋征、赵迪老师；中队干部是学员担任的。第一中队长是江波，第二中队是谁记不清了。直属区队有二十余人，都是教师；编队时，大队指定我任区队长，大队还派来梁俊同志任副区队长，吴曙，周庆生二位同志分任第一班和第二班的班长。为了保证艺术班全体人员的安全，从中队里抽出一些学员，组成一个武装班，每人一支步枪，若干发子弹。吴祖庚、刘彬都是武装班的成员。我还有印象，吴祖庚背的是马拐步枪。

中队长和直属区队长轮流值日，负责管理学员一天的学习生活。每天早晨五点钟起身，五分钟之内要打好背包；队伍集合后，由中队、区队干部带领，跑步三十分-钟。洗漱后，吃饭前，全体学员整队唱歌，待值日人员把饭菜分碗盛好，值日队长发出“解散”、“开动”的口令，大家才散开，分班吃饭。饭后也不随便离开，要集合唱歌后才解散。开饭时间规定十五分钟。每天上课、开大会，都要整队去整队回。

各班轮流值日人员的职责：打饭，打菜，打开水，打扫卫生，检查整理内务。看背包是否打好，背包、鞋子和碗盆

是否按规定放好，毛巾、挎包是否挂好，等等。不合规定要求的，要予以纠正。

在学习期间，还搞过紧急集合。夜间集合不点灯，打好背包，带齐个人东西，到指定地点集合，规定时间为五分钟。因此每晚睡觉时，背包打开，衣物要放到固定地方，要按次序放，放后还要检查一遍。不然，紧急集合时，不是丢东西，就是时间不够用，达不到生活战斗化的要求。

我们经常吃的主食，大家叫它“鳖打拽”。这种食物，是用面团拍成扁扁的圆圆的，它比搪瓷碗口稍小一点，放在开水锅里煮熟了就能吃。这种主食，那时是上等食品，能够吃到它，也就满意了。艺术班每月还发给学员一元钱津贴费。当时，曾家营没有店铺，钱用不上，结业时，我把发的两元钱带回家。

每周末，艺术班都开同乐晚会。演戏、唱歌，气氛十分热烈。黄河小合唱、口琴独奏，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艺术班学习任务重，生活紧张，但学员精神饱满，生活愉快。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团结友爱，感情融洽，亲密无间。

艺术班的课程有音乐、戏剧、美术、政治。美术组学员不多，约有十人左右。他们上课，每人拿着讲义夹，在室内外写生画画。音乐、戏剧组学员多。音乐课开始练习唱歌，用纸张抄歌词贴在墙上，由吴祖庚定好调子领着大家唱。要求人人会唱，能领唱、教人唱。三、四天后又换新歌。过一阶段，学员中有的练习作歌词、谱乐曲。学习后期，莫明班主任上作曲法课，讲了乐句、乐段和旋律。戏剧课讲表演术、化装术和舞台装置。孙铮、张泽易等上表演术、化装术课。

何秋征上舞台装置课。教员边讲边做，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效果很好。当时条件差，艺术班发的教材是油印的。我还记得，作曲法教材是红油墨印的。政治课，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两篇重要文章：《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方法是在自学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学习体会，互相促进提高。通过学习，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而奠定了献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学习期间，张云逸副军长、罗炳辉副师长，都来艺术班看望过我们，对我们鼓舞很大。罗副师长还叫学兵连为我们作劈刀和立姿瞄准的军事表演。有一个机枪手由于臂力差，机枪端得不稳，罗师长亲自作示范动作。他身体魁梧，把机枪端得既平又稳，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有一天，抗大八分校文化队路过艺术班，我们列队路旁，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抗大文化队！”“向老大哥学习！”……。他们头戴大斗笠，身穿灰军装，非常威武。我们羡慕之心油然而生。他们的到来，对我们的学习有促进，提高了我们在战争环境中争取时间学习的兴趣和决心。

八月初，得知天长方向的敌人要来扫荡，艺术班就搬到大通镇。几天后，又迁到郇家营。尽管经常流动，也没有影响学习。走到哪里，学到哪里，这也是艺术班的一个特点。

艺术班结业时，行政学院副院长祁式潜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在结业典礼上，每个学员领到一张结业证书。结业时学员的分配，除教师身份的学员仍回原单位，个别学员分配到县武装连队当文化教员外，其余学员都分配到淮南大众剧团和八个县分团。结业前，每人对在艺术班的生活、学习、都

要作个人小结。我的印象里，我就写过学习小结，觉得收获很大，受益不浅。总起来说就是三句话：政治思想上得到武装，树立了抗日必胜信念；生活上受到炼锻，组织纪律性加强了；业务上有了长进，宣传教育工作的本领提高了。

艺术班的下一期，更名为淮南艺术专科学校。

艺术班距今七十年了。我在该班学习、生活，虽然仅仅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在我的革命征途上，却是很重要的一步，使我至今尚在不断缅怀和珍惜。在这所学校任教和学习的人们，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战斗间隙创办的学校，虽然不合规范，但它造就了人才。所以我写了这篇短文，以资纪念。

淮南新医进修班

唐 国 怀

1944年春，新四军开辟了淮南津浦路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成立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八县联防司令部。由于形势的需要，为培养医务工作者，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于1944年7月，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了淮南新医进修班。

进修班校址在盱路县张洪营，虽说是根据地中心，可是距敌人的据点只不过几十里。领导要求；充分做好思想准备，情况特别紧张时，集体转移到乡下上课。情况好转了，回原校上课。实际上，因当时张洪交通闭塞，日寇从未来扫荡过。

该班由方毅同志兼任班主任，宫乃泉、林震两同志兼任副班主任。夏俊同志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全面工作。教职员工十多人。学生约一百名，分成十二个小班。学生是分别从盱眙、来安、嘉山、高邮、淮宝、天长、六台、仪扬路东八县招考来的。

校舍是张洪大庙，四间大殿做教室(后称礼堂)，大殿对面五间瓦屋与殿后五间草屋是宿舍。另外，学校盖了六间草房，总务科、厨房各三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办学是困难的，但师生们发扬延安精神，走抗大道路。没有课桌凳，就用背包当板凳、大腿作课桌。上课时学生坐在自己背包上，讲义夹放在大腿上看书写字。睡觉没有床，用泥块垒起土墩子放上木板就行了。无黑板，到二师师部借来木黑板。没有课本，教师编印讲义。就这样，学校办起来了。

进修班开设政治课、生理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药

理学、战地救护学、卫生学。政治课每周开一节，其他科目每周各开七节。政治课讲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讲近百年来列强侵华史，讲当前淮南斗争形势，讲日寇投降后我们怎么办？教毛主席著作时，吴老师理论联系实际，精辟地讲解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战略战术及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使学生确立了中国必胜，日寇必败的信念。上近代史课时，吴老师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把近百年历史事实有声有色地描述出来。学生了解了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明白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激起了爱国热情。上业务课，教师运用教具，用心脏、骨骼等模型进行直观教学，还充分利用挂图或在黑板上绘图进行讲解，学生深感兴趣。教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勤奋。学生年龄不一，水平参差，有高小毕业生，有中學生，也有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教师除平时上好课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补课，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新医进修班开办时间虽然不长，却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师生们生活紧张活泼。每天，天麻麻亮，嘟嘟的哨声一响，大家就起床。五分钟打好背包，集队跑步。接着，到长着翠竹的庙沟边漱洗，开饭前整队唱歌。我们爱唱《大刀歌》、《反对自由主义》等歌曲，其中一支歌词是：

小车子咕噜咕噜响，
草帽背在脊梁上。
敌人来了莫惊慌，
急忙趴在大路旁。

乒乒乓、乒乒乓，
打得敌人心发慌。

.....

阵阵响亮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

进修班每天上午四堂课，七点半上课，下午三堂课，两点上课。每节课一个小时。晚上自习，学生坐在背包上自学或讨论。星期日也照常上课。为了安全，天天晚上派学生站岗，两人一班，两小时一换。每天的生活、学习都是这样有条不紊。

抗日期间，政府财政很困难。学校千方百计改善学生伙食，组织学生喂猪、种菜，达到每星期一大荤，三天一小荤，饭也吃得饱饱的。另外，还发毛巾、肥皂等日用品。进修班的学制为一年，毕业前，学生到二师卫生部(在大柳营)实习，做尸体解剖，进行实验教学。这样理论联系实际，效果好。

第一期学生是1945年3月毕业的。学校发了同学录和毕业证书，由政府统配，分别分到区、乡保健堂、县卫生所、专署医务所等单位工作。

第二期于1945年3月招生，因形势有些紧张，学校迁到半塔集的鲁店，后集体转到路西，编入部队，投入战争，进修班完成它光荣的使命了。

淮南大众剧团在盱眙的活动

黄宝殿 朱茂业

淮南大众剧团建立于1940年，属淮南区党委、军分区和新四军五支队(后改称“二师”)领导。张泽易任团长兼指导员，何秋征任副团长。主要演员有：郭民、陈真、何捷民、何仿、龚枚、龚林、李枚(女)、李智(女)、王祝(女)、殷鸿、吴祖庚、于进、陆艺、刘鹏、夏侯魁、甘潮等。还有一个炊事员，一个勤杂人员，两个驴驮子(常用来运输幕布、服装、道具、粮食、行李等)。大众剧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人民组织起来，打击敌人，保卫家乡，保卫生产。每到一地演出，剧团人员筑土台或搭木板台，有时利用农村谷场，幕布一围就演唱。

1940年-1945年，淮南大众剧团常在盱眙县的古城、西高庙、仇集、河桥、自来桥(现属嘉山)、1日铺、新铺、穆店、泥沛湾、土只头桥、都管塘、老子山(现属洪泽县)、大通镇(现属天长县)、盱城镇等地演出。也曾多次奉命到新四军军部黄花塘演戏、玩花船。饶漱石、陈毅、张云逸、罗炳辉、方毅、张劲夫、钱俊瑞、范长江、肖望东、潘汉年等领导人都看过大众剧团演出的节目。

1942年夏，淮南大众剧团在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劲夫领导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由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范长江具体领导全团人员深入群众，向民间艺人学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这时淮南大众剧团由演话剧、歌剧，改为唱地方戏——

扬剧。为演出需要，我们编写或改编了许多现代剧，剧本很多，如《保家乡》，编剧王永泉(民间艺人)。剧本主要内容为日军下乡“扫荡”，强奸一名妇女，她丈夫是民兵，以后配合新四军打回来，消灭了敌人。《生产战线》，编剧张泽易，剧本反映了革命根据地农村春耕大生产的动人景象，导演兼作曲为何秋征。《丁赞亭》，编剧吴强，剧本反映了当时恶霸地主破坏新政权“三三制”的情况，导演为张泽易。《从军记》，编导王永泉、张泽易，此剧歌颂了解放区人民送子参军的革命精神。《李桂五》，编剧张泽易、王业淳，此剧主要是写西高庙区的共产党员李桂五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的故事，导演为孙铮，张泽易。还有历史剧《九宫山》，编剧李一氓，原为京剧本，何捷民将其改编成扬剧，主要内容为李闯王进京，因骄傲而失败。如此等等。这些剧目的演出，大大地丰富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娱生活，同时也深刻地教育了人们，鼓舞了斗志。

1942年内，我们淮南大众剧团常在农村演出。一天，在盱眙砖坝滩(现三河农场)，和淮北人民剧团联欢，各自演出了剧目，并举行了野餐。这次淮北人民剧团是乘船过淮河来到淮南的，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滚滚淮水之滨，两个剧团联欢真是不容易呵！临别时，团员们依依不舍，紧紧握手话别。淮南大众剧团全体人员列队唱了由张泽易作词、夏侯魁作曲的《送行歌》，歌词是：人民大众是亲密的同志，是亲爱的战友，我们匆匆相会，又匆匆分手，别忘记你们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再会，再会吧！在那一九四三年胜利的年头。

1943年春，淮南大众剧团在自来桥连续演出四天。一般

情况下，剧团在一个地方演出一两天就离开了，可是自来桥的工、青、妇、抗分别出面挽留，剧团只好在这里连续演出。这次不仅剧目几乎演光了，演员们也非常疲劳。郭民同志在一天晚上累得打磕睡，不知道上场演戏了。那时，白天排戏，有时还要参加生产，晚上演戏，真把大家累坏了。

1943年秋，大众剧团在老子山演出，一天晚上演完戏后，为了提高大家革命警惕性，还搞了军事演习，因为老子山曾被日伪军偷袭过，所以要随时准备跟敌人战斗。不料有个同志小马弯枪走火了，险一点打伤人，队伍一阵混乱。张泽易团长立即吹哨子高呼：“这是搞军事演习，大家不要慌张！”在团长的号令下，大家重整队列，继续演习。

可见大众剧团既是一支文艺队伍，又是一个战斗集体。

淮南大众剧团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分化瓦解敌人，还曾多次接近敌占区演出。敌占区的日本兵白天活动，晚上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这就使我们有机会做伪军的工作。有一次，我们请了几个思想较开化的伪军来看戏，剧团特地赶编了一个《伪军自叹》扬剧唱段，在戏剧换场次间隙中插入了演唱，其唱词是：

我的名字叫王强。

悔不该把伪军当，

鬼子下乡来“扫荡”，

我替鬼子抓人又抢粮，

对不起众位乡亲，

对不起我二老爹娘……

演员在台上动情地演唱，几个伪军坐在台下低头沉思。

不久，这几个伪军携枪反正，参加了新四军。

非常值得回忆的是 1943 年春的一天。那天大众剧团在盱眙县黄花塘为新四军军部演出，开始是玩花船，因场地小，观众多，花船传不过身来，再加上秩序混乱，实在难以表演，演员们个个面呈窘色。正在这时，只见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站起来，向部队喊了一声“起立！”部队唻的一声站了起来，在那个军人的指挥下整顿秩序，打开了场子，于是花船撑了起来。演出过后，我们才知道，那位身材魁梧的军人就是陈毅代军长，演员们说：“陈毅代军长为我们打场子，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誉，我们将终身难忘”。

还有一次，那是 1944 年秋的一天，大众剧团到黄花塘军部演出，原打算演戏的，但军部首长说，这次观众中有五个外国人，戏曲他们听不懂，还是玩花船好。于是我们改玩花船。我们的花船载歌载舞，博得“洋观众”哈哈大笑。后来领导上告诉我们，那五个“洋观众”原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总队的，他们驾驶的 B29 型轰炸机，在执行对日轰炸任务后返航途中引擎发生故障，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在苏北建湖县境内，后经新四军战士和当地民兵营救脱险，并被护送到新四军军部。

在抗日烽火中，淮南大众剧团主要活动在盱眙。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那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我们仍记忆犹新。我们深信，淮南大众剧团艰苦奋斗的精神，定会激励着盱眙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英雄的母亲 甜美的乳汁

邓淮生

淮河，母亲河！她养育着世代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人民。淮河流域也是新四军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战斗、生活的一个重要区域。我们这些新四军的后代，很多人的名字中都带有一个“淮”字，因为我们都是在淮河流域、洪泽湖边出生的，我们曾经喝着淮河的水，吸吮着淮河母亲的乳汁而成长。我们对这一片土地，对这一地区的人民，对这里的父老乡亲，始终怀着深深的眷念和深厚的感激之情。

淮河流域、淮河两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所做出的历史作用永远不可磨灭。淮河流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中重要的根据地之一。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组成了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建立，1938年1月6日转移到南昌公开对外办公，4月，转移到安徽的皖南地区。皖南事变以后，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江苏盐城诞生，1942年底军部又从盐城撤离，1943年1月10日，迁移到盱眙黄花塘。抗战结束以后，新四军北上山东，将军部设在山东的临沂，一直到1947年初，新四军番号于1947年1月21日撤销，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

从1938年开始，新四军执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向

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1939年春，派遣叶挺军长、张云逸副军长、我父亲（邓子恢）和赖传珠参谋长来到江北。于5月上旬在安徽庐江东汤池建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后东移到六合、盱眙等地。皖南事变后，成立新四军第二师。长期以来，新四军就是在淮河之滨打击和抗击日寇的。同时，党中央又从八路军中派遣两支部队南下华中地区，一支部队南下到淮河的上游，也就是桐柏山区和河南地区，成立了新四军的游击支队，以后东进到皖东北，皖南事变后改编为第四师。另一支部队由山东南下苏北，后改编为第三师。所以整个八年抗战的战斗中，新四军一直是战斗在淮河之滨。淮河两岸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中，送出了自己的子弟、父兄来参加到新四军里，成为我们新四军战士和干部的重要来源。为中国革命，为抵御外寇的侵略，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重大的贡献。

我父亲和陈毅军长、刘少奇政委、张云逸副军长、曾山、粟裕、谭震林、徐海东等同志一起长期在这些地方战斗。我们这些后代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淮”字，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谭震林同志的儿子谭淮远，曾山同志的儿子曾庆淮，我们都有一个“淮”字。我们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我们对这里的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仅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新四军战斗，而且是这里的老百姓养育了我们，哺育了我们。我们喝的是老百姓的乳汁，吃的是人民的米糊糊。

1947年底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派刘邓大军南下黄河，进入大别山区，穿过淮河流域到了淮河的上游。自古道：得

中原者得天下。毛主席这一战略决策无比英明。所以，在解放战争中，淮河流域又养育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改成为第二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后改为第三野战军。

1948年，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调我父亲和陈毅到中原地区工作，成立扩大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我父亲邓子恢任第三书记，统一领导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战略行动，下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决战。我们就从淮河的下游又到淮河的上游，也就是现在的桐柏山区，以后打淮海战役又到了淮河的中游，息县、淮滨、固始、阜阳等这些地方。所以，整个的淮河流域和两岸人民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负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的二野和三野的干部有很多都是出身淮河流域的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四大战役，有两大战役是在淮河流域进行的，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都是在淮河流域进行的，都是二野和三野的部队打的，解放了京、沪、杭，推翻了蒋家王朝。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淮河流域的人民，淮河的父老兄弟是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的。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和经济的发展来之不易，是千百万人民的牺牲和流血，特别是我们两淮人民的牺牲和流血构筑起来的。不要忘记他们，当我们今天生活在幸福的日子的时候，当我们喝酒吃龙虾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国历史，回忆起这些，更会激发我们的斗志、勇气和力量。

我们淮河流域的人民不仅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做出杰出的贡献，在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中，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步伐中，也是打响第一炮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满目苍夷、百废待兴，淮河两岸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在新获得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但淮河水害滔天，每当水灾发生，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水害为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害。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并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新中国初期建成的第一项伟大水利建设工程，给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利益。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他得知淮河下游和洪泽湖沿岸各县人民为淮河水资源的分配利用纷争不已，以至持械相争，严重影响人民生产和生活安定。他经过广泛调查发现这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不合理造成的。于是他在协调并征得有关省地县同意后向国务院报告，将洪泽湖沿岸各县均划归江苏省管辖，淮河下游各县均划归安徽省管辖并得到国务院批准。此举有效地解决了淮河和洪泽湖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实现了权责利的统一和协调。这就是今天的行政区划的形成。也许这可以为我们的流域经济构想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吧！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安徽省凤阳的小岗村，从我们的淮河流域的农村发起的包产到户开始的，是我们淮河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的贡

献。有人称“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我父亲在1962年因为向党中央毛主席推荐安徽凤阳地区的包产到户在中央受到了撤职处分，被批为“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自始至终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坚持相信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事物一定是正确的，相信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以后，就是他倡导的包产到户打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不是邓子恢有什么本事，是我们淮河的人民用他们独创的革命精神和特有的大无畏的精神为邓子恢提供了政策依据。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我们的先人，是我们的前辈，用生命和鲜血，用委屈来实现的！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淮河流域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盱眙县所倡导的这个淮河文化交流的平台，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能够为我们淮河流域经济和中部地区的发展形成区域经济作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更大的贡献！

听父母亲讲那过去的事情

谭晓雯

往事如云，岁月似烟。退休后远离了不由自主的紧张工作和纷繁杂乱的人世纠葛，本以为可以享受静心养身之闲了，然而许多难忘的往事总魂牵着我，许多感人肺腑的过去总梦绕着我，它激励着已是满头白发的我回忆思索，并提笔把自己的经历与故事写下来，告诉世人、留给亲人，为自己的历史短篇、为父母养育之恩表明心迹、诉说感受；为新四军革命先辈和新四军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浩瀚长卷增字添页，留下一个平凡革命后代的一段真实和对新四军及黄花塘人民的无限思念与崇敬之情。

从我懂事记事起，父母就常对我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黄花塘母亲们的“百家乳”哺育了我，是军部几位首长的杯中羹和淮南人民群众的米糊糊养大了我，是新四军战士的急救药“盘尼西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亲说，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3年春。当时，新四军军部刚从盐城移驻到黄花塘，又正值春荒之际，由于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与“清乡”，新四军赖以生存的淮南人民生活于动荡流离、饥寒交迫之中。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真反共假抗日，断绝了新四军的粮饷供应，一时间内指战员们只得靠野菜、米糠、少量配给的黑豆为生。常期缺盐、少油、无糖，普遍体质下降。

母亲生下我后因饥饿和生病，任凭多方求法，始终无一

滴奶水可喂养我，刚落地待哺的我因饿哭得声嘶力竭。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在行军途中，已丢失了腹中一个尚未问世的孩子，现终于又得到了一个漂亮可爱、视为爱情结晶和生命延续的女儿，见无奶可维系刚入世的小生命，心碎不已。

当黄花塘村的老乡们，得知一个新四军的后代无奶之难后，决定轮流给我喂奶，一家一家地将我抱去，先把我喂饱了，再将几乎干扁的奶头塞进自己孩子的嘴里。听父母说，他们看着不懂事的我，贪婪饱吸后甜睡的样子，却不得不听着老乡自己孩子的哭叫声，十分心痛和不安，但老乡们坚持以此报答新四军打鬼子的恩情。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为了我的存活也别无他法了。

小时候，每当父母动情地对我说到此事时，总让我不要忘记黄花塘人民群众的养育恩。当时我听听就过去了，直到后来自己当了母亲，又经历了自己的女儿当母亲，感受过自己心肝宝贝饥饿时揪心的哭叫声后，才深切地体会到父母反复让我记住黄花塘人民群众“百家奶”的心灵震撼。

父亲说，我长到三四个月以后，一是我吃奶量惊人，每天吃完奶仍哭叫不停，似乎总也喂不饱似的。二也是不打算让我继续与老乡家的孩子们争食了，决定以野菜煮水放盐和用米糊糊喂我。由于品尝过了乳汁的甘甜和醇香，加之野菜加米(豆)糊或苦涩或无味，我抗争着不愿入口。又开始了终日哭叫不停的日子。

父亲说，我从小脾气就倔，还特别精，只要没有奶味，喂食的勺子还没到嘴边，就委屈地大声哭叫，并左右使劲地摇晃着脑袋，不肯进食。当他们把食物硬塞到我嘴里时，我

就用小舌头死劲地往外顶。当他们不得不揪着我的鼻子强迫我张嘴，把米糊糊送进我嘴里后，我又哭叫着吐了出来。父亲说，他们以为我那么小，还不懂事，饿极了就会饥不择食的。哪知我就是不吃，直哭叫得实在没力气了，脸上挂着泪珠睡着了才停止喊叫。后来连哭声、眼泪都没有了，紧闭双眼不停地抽泣着就是不进食。

我的“绝食”和“死顶”惊动了军部的几位首长。此时，军部已驻扎稳定，人民群众为弥补军部首长整日米糠、黑豆，营养极其不足的困境，集体奉献了两头奶牛(军部坚持按价付了款)。此后，军首长们视牛出乳情况，每人每天可分得约半小茶缸的鲜奶(因当时牛也瘦得常常挤不出多少奶来)。当首长们得知父母为了不让我与当地的弱母瘦儿们争食，而我无奶绝不进食的“顽强”后，陈毅军长带头、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每人每天从他们少得十分有限的牛奶中，各倒出几口让父亲搀着从老乡处买的米粉打成糊糊喂我。虽没有糖，但有了奶香味再加点盐，我在饿得快不醒人事的情况下，终于开始进食了。父亲说：要不是军首长们把他们自己的杯中食匀给你这个小东西，人民群众拿出自家老人、孩子都舍不得那一点点细粮粉供养你，真担心你会哭饿得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在那种情况下真不知如何才能将你养大！

当时，我父亲是军部参谋一科(作战科)的科长，母亲是军部机关的政治协理员。我听父母和一些叔叔阿姨说，当时参谋一科的同志与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家与赖参谋长家门对门，赖参谋长家的旁边住的是机要参谋楚青阿姨(粟裕夫人)和罗伊阿姨(李进夫人)。他们十分

喜爱我，除他们外，最疼爱我的要数赖参谋长的夫人孙湘阿姨了。父母说，孙湘阿姨一表人才又是女中豪杰，当时她在远离黄花塘的一个地方工作，好几天才回黄花塘一次，但只要回来，就抱着我亲个不够，说她喜欢女孩儿(当时他们夫妇已有一个男孩，即赖小鹏大哥)。作战科的叔叔阿姨也给了我许多的关爱和照顾。喂过我奶的大婶大妈阿姨们，更是带着他们的孩子常到军部来串门。父母说，那个时候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真是比亲人还亲。

由于黄花塘新四军的孩子不多，在那么多叔叔阿姨和老乡的关爱和照顾下，我脸色越来越好。后来黄花塘的大婶大妈们还教我母亲将猪油或鸡蛋拌在米糊糊中喂我，我越长越胖，不久就成了一个“小胖子”。到10个月时，竟然会自己扶着军部门前的小树，跌跌撞撞地在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晃来荡去，方法是先抱住一棵树站稳了，选中下一个目标。再跌跌撞撞地向最近的另一棵树奔去，院子里的小树成了我学走路和自娱自乐的工具与伴侣。我一边在树之间转来跌去，一边小嘴巴还叽里咕噜、吱吱呀呀也不知在说些什么，这在当时也算是个“聪明宝宝、能干宝贝”了，因为当时的孩子一般要到一二岁以后才会走路、说话。父亲说：“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家的小文(孩时的小名)是没奶的孩子早长大。”母亲说，那是黄花塘母亲们的百家奶催大了我，是军部首长及新四军战友们的关爱滋养了我，是淮南一方水土、乡情绿树草屋聪慧了我。

据父母讲，赖参谋长有一个照相机，军部邹建东是负责照相的工作人员。1944年春，不知是赖参谋长还是邹建东给

作战科的同志照相，也给我拍了一张扶着小树的照片(该相片一直在家珍藏着。父亲说，渡江战役时行李全丢了，但这张照片一直在他胸前内衣口袋里珍藏着才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一张李进叔叔抱着我与作战科四位叔叔的合影，是李进叔叔的夫人罗伊阿姨保留下来送给我的。在该合影照上，前排右起抱着我的为新四军老战士、建国后任总后副参谋长的李进叔叔(现已去世)。他旁边为郭宪成叔叔，一说早在抗日战争中已英勇牺牲，一说建国后在上海法院工作，现已去世)。后排右为桑知行叔叔(建国后调外贸部任商务参赞，现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的会员)。后排左为叶超叔叔(当时是作战科副科长，我父亲调离后他接任科长。离休前曾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等职，现也已去世)。还有一张珍贵的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老照片，是当时参谋一科战友们在住所院内茅草房前的集体合影。前排右一为郭连潮叔叔(建国后在浙江省某部工作，现已去世)，右二为罗伊阿姨(当时是军部的机要员，后与李进叔叔结为夫妻，现也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的会员)。右三为李进叔叔，右四为鲍旭叔叔(原名鲍官亮，据说是当时作战科年纪最小的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后排右一为杨仁和叔叔(建国后曾在军委情报部工作)，右二为我父亲谭知耕(建国后任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2001年4月去世)，右三为金冶叔叔(建国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职，2006年去世)，右四为郑秋江叔叔(从军部调一线部队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右五为郭宪成叔叔。看着照片上这一个个打着绑腿、随时准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奉献自己一切的新四军老前辈们当年稚嫩的脸庞和身后简

陋的泥草房，想着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平凡而又伟大的铁军精神和丰功伟绩，鞭策着我退休后带病参加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并甘愿在研究会中无私无怨无悔地奉献着，继续地学习着和接受着革命传统的再教育。

我之所以能有今日，父亲一直说：“真是不容易啊！”他说我在黄花塘还经历过一次“鬼门关”。那是在我尚不足两岁时(约1944年冬、1945年春)，开始我感冒、咳嗽、流鼻涕，发烧后拖了几日竟转为肺炎。如今，孩子得了肺炎完全不必担心有生命之危。而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加之父母工作忙，又没有经验，直至滴水不进、昏迷不醒、高烧不退时他们才意识到要找医生去救治。

据父母讲，当时军部、华中局门诊部的医务主任是钱讷仁阿姨。钱阿姨是季方叔叔的夫人，医术十分高明，医德更是受到军部和当地人民的交口称赞。她本人是小脚，但不管白天黑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军部周围的村村户户都有她的关爱和足迹。不论是首长还是普通干部、战士，不论是军人还是当地的老乡，只要找到她，她就不辞劳累、不怕传染、不嫌脏苦地精心医治，它为军部和华中局黄花塘周围新四军病员的医治和密切军民关系，付出了全身心的努力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父母将我送到她那儿时，她见我高烧几日不退，神智不清，病情甚重，就与我父母商量，将我留在她自己家里守护。据父母讲，整整一个星期，她白天一边给别人看病，一边为我熬药医护着我，晚上就让我与她睡在一个床上。在劳累一天后，她每晚几次起夜，给我量体温、喂药、用冰水擦身降温。几天过去了，我仍不见起色。父母已做了“不行

只好埋了”的伤心表态与打算，是钱讷仁阿姨始终不放弃救治。直至打报告请示动用了两针当时十分珍贵的、据说是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购得的进口盘尼西林才将我救治过来。建国后，父亲带我去看望钱阿姨时要我给钱阿姨跪下磕头，说：“要不是钱阿姨把你抱到她自己家里去日夜坚持救护了一个星期，你的命早没了。”

而钱阿姨却说：“小文啊！记住，那是军部首长的关怀和配给新四军指战员们的急救药救了你。战争年代每一个幸存者能走过来都不容易，包括你们这些后代。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报答党、军队和父母的养育之恩啊！”

父母一件件、一次次地叙述，新四军首长、叔叔阿姨们深情的关爱和难忘的教诲，使我与黄花塘和新四军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情结和缘念。我退休后三次专程去了黄花塘。我永远不会忘记黄花塘的母亲们和新四军的养育、救命、关爱之恩，也盼望着新四军和黄花塘的历史丰碑能永远高矗，并能越加高大和夺目。

（

让昨天告诉今天

邓小燕

探访父辈浴血奋战的故地，我们一行人开始了一次特殊的旅程，到苏北的淮安等地，去新四军重建后的两个军部所在地，以圆我多年之梦。

高良涧码头

从淮安冒雨驱车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洪泽县的高良涧。这是洪泽湖东岸的一个小渡口，岸边停泊着许多渔船，由于洪泽湖西岸高(水位相当于东岸的三层楼)，一发水必淹此地。建国后在此地加高了堤坝，并修了三个闸泄洪，自此这里告别了洪灾之难。1998年洪灾，这里也未遭损失。

当地的同志告知，1941年父亲就是在这里登船去西岸前往新四军第四师，对其进行整顿。我来此地，妈妈无数次对我讲过的故事又在耳畔响起。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接到刘少奇同志的电报，准备前往盐城新军部就职。出发前，临时接到通知，要他先绕道淮北抗日根据地，赶往西岸的半城，去四师帮助整风。在这个渡口，父亲一行在防洪堤坝上看到了刚刚围剿在押的匪首(当时湖匪极其猖獗)。负责剿匪的周骏鸣团长劝他暂时先别下湖，但他不顾危险乘船过湖。所到之处，无不看到渔民生活之贫困。不少男子光着腩，连大姑娘也仅以布片遮羞，锅里只煮一些小鱼虾充饥。一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出去谁穿，余者躲在舱内。当时天气还很凉，父亲看了心情十分沉重。他说只有人民翻身，才会有幸福的日子。同时，他叫警卫员去买些吃的给小孩子们，并脱下身上穿着的外裤给了那家渔民，自己在寒风中仅穿着一条薄薄的衬裤……。

由于加高了大堤，重修了新码头，现在那个旧码头已不用了，只有几块被磨损的大石头静静的留在原地，它见证了当年父亲的一言一行。我默默凝望那个旧码头，好像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听到这几块大石头无言地讲述着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历程。我下车看了老街，又看了新闻，的确管理得很好。正值一条运货的船只过闸口，船上渔民穿着很光鲜，面色红润。船仓里有十几只鸡争相啄食，一只大公鸡正在昂首鸣唱。我心中默默地告诉父亲：现在洪泽湖周边的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你当年的愿望早已实现，这里的人民不会忘记你。

黄花塘——历时最长的军部

随后，我们又赶往盱眙的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在 1943 年 1 月至 1945 年 9 月间，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驻地。沿途的高速路修得真好，冒着大雨，我们的车仍然以百公里以上的速度行进。

当我们在极狭窄的乡间水泥路上驶入军部纪念馆时，天又奇迹般地放晴了，乌云散去，太阳露出了笑脸。大家都说我的运气好，我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父亲在保佑他的小女儿，让我能沐浴着阳光，去寻访父辈的足迹。

在我的想象中，拥有黄花塘这样浪漫之名的军部所在，必当是秋有菊。当我到来一看，果然壮观秀美景色非凡，纪念馆屋顶遍铺茅草，很容易联想起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那些云集在新四军中叱咤风云亦风度翩翩的儒将们。军部移驻此地时，父亲已不再任政治部主任一职了。他所任政委的四师师部驻在泗洪的半城，与此地相距不远，是父亲当年常来常往之地。在赖传珠日记中，能够看到相关记载。而军部首

长也常到半城去，毕竟是新四军的主力师，又是淮北区党委所在地，往来多且密切。

1943年，正是淮北军民取得了33天反“扫荡”战役胜利之后，度过风云激荡的1942年，迎来的又一个春天。而著名的捉放韩德勤的故事也发生在此时。当津浦路西的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突然向路东的四师及淮北抗日根据地发起攻击，妄图一举摧毁之。3月15日军部发出命令：歼灭韩顽。于是，四师主力及三师七旅、二师五旅协同作战，归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在滂沱大雨中，围攻韩的指挥部，敌军的哨兵都撤回屋内避雨，以致新四军近在咫尺，却未被发现。仅3小时，就击毙王光夏，活捉了韩主席及其参谋长。3月18日，已为阶下囚的韩德勤被押到四师指挥部。他先是企图“杀身成仁”，而后又要求见彭与邓。经过各层次领导与之交谈和规劝，这位省主席大人提出三项要求：放人还枪，让一点地盘，给他一个下台的面子。经父亲与彭师长及淮北区党委相商，为绝蒋进袭新四军之口实，与其扣押一个无威慑力的韩德勤，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使“韩以后真正与我们合作，对我在敌后坚持抗战有极大作用，而且对全国合作有极大关系……”决定上报军部并请陈毅军长亲来与韩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陈军长等在师部设宴款待韩后，发还其人枪，派骑兵礼送其出境。自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再也不敢踏进淮北根据地，淮北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据资料显示，在1943年中，淮北根据地从日伪统治下，收复国土一万平方公里，解放50多万陷于水深火热的同胞。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9月，淮北根据地成为华中最为辽阔的解放区之一，对于韩的正确

处理不能说不具有很大的作用。

在这期间，父亲还领导纠正了淮北根据地锄奸肃反的扩大化，亲自查清了“淮中案件”“泗阳案件”等严重的冤假错案，实事求是的予以平反，并和刘瑞龙叔叔代表区党委向在这起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此后，淮北再未出现严重的偏差。多年以后，我还常听到四师干部在回忆此事时不无感慨地称颂父亲的求实作风。我想，那是因为父亲自己饱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从而使他格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必然能够发现左倾错误。

这是个父亲并未任职的军部，由于许多令我们记忆犹深的事件，使我对此地充满了感情。这里处处可以见到抗日将领们留下的年轻而矫健的身影。小路上布满了他们的足迹，茅屋里似乎还有发报机在嘀答作响，树林中不时传出乐观豪爽的朗朗笑谈。听：“将军！”这是我们的陈军长威风凛凛的发出了命令。

黄花塘代表了最后的胜利，在此期间，中国军队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迫令日军投降，宣布了侵略军的最终灭亡，从而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父亲，你们是新四军，是铁的新四军！是正义之师，是被血与火紧密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共和国的历史上铭刻着你们的丰功伟绩，祖国大地上永远耸立着你们的丰碑！

让昨日告诉今天，让历史警示未来。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无数先烈的牺牲，数十年的艰苦奋斗，鲜血染红的战旗将永远飘扬在共和国的上空。我们将牢记父辈的教诲，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永远跟随他们的足迹，向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前进！

在丹桂飘香的日子里

刘华苏

辛卯十月，江淮大地，稻菽穗黄，丹桂飘香。我随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兄弟姐妹组成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寻访团，走进苏北这片热土，追寻激情似火的岁月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留下的战斗、生活足迹。

我的父亲于1939年6月到隶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1940年9月，学校的两个大队由教育长谢祥军叔叔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父亲率领，随同刘少奇同志从淮南北上到达盐城；11月，与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编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父亲任政治部副主任。

我的母亲于1940年11月，经地下党安排，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盐城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的第一期学员。

就这样，一个江西农民出身的老红军和一个上海工人出身的新战士，在抗大五分校这座革命熔炉中相逢了。其间，父亲给予母亲很多的关心帮助。直至父亲辞世后，母亲仍念念不忘：“毓标是我的革命伴侣，也是我的领导。在抗大时听过他上的党课和作的报告，他是我到革命部队后的启蒙老师。我们共同生活56年，我始终尊重他，永远不忘他是我的

首长。”

1941年6月11日，父亲调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工作。1941年7月，日寇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军部。为避敌锋芒、粉碎日寇“大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转移至阜宁境内，8月初迁驻陈集镇停翅港村。经组织批准，父亲母亲在停翅港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父亲任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母亲在军部三科协理处当政治干事，每星期见一次面。他们在停翅港军部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同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

1942年12月，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更加残酷的斗争，向淮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军部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父亲调任18旅52团政委。当时，母亲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根据组织决定，通过地方组织护送回上海“打埋伏”。

1943年4月，父亲调任由留在汉润的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一个大队和部分机关人员扩编而成的抗大八分校（隶属新四军二师）政委。同月，母亲在上海生下了我的大哥，取名“华申”（上海也称为申城）。夏季的一天，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母亲住处，说她已被捕一月余，由家里保释放出。她在敌人处看到有母亲的名字，因敌人不知地址而没有抓到，要母亲立刻离开上海。母亲当即转移，数天后，在舅舅赵帛（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离沪脱险。

母亲独自抱着华申大哥，历经千难万险，找回解放区，来到千棵柳，与父亲会合。多年后，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些“耿耿于怀”：“1943年夏，南，毓标已调任分校政委，负责日部队的基层



在千棵柳时的一家人

母亲回忆景，还有怀”：我回到淮任抗大八负责培养抗指挥员。

当时，我带着四个月的孩子，通过地下党的关系，送我到天长县的汭涧镇，正巧遇见八分校的两位工作人员，我就跟着他们到了千棵柳八分校校部。毓标正在开会，有人告诉他，我带着孩子回来了，他没有分心，直到会议结束才回来。看到我们母子平安回来，他高兴得抱着孩子亲呀吻呀。看到这个情景，我把对他刚才冷落我们的意见全消除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工作一点不懈怠，我们母子费尽周折，从上海回到解放区，他因开会却不能出来看一看。”

团聚后，父亲母亲同在抗大八分校工作，直到1945年。

今日千棵柳，已与附近村庄并无二致。据当地老乡介绍，新四军军部1945年10月北迁后，旧址即被丧心病狂的敌人烧毁，连柳树也未能幸免，“千棵柳”已无柳。在村旁的稻田边，我拍了一张千棵柳的远景，带回去给曾在这里生活的华申大哥，不知能否唤起他童年的记忆。

从千棵柳向北约20公里，即是黄花塘。黄花塘，原名黄昏塘。清乾隆年间，凤阳有个姓孙的人，拖家带眷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才有了人气。过了些年，山东来了一批逃荒

的，孙家开仓放粮，使难民得以糊口。为了感谢孙家救命之恩，难民挖了一口水塘，挖到第三天傍黑才完工，故称黄昏塘。新四军来后，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将水塘深挖，增加蓄水量，方便了生产生活。张云逸副军长笑道：“这里是个好地方，春天油菜飘香，秋来稻谷金黄，毛主席还说‘战地黄花分外香’哩。我看，就把黄昏塘改成黄花塘吧！”罗炳辉师长也说：“叫黄花塘好！新四军就要给老百姓带来光明，让黄昏过去，迎来胜利的曙光！”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抵达黄花塘，代号“黄河大队”，在这里约两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军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指挥全军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领导全军开展了三大运动，整风、大生产、军政整训，为华中军民坚持斗争与争取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新四军文化艺术馆，是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是卞龙馆长在上级支持下做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大好事。它系统展示、真实再现了新四军文化艺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干革命需要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打天下需要这两杆子，建天下也需要这两杆子。我们不仅要建立一支精通军事和政治的军队，我们还要建立一支有文化素养的军队”，新四军努力建设成为一支既精通军事和政治、又有文化素养的军队。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不仅重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而且重视文化艺术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抗日宣传活跃，革命文化普及，文艺创

作繁荣，栋梁之材辈出。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华中抗日文化艺术活动，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 - 1937年10月新四军组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支持，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目的，华中地区掀起了抗日文化艺术宣传活动的热潮；第二阶段，1937年11月 - 1941年初皖南事变。抗日文化艺术活动，主要以新四军各级战地服务团、火线剧社、大众剧团、抗敌剧团、拂晓剧团、十月剧团的组织形式展开；第三阶段，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 - 1943年冬。兴办院校、培养人才（成立了抗大总分校和各分校、江淮大学、鲁艺华中分院、淮南艺校），组织苏北文协、繁荣创作（下辖戏剧、诗歌、木刻、音乐、自然科学等六个协会），设立文化村和艺文社、团结上层文化人士共同抗日；第四阶段，1943年11月 -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使文艺更大众化、更贴近斗争生活，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华中解放区还创办了培养建设人才的多学科的华中建设大学。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广，是仅次于延安而居于其他根据地之前的。它的覆盖面广，无论是城镇、乡村、村头、田间，还是机关、基层、部队、学校，都能深有感受；它的内容丰富，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减租减息、锄奸反特、参军支前、拥军优属、民兵工作等，各种题材均有涉猎；它的形式多样，戏剧、音乐、文学、舞蹈、美术无所不有，还有别具特色的墙头诗、秧歌舞和大量的地方民间文艺。时至今日，那种坚持文艺为革命斗争现实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指

导思想，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斗争第一线的创作道路，颂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启发、鼓舞人民投身抗战的伟大实践，依然给人以深刻启迪。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盛名儒将”陈毅同志气势磅礴的诗词，“火中凤凰”叶挺将军的摄影作品，还有叶挺将军先于《囚歌》而写的《囚语》手迹。《囚歌》早已广为知晓，而《囚语》却还鲜为人知。在这写于牢狱之中、3300字的《囚语》中，叶挺将军表达了对皖南事变中牺牲战友的深切痛惜和缅怀，鞭挞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痛斥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写下了“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的豪迈诗句。这是一篇革命者的正气歌啊！

在新
文化艺
术我们
看那
样的
年四
军指
战婚
恋依
然而
感人，
出革
命者
的感
情世
界，



在黄花塘时的一家人

四军
馆里，
到：在
代，新
员的
浪漫
折射
丰富

可谓“烽火情缘”。这里，展示了陈毅和张茜、张云逸和韩碧、赖传珠和孙湘、邓子恢和陈兰、谭震林和葛慧敏、曾山和邓六金、粟裕和楚青、罗炳辉和张明秀、彭雪枫和林颖、张爱萍和李又兰、季方和钱讷仁等11对夫妇的照片。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坚如钢，炽如火，深如海，美如画！

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黄花

塘军部医院，母亲生下了她和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华明”，迎接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千里寻根之旅

——68年后重返黄花塘

朱千里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北京新四军一师分会组织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 70 周年鲁南苏北行”活动。我们这些新四军后代通过这次红色之旅重温了新四军的光荣历史，追思了先辈们为创建新中国所作出的业绩，瞻仰并祭奠了革命先烈的英灵。这次红色之旅对我来说更具特殊意义。我是 1943 年 8 月 28 日在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出生的，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重回故地。因此，对我来说这更是一次难忘的寻根之旅。

2011 年 11 月 11 日午餐后，我们从淮安出发前往盱眙黄花塘，上车后大家都充分利用时间休息，但是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没有一丝困倦之意，妈妈常给我讲的故事又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

我母亲钱骏是江苏如皋人，出身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医生），她幼年丧母，家境一般，高小毕业后家里就不能供她继续读书了。于是跟着家中从医的长辈干点活，初步学会了一些消毒、打针、包扎等医护常识。于 1940 年 10 月参加了新四军，在一师三旅卫生部当医务员。参军后，她刻苦学习医疗知识，努力救治伤病员。虽然新四军的战斗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她却感到革命大家庭特别温暖，精神上很愉快！因此工作干得很出色，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我父亲朱传保是江西吉安人，出生于一个极其贫困的雇农家庭。于 1929 年 8 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跟着毛主席、

朱总司令闹革命，上了井冈山。先后参加过中央苏区 1—5 次反围剿。后在闽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任福建



永定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营长。参加了韦岗战斗、半塔保卫战、郭村战斗、黄桥决战、斜桥伏击战、石港攻坚战、谢家渡战斗等。1941 年，我父亲在一师三旅七团当参谋长，当时的团长是严昌荣，政委是彭德清。该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被陈毅军长授予“老虎团”称号。

1942 年我父亲已 30 岁了，组织上很关心老同志的个人问题，就给我母亲做工作，介绍她与父亲相识。

1942 年 9 月 25 日正好是中秋节，那天日本鬼子纠集 200 多日军和 100 多伪军，由大队司令保田中佐亲自指挥，从南通地区的三余镇出发，企图利用中秋之机对七团实施突然袭击。在粟裕师长和刘先胜旅长、吉洛（姬鹏飞）政委的亲自指挥下，七团指战员凭着机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举歼灭保田中佐以下日寇 110 多人，活捉 18 人，取得了辉煌战绩，这一仗就是震撼苏中战场的谢家渡战斗。妈妈在谢家渡战斗中带头抢救、运送伤员，表现也很突出。

中秋节后，严团长亲自为我父母主持了最简朴的婚礼，营以上干部都参加，大家乘机热闹了一下。

婚后，父亲被调到一师三旅教导大队任大队长，继而又到抗大九分校任三大队大队长，母亲也随之调动。后来抗大九分校从苏北迁移到江南溧水地区办学，那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她跟着部队昼夜行军、跋山涉水，经常一夜要走100多里路。到江南后不久，情况又紧张了，敌人想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在苏南的骨干力量。因此，上级决定抗大九分校撤回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父亲带着部队突围出去了，母亲被组织上安排就地“打埋伏”。后来，打埋伏的老百姓家也经常遭到敌人搜查，母亲只好再转移。曾经找到友邻部队，跟着他们在高淳的石臼湖上漂泊了三天三夜，几经周折后到了茅山地区，遇到16旅的张开荆参谋长，他是我父亲三年游击战时的老战友。他说，老朱临走时拜托过他关照一下钱骏同志。在我母亲离开江南时，他个人给了我母亲200块伪币，说一路上留着备用吧！后来每当我母亲提起此事都很感激。她随交通员过江到苏北后，又走了许多路才到达淮南抗大九分校住地与我父亲团聚，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母亲快临产时，又是自己走了80多里路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的，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想像！

母亲生我可是吃了大苦头，我是第一胎，头又特别大。生了一夜也出不来，疼得她直哼哼，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生下我。医生将我抱给妈妈看时把她吓了一跳，我的头被挤得长长的，像两个脑袋。住在隔壁治病的乔信明首长被我母亲闹的一夜没睡好，早上还过来看我母亲。他说：“女同志生孩子、当妈妈不容易啊，母女平安就好！”妈妈说：“不好意思，影响首长休息了。”妈妈曾跟我说过，军部医院有个“大鼻子”医生，他来查房时说：“这个孩子很漂亮啊！”妈妈还说过，张茜阿姨生孩子后没奶，她的孩子还吃过我妈妈的奶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孩子就是“陈丹淮”，去年听丹淮说，那个大鼻子医生叫罗生特，是奥地利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帮助我们抗日，是新四军队伍里的白求恩。这次在黄花塘看到他的照片，倍感亲切！

父亲曾告诉我，在我出生的第二天他就赶到医院来了，并自豪地说：“你的第一块尿布还是我洗的呢！”父母在商量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妈妈说：“从怀孕到生下这孩子，我起码走了几千里路，就叫‘千里’吧！”爸爸连声说：“朱千里，好！这个名字好！”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体育比较好，在南京市、江苏省中学生运动会上“三项全能”名列前茅，短跑成绩更为突出。熟悉我的同学就开玩笑说：“那可不，她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锻炼了，跑了几千里路呢！”

由于我父亲从小没有上过学，参加革命后才在部队里学了一点文化知识，所以他经常教育我们子女要好好学习。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为此，我在学校刻苦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德智体全面



发展，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文娱部长，团委会群众文化委员。1961年高中毕业时，被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学习。1966年毕业后，被分

配到空军通信器材厂工作。1976年由于工作需要，被调到空军第三研究所（即后来的空军装备研究院通信导航与指挥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空军地空通信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为空军的新装备发展研究工作了近40年，于2005年退休。

四十年来，我参加过的科研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九次；我撰写的论文在1996年、1998年两届全国军事通信学术会议上被评为优秀论文；我主编的几个国家军用国家标准在我退休后仍在使用中。另外，我曾被所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受嘉奖多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这是党和人民对我所做工作的肯定，为此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时，那些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新型战机上，就安装着由我负责研制的新一代电台。当机群掠过天安门上空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好像自己也在天上默默地飞，正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现在，我可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女儿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而且弟弟妹妹们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你们的孙子女们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没有忘记先辈的光荣传统，铁军精神正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的领导：管新凯会长、刘华苏副会长和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恽晓虎和吴苏宁等同志，由于他们的精心策划和周密组织，使我们这次鲁南苏北行像回到家一样温暖！而我们这些新四军后代像兄弟姐妹一样亲热！

父亲帮陈毅军长搜集资料

——《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出版轶事

刘迎新

1942年，我父亲刘志诚在新四军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奉命帮助陈毅军长搜集资料，以供他编辑《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前后经历一年半的时间，与陈毅军长接触很多，深受教诲，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1942年4月上旬，在阜宁单家港，刚开过华中局扩大会，新四军政治部移驻原防地郝周家的一天，组织部长张凯对我父亲说：“陈军长要编辑一本新四军抗战牺牲烈士的纪念册，由你帮助军长搜集资料。这个工作要用较长时间，由军长直接抓，专人专办，工作进展情况，不必向部里汇报。现在他在办公室等着向你交待任务，你去吧！”

当时军部驻在停翅港，与郝周家相隔二里路。军长的办公室是一座土墙干打垒、稻草盖顶的茅棚，中间用芦席隔着分为两间，里间是寝室，外间办公。军长正在伏案写作，我父亲走近向他敬了礼。陈军长站起来和我父亲握手，和蔼地叫父亲坐下。军长说：“抗战已经快五年了，我们新四军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浴血奋战，大量杀伤敌寇，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许多干部、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可是，国民

党反动派却造谣污蔑，骂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逆党”“逆军”，是“游而不击”。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积极反共、对日妥协投降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出版一本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的纪念读物，来宣扬我军抗战的辉煌战绩，宣扬先烈们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和高贵品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内部来说，也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是全体指战员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的读物。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有关的资料搜集起来。抗战近五年来，我们新四军战死疆场的干部、战士不下万余人，如果全部搜集，工程太大，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搜集团以上干部牺牲先烈的有关资料，其余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做。现在你可以先在政治部保管的干部档案中查找牺牲的团以上干部的资料，第一步先把牺牲同志的姓名、部别、职别查清楚，理出一个单子。”

当时军政治部重建不久，干部档案很不齐全，对牺牲的干部也没有专门的登记表册。我父亲从各师送来的干部档案和电报登记摘要簿上仔细查找烈士的姓名，还找到了两本支队和师出版的烈士纪念册，经过反复核对，汇集了全军抗战以来牺牲的团以上干部约50人左右的名单。4月下旬的一天，

我父亲把名单送给陈毅军长。他默默地仔细地逐个名字来看去看去，他眼睛发红了，噙着眼泪，又继续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好象在回忆往日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和部属。沉默了好一会，军长对我父亲说：“这是初步的名单，还不齐全，我记得的战斗牺牲的团以上干部还有两位，这个名单上就没有。”说着他就把两个烈士的名字补写在名单上。他又说：“搜集资料光靠干部档案也不行，你再把殉国先烈的名单送给其他几位军的领导同志看看，请他们补充，还可以在政治部一部分部长中征求意见，尽量把名单搜集齐全。然后，按姓名、年龄、籍贯、部别、职别、何时入伍、何时入党、略历、何时何地牺牲等项目列成表格，逐项填写，汇集成册。并且尽量搜集先烈的传记和悼念文章。”

我父亲随即分别找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和华中局组织部曾山部长等首长，他们也增补了几位牺牲先烈的名字。政治部部分领导同志也提供了几位烈士的姓名。父亲按照陈军长规定的表册项目逐项填写，计为60人，师旅级9人，团级51人。5月，送给军长审阅。这时军长起草了《本军抗战阵亡将校题名录书端》（初稿）。内列的“题名录凡60人，计师旅干部9员，团级干部51员”，就是根据这个初步

的统计数字写的。

陈军长当时虽写了《书端》初稿，但认为统计数字还不全，要我父亲尽量搜齐遗漏的先烈名单。父亲想了许多办法，如到华中局党校找来学习的老干部座谈，找来军部开会的领导同志和调来工作的干部个别征求意见，终于在抗战五周年的前夕，汇集了新四军抗战殉国团级以上先烈 91 人的英名。陈毅军长据此在 1942 年 7 月 7 日修订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对初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增删。

当时，搜集先烈传记和悼念文章，也是很困难的。由于敌寇频繁“清乡”、“扫荡”，部队行动不定，实行轻装，政治部各部门保留资料很少，加以各师分散大江南北，地域辽阔，战斗频繁，文件、报刊等文字材料常常需要通过多道敌人封锁线，经过好长时间才能送达军部。我父亲在政治部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和新华日报资料室等部门翻阅了所有的报纸和内部刊物，尽力搜集有关牺牲先烈的文章、传记等，看到一篇，就手抄一份。因为这些部门仅此一份，他们当作“宝贝”，是不允许剪贴的。那时，我的母亲沈映虹刚从一师调来军政治部秘书处文印股工作，每日伏案疾书，抄写了七、八万字的文稿。这些文稿军长都看了一遍。

本来，陈军长的意思，《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要在苏北地区印刷出版。以后考虑到资料汇集还不够齐全，特别是当时敌情紧张，将向淮南路东地区大转移，于是决定把搜集到的资料妥善保存，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再进一步审订出版。

1942年11月，新四军政治部移防到阜宁董舍，这时，日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即将开始，为了应付更加残酷的斗争，军部机关开始实行精兵简政。组织部的文件档案经过彻底清理，最后只剩下了两只铁皮箱。个人也进行了轻装。每人只留一条被子和一条被单，坛坛罐罐全部甩掉。最后，政治部全体干部和战勤人员连同家属总共只剩下45人。

1942年12月27日，新四军军部机关离开苏北开始了大转移。部队首先通过盐河封锁线，到了淮海区，休息两天，紧接着又要通过大运河封锁线。过大运河时，情况很紧张。敌人沿河安了据点，还有维持会等，队伍一口气快步走了三十里才停下来休息。过了运河就是淮宝区。到达洪泽的时候，正逢1943年元旦，部队就在洪泽县过了元旦。又行军了两天，部队渡过淮河，终于抵达目的地淮南路东根据地。转

移中，经过长途跋涉，又通过敌人两条封锁线，但有关殉国先烈的资料，我父亲按照陈毅军长的要求，一直保管得完好无损。

1943年1月初转移到淮南路东后，军部驻盱眙县黄花塘，政治部驻大王庄，相隔不远。这时，我父亲兼任军直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总支书记，和军长接触的机会多了。军长叫我父亲继续搜集殉国先烈的资料，充实《纪念册》的内容。

这时，组织部长张凯同志去浙东检查工作了，组织部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而精简前是二十多人，其它部门也有类似情况。为了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每个人都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工作随到随办，白天干不了晚上干，从不积压。有什么事情及时商量，及时解决，工作效率很高。在搜集殉国先烈材料中遇到问题时，陈毅军长同我父亲面对面一块儿研究，给予明确指示，抓得很细致、很具体。

到了1943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大批兵力，向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实行进犯。陈军长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为了制止和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要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现在出版发行《纪念册》的时机到来了，我们要以

我军抗战殉国先烈的英雄事迹，来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中伤。”他要我父亲把抗战第六年度新四军殉国的团以上先烈名字增补到《书端》上，并且继续搜集、补充悼念先烈的文章。

军长开始着手亲自编辑、审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这一时期军长多次对我父亲指示，有时写条子给我父亲交代任务，有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听我父亲的汇报。给我父亲印象最深的有两次谈话：一次是在审阅先烈名单时，军长指着名字，详细叙述牺牲先烈的斗争事迹，说这个同志对革命贡献很大……，这个同志战斗一贯勇敢，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同志思想品质好，对党忠诚，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军长记得十分清楚，又讲得生动具体。

一次是在谈到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我军的污蔑中伤时，军长气愤地说：反动派没有天良，我们新四军对抗战贡献这样大，光团以上干部就牺牲了 100 多人，而他们逃到峨嵋山，坐山观虎斗，反讲我军“游而不击”，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长缅怀先烈，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谈话，使我父亲受到深刻教育。

父亲把抗战第六年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名单 38 人增补上

去。陈军长写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第六年补录》，对已定稿的《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又作了最后的文字修饰。

1942年10月间，陈毅军长在到延安之前，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最后审查定稿。军长亲笔写了封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十个大字。目录分四个部分：一、题字。张云逸副军长题字“牺牲为大众，正气留人间”。饶淑石代政委题字“为祖国的自由，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其光荣将永垂不朽”。赖传珠参谋长题字“先烈之血，民族之光，吾党之荣”。曾山部长题字“为民族抗战壮烈牺牲”。二、序。陈毅代军长序，饶淑石代政委序。三、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四、本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文汇。一共汇集37篇纪念先烈的文章、传记。其中，周恩来同志1篇：《纪念邱金声、肖国生两同志》，陈毅同志5篇：《纪念黄道同志》、《合肥童汉章先生哀辞》、《在罗化成同志墓前致词》、《追悼模范政工人员肖国生同志》、《纪念我们的死者》。在纪念黄道同志文章的后面，又加了“附记”。指出：“这篇文章是四年前于黄道同志病故时写的。不料人虽死不能生，而反动派的报复花样却日新月异，出奇之至。据闽北党报告，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进入闽北山区搜山时，竟将黄道同志的坟墓挖开，断其头首以去。哼！反动派勇于对内的报复精神可谓登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反动派的胜利还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1943年9月，陈毅记”。“附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

军政治部印刷厂接到陈军长亲自编辑、审订的文稿，加班排印。军长亲手题写的封面《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用朱红油墨印刷，显得格外庄严。1943年底，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读物和广大群众见面了。

《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的出版发行，大大鼓舞了华中敌后广大军民的抗战热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中伤。大家团结一致，继承先烈的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勇前进！

妈妈的伤残故事

胡海鸽

我们家有一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残疾证》，上面记载着妈妈胡序同于1945年在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所在地淮南大王庄(今盱眙县旧铺)参与将地雷改制成水雷的过程中，因引发爆炸致残。左耳膜中央穿孔，从此失聪，被评为三等残废。

妈妈193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入党，1942年到淮南参加新四军。在二师政治部工作了近两年之后，奉调到师军工部工务科工作。和妈妈先后调到军工部的还有她的一位战友俞启英阿姨。妈妈是高中生，俞阿姨是大学生，她们都算是当时部队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军工部的工作又脏又累，还有危险，但她们却认为自己所学的文化，在那里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直接参加军工生产，为前方部队提供打击敌人的武器，多么有意义啊！

当时的二师军工部工务科长是吴运铎伯伯。他是一位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军工专家。他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军工事业。他聪明勤奋，不畏艰险，待人热诚，凭着一股韧劲和钻劲，成为新四军中的行家里手。当时，二师军工部在新四军赫赫有名，经过军工部全体同志的多年艰苦奋斗，已具备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修理一般的军械以及卫生部、印刷厂、被服厂的机器设备，都不在话下。为满足部队的军事需求，还不断试制研发各种武器装备。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先后研制和生产了手榴弹、枪榴弹、炮弹，以及掷弹筒、迫击炮、平射炮等轻重武器。吴运铎伯伯在这些工作中都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出色成就，同时也

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次，他在旧炮弹中挖炸药时，雷管在手中爆炸，左手当即炸掉了4个手指，左腿膝盖炸开，露出了膝盖骨，左眼飞进一块铜片，致使失明。肉和皮炸得飞起来，沾在墙上桌上。吴伯伯昏迷了整整15天才清醒过来，留下了严重残疾。即便这样，他仍然忘我地奋斗在军工战线，并为此奉献了一生，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初到军工部时，妈妈和俞阿姨对军工生产一窍不通，便先跟吴伯伯学习机械制图。吴伯伯设计出草图，妈妈她们再依样画工作图。罗炳辉师长送给吴运铎伯伯一套英文的机械制图书，她们凭借在学校学过的一点英文基础，找了本英文字典，在吴伯伯的讲解下，进行翻译。就这样，妈妈她们初步掌握了机械制图知识。当时画过手榴弹、炮弹和火炮的加工图纸，并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车、钳工技术和淬火技术。

1945年7月，日军的汽艇在淮河活动猖獗，为防止日军从淮河上岸，罗炳辉师长命令军工部一周内尽快试制出水雷，用以封锁淮河。这个任务交给了工务科承担。时间紧，任务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钢铁、炸药等材料。当时前方部队送来一大批缴获的日军地雷，吴伯伯便想了个办法，将这批日式地雷改制成水雷。这样既解决了材料问题，又争取了时间。这种日式地雷形状像个大西瓜，顶端有一个5.26公分厚的铁帽，铁帽下便是引信。吴伯伯经过亲自试验后，做出大胆决定：将引信帽锯掉一半后，用石棉布和蜡，火漆等将帽口封严，防止进水，这样便改制成了水雷。锯铁帽的危险性最大，引信一发热便会引起爆炸。但不这样干，就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水雷。妈妈和俞阿姨接受了改制的任务。

开始，她们非常谨慎，按照吴运铎伯伯的吩咐，把地雷夹在老虎钳上，一个人用钢锯锯铁盖，一个人用盛了水的油壶不断地向锯口浇水，使之冷却，以防爆炸。锯下铁帽再封口，几天下来都很顺利，心情就放松了。谁知就在任务快完成时，一场爆炸事故发生了——那是7月末的一个下午，俞阿姨去材料科领石棉布，叫勤务员小高代替浇水，妈妈锯铁帽。当时在场的有个从分厂调来帮助试制的车工徐玉才。他见妈妈慢慢锯，心里着急，便拿了一把榔头想把快锯断的铁帽砸下来，以节省时间和锯条。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却引爆了地雷。房顶炸了个大洞，在场的六七个人全被炸伤。徐玉才被炸成个血人，半边脸都掉下来。就这样，他还挣扎着走到机床边摸摸，怕炸坏了机床。最后倒在吴运铎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牺牲时他才20来岁。抱着小徐的遗体，吴运铎泣不成声。

妈妈当时被一股强大的气浪冲击到身边的一张床铺底下，一只耳朵被震聋，两条腿被炸伤，血肉模糊，至今还有疤痕。当别人把她从床下救出来时，还在昏迷中，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妈妈躺了一个多月，在病床上迎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盛大节日。那年妈妈刚满22岁，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1945年是二师军工部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贡献很大，但伤亡也不小——共牺牲了4位同志，有10多位同志受伤。其中一分厂在试制炮弹时，厂长秦永祥和一名股长当场牺牲，装药股3位女同志负伤。10月初，俞阿姨也在完成制作500克雷汞的任务中，四肢被烧伤。她和妈妈结下了生死之

交，成为终生的亲密战友。

妈妈在对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十分感慨地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仿佛到阴阳界上走了一趟。由此，我深深体会到生命是脆弱的，生与死的界限有时真的仅仅只在一线之间啊！特别在当时军工部的特殊条件下，危险往往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但是，我并不感到后怕，相反我只会比以往更加珍视和热爱生活。唯一使我感到难过和遗憾的是，牺牲的战友未能看到抗战胜利的到来，在欢庆胜利的前夜他们倒在了战斗的岗位上。至于我自己，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也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流了一点血，虽然不是在你死我活的前线。”

六十多年过去了，妈妈已有 87 岁高龄，身体还健朗。多年来她坚持做耳保健操，仅靠一只耳朵的听力，基本能与人交流。只是有时对她说话时，需要大声地重复几遍。外出或家里来客人时，她会戴上助听器，以提高听力。她每年领到三五千元左右的残废金，都用于招待客人或请家人吃饭。她说：“我请你们吃饭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要体谅我的残疾，对我说话耐心些。”

亲爱的妈妈，您放心——您和无数革命前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您的子女永远是您聪慧的耳朵和明亮的眼睛！